

# 「天祿琳琅」藏書史事補證\*

曾紀剛\*\*

## 提 要

清宮「天祿琳琅」藏書，是中國古代藏書史上首創專就古籍善本為對象，以版本賞鑑為核心的皇家文物特藏。本文藉助知見所及的檔案文獻，與書籍實物相互查考驗證，分別就「天祿琳琅」之鑑藏源起、規模數量、清查盤點、藏書餘緒等相關史事脈絡，試為補白辨訂。首先推溯善本特藏的時間、空間原點，自乾隆元年（1736）正月，御花園內的絳雪軒便被布置為一處度藏古籍善本的專屬空間，而將古書視同藝術品般鑑藏賞玩，正是乾隆皇帝大規模整理宮廷傳藏文物，開展各類古物典藏陳設版圖的起點。其次考辨乾隆朝所編定《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實際著錄藏書總數乃430部，這與學界公認為429部的一部之差，係因點校整理時尚難採用清內府鈔本為底本，也未能參據繕錄年代相近的《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或《欽定四庫全書》本，將部、函、冊等數量歧異處一一檢校核實。再則首度揭示光緒二十年（1894）三、四月間，南書房翰林奉旨全面清查宮中各處「天祿琳琅」遺書、闕書、目外書的完整過程，而存世的盤點紀錄內容，猶能和嘉慶朝重輯之《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乃至所著錄之原書相覈互證，頗有助於探究古籍傳藏脈絡中的佚存時序暨實物樣態。最後，光緒年間的清查盤點，實則導致皇家善本特藏重心，從乾、嘉二朝的昭仁殿轉移至景陽宮御書房，而百餘年來始終停滯在傳聞階段的「天祿琳琅」「四編」書，也因此得以發現新的史料線索，進一步對應現存書籍實物，作為重新想像光緒朝建構新善本特藏的依據。透過本文的初步考察，期望能為學界接續研究「天祿琳琅」藏書，開啓另一座文物資源，建立新的起點。

**關鍵詞：**天祿琳琅、乾隆元年、絳雪軒、光緒二十年、景陽宮、御書房、四編書

\* 收稿日期：2022年6月28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8月29日

本文初稿，於2022年4月28日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之「第七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感謝特約討論人京都大學瞿艷丹博士提供有助推進思考之線索。撰文期間，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賜示修訂意見，並獲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及章偉先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利用處李靜女士、中國國家圖書館馬學良副研究館員以及善本閱覽室諸位師友同仁，協助查核資料並申請圖檔授權事宜，並致謝忱。本文若有任何疏誤，概由作者自負全責。

\*\*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 一、前言

中國古代宮廷藏書的歷史悠遠、自成傳統，長久以來，概與「經邦立政」、「爲國之本」這類觀念緊密貼合，<sup>1</sup>也是官方推行文教（治）政策的實際狀態。藏諸私人，則多被認爲是蓄積研治學問的基礎，必以考訂校讎爲正路；若徒務於蒐求異本、精本、珍本的收藏賞鑑家數，即等而下之。<sup>2</sup>不過，從明代中葉的蘇州開始，醞釀出一股新型態的藏書風氣與藏書家，也就是將書籍——特別是珍稀的宋版古書——當作古物或古玩一般予以品鑑收藏，發掘、彰顯其獨特的藝術內涵或美感元素。<sup>3</sup>這般品味風氣從民間導入宮廷，迄至清乾隆年間創建「天祿琳琅」皇家善本特藏，明白揭櫫以古籍善本爲對象、以版本賞鑑爲核心的鑑藏理念，專收珍稀圖籍、佳槧精鈔，「自來冊府珍藏，洵無能與之媲美」，<sup>4</sup>誠可謂將古書視作古物這一脈藏書方式的極致表現。

近年學界對於清宮「天祿琳琅」藏書的研究成果漸趨豐碩，無論是宏觀的脈絡重建乃至細微的個案考察，舉凡有關「天祿琳琅」之藏書始末、書目編纂、傳存調查、版本辨訂、學術影響等方面，皆有愈益明晰而完整的論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專著，首推北京清華大學劉薈教授之《天祿琳琅研究》與《天祿琳琅知見書錄》。前者係就「天祿琳琅」特藏進行整體研究，其學術創獲暨貢獻在於「資料搜集，近乎竭澤；親歷目驗，不遺餘力，辨微考異，不漏纖毫」，進而建立一套新的研究模式，將文獻探蹟與田野調查充分結合；<sup>5</sup>後者則爲劉氏遍訪存世「天祿琳琅」相關藏書暨前、後二編書目傳本的版本審訂與目驗實錄，其重要性在於「對版本實情的揭示較之原來的書目文字更爲得宜」，而考訂各書之藏奔源流並鑑別版

1 《隋書·牛弘傳》：「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參見（唐）魏徵，《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49，〈牛弘傳〉，頁1300。

2 此即清人洪亮吉之藏書家分五等論。詳見氏著，《北江詩話》（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冊2598，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卷3，頁29。

3 李開升，〈古籍之爲文物——明代出現的新型藏書家〉，收入氏著，《古籍之爲文物》（北京：中華書局，2019），上篇〈藏書〉，頁12-17。另可參考范景中，〈書籍之爲藝術——趙孟頫的藏書與《汲黯傳》〉，《中國美術學院學報》，2009年4期，頁25-48；范景中，〈從藝術的觀念看書籍史〉，《中國美術學院學報》，2021年2期，頁4-39。

4 （清）嵇璜等編，《皇朝文獻通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嘉慶間武英殿刊本，統一編號：故殿004089-004168、故殿028320-028415），卷224，〈經籍考十四·史·目錄·經籍〉，「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十卷」解題，葉34b。

5 劉薈，《天祿琳琅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來新夏序〉，頁2。又，本文徵引之傳統文獻暨研究論著，「祿」或用異體之「祿」，今皆作「祿」；「琅」、「瑯」則按原文逐錄。

本之真偽，復尤爲此書突出優異之處。<sup>6</sup>

在劉薔兩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問世後，持續可見有關「天祿琳琅」各類議題的研究進展。或專就書目文獻加以辨訂，或詳考貴重古物的傳藏脈絡，或察覺宮廷藏書自身存在的特殊現象。例如：郭明芳發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典藏鈔本《欽定天祿琳琅書目》（以下簡稱「《前目》」）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以下簡稱「《後目》」），正是劉薔《書錄》誤以爲現存國家圖書館之袁思亮（1879-1939）剛伐邑齋舊藏本；作者除論析前、後二目傳鈔之底本來源，同時梳理其遞藏脈絡，於《書錄》不無補苴之助。<sup>7</sup> 林世田、趙洪雅多方蒐羅梳理檔案文獻、尺牘題跋，力求還原宋槧孤帙《經典釋文》（《後目》卷3〈宋版經部〉著錄書）的流散始末以及調撥、捐贈原委，進而揭櫫其中深寓之古籍保護理念。<sup>8</sup> 趙長波因參與遼寧省圖書館（以下簡稱「遼圖」）古籍數位化工作，發現館藏42部「天祿琳琅」遺書中，不乏原書頁碼錯誤或裝訂失序的狀況；所舉《大學衍義》一例，推測係因後代修補版片時佚闕或書冊重新裝訂時倒錯所致；又依據鈐印特徵，研判此書應屬乾隆朝纂修《前目》目外書，未入《後目》，亦非嘉慶朝續輯之「三編」書，適足訂正劉薔《書錄》誤記之失。<sup>9</sup>

「天祿琳琅」前、後二編書目與存世古籍，蘊藏著豐富的版本學術內涵與文物實證訊息，無論專就個案探討或群組式的比較研究，皆值得深掘細辨，也受到學者較多的關注和闡發。諸如：

- 
- 6 劉薔，《天祿琳琅知見書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沈津序〉，頁3；同書，〈嚴佐之序〉，頁2。爲求行文閱讀之便，本文以下引用或論及此書時，皆簡稱「《書錄》」。又，本書出版後，作者持續關注、追蹤「天祿琳琅」書存世現況，輒有新見書物現身。2021年10月11日，寧波天一閣博物院召開「天一閣與流散書籍訪歸」中外學術研討會，劉薔宣讀新作《〈天祿琳琅知見書錄〉補說》（未刊稿），總結截至目前，凡嘉慶朝續輯《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之664部藏書中，可考知藏地者計623部，有2部確定毀於戰火，5部曾有前人經眼紀錄，餘則尚有34部至今下落不明。2022年5月21日，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辦第二屆「古籍文獻收藏、研究與整理出版」國際學術論壇之「東亞漢籍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研討會，劉薔發表〈日本現藏清宮天祿琳琅遺書考述〉（未刊稿），指出日本曾藏暨現藏之「天祿琳琅」遺書共12部，較前作〈清宮「天祿琳琅」遺書流寓日本考〉新訪得7部。參見劉薔，〈清宮「天祿琳琅」遺書流寓日本考〉，《版本目錄學研究》，第9輯（2018.11），頁615-628。
- 7 郭明芳，〈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抄本天祿琳琅書目考述〉，《版本目錄學研究》，第12輯（2020.11），頁77-93。另參考劉薔，《天祿琳琅研究》，第三章第五節〈《天祿琳琅書目》的版本與流傳〉，頁253；劉薔，《書錄》，附錄三〈《天祿琳琅書目》的抄本與批校本〉，頁828。
- 8 林世田、趙洪雅，〈宋刻本《經典釋文》的流散與合璧〉，《文獻》，2022年2期，頁178-191。
- 9 趙長波，〈天祿琳琅元刻明修本《大學衍義》錯碼與誤訂摺拾〉，《圖書館學刊》，2021年11期，頁109-112。

郝潤華探討《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集》的版本系統，指出現藏南京圖書館之《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當即與《前目》卷3〈宋版集部〉所著錄二部宋慶元六年（1200）魏仲舉家塾刊本為同版，且皆係初印。然而，乾隆年間纂修《欽定四庫全書》（本文以下簡稱「《四庫》」）時，並未取用昭仁殿「天祿琳琅」特藏善本作為繕錄底本。<sup>10</sup>

劉冰考述遼圖館藏元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殘帙，為《後目》首卷著錄帶有乾隆御題詩的九部善本之一，屬於稀見的建陽書坊刊十二行本系統；原書流出清宮後星散飄零，如今分藏兩岸數家公、私單位暨私人，猶能配成完璧，卷冊不失，堪稱書林奇緣。<sup>11</sup>

章莎菲研究南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遞修本《周易注》的鈔補情形，考出卷7至卷9乃是明代華復初借鈔王世貞（1526-1590）家藏宋浙刻本配補，而後者即是嘉慶朝纂輯《後目》卷2〈宋版經部〉著錄的第一部善本。<sup>12</sup>

王鏐關注明嘉靖間刊《禮記注》，《後目》曾著錄於卷2〈宋版經部〉，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實係明代嘉靖年間蘇州工匠根據南宋余仁仲萬卷堂本所翻刻的本子，其文字質量優於紹熙間刊《纂圖互註禮記》，而不如宋蜀大字本、撫州公使庫本、余氏萬卷堂本、婺州蔣宅崇知齋本以及清乾隆間武英殿覆刊元相臺岳氏荆谿家塾本。<sup>13</sup>

郭帥研究現存經注本《春秋經傳集解》，比勘不同版本的文本異同，梳理其間關係並揭擯個別價值，當中包括臺北故宮典藏之撫州公使庫本暨其配補之江陰郡齋本，指出二者分別承自不同的北宋監本系統。撫州本校勘時可能參據舊鈔經卷，更見存古；江陰郡齋本訛誤脫漏較多，版刻質量不若撫州本精善。<sup>14</sup>

李峻岫考校孫奭（962-1033）《孟子音義》之影宋鈔本，詳細比對各本異同，

10 郝潤華，〈《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集》版本考辨〉，《古典文獻研究》，第22輯下（2020.1），頁41-52。

11 劉冰，〈遼寧省圖書館藏天祿琳琅舊藏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考述〉，《圖書館學刊》，2021年6期，頁90-93。

12 章莎菲，〈撫州本《周易》抄補考〉，《古籍研究》，總第73輯（2021上），頁97-110。

13 王鏐，〈明嘉靖本《禮記注》考略〉，《古典文獻研究》，第24輯下（2021.12），頁57-77。

14 郭帥，〈《春秋經傳集解》版本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21），第三章〈南宋撫州本《春秋經傳集解》研究〉，頁82-101；第六章第二節〈南宋江陰郡刻《春秋經傳集解》研究〉，頁159-169。

歸納得出現藏中國國圖且為《後目》卷 8〈影宋鈔諸部〉著錄之清初影宋鈔本，與毛辰（1640-1713）汲古閣影宋鈔本、錢曾（1629-1701）述古堂影宋鈔本（黃丕烈據以影刻）之底本，皆源出宋蜀刻大字本，而宋本校刻時即有不少疏誤，質量並非上乘；影鈔諸本頗多改正，亦不乏誤改、臆改之處，與宋槧本各具相互參證的文獻價值。<sup>15</sup>

孫碧佳介述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元翻宋巾箱本《箋註陶淵明集》與明嘉靖間郭雲鵬濟美堂刊《河東先生集》，前者《後目》著錄於卷 6〈宋版集部〉，為一元刻孤本；後者著錄於卷 18〈明版集部〉，作者據鈐印稱此書曾經項元汴（1525-1590）收藏，劉薈《書錄》則認為其「印色晦黯，印文不佳，疑為偽印」。<sup>16</sup>

劉明探究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國國圖」）藏《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後目》鑑定為宋建陽巾箱本；學者諦審其版式、刀法、紙墨，實乃金代中葉平水坊本，保留了以北宋舊本為底本的版刻特徵，世無二帙，孤罕可寶。<sup>17</sup>

舒大剛、尤瀟瀟為整理《三蘇先生文粹》，選擇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後目》卷 6〈宋版集部〉著錄之宋巾箱本《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與中國國圖藏宋婺州東陽胡倉王宅桂堂刊《三蘇先生文粹》進行詳細比對，歸納出巾箱本收錄內容較全、分類選輯方式完善，而婺州本之文字更見精審，也更具校勘價值；二本各取優長，當可呈現此書較佳之版本面貌。<sup>18</sup>

沈如泉、王瓊查考李劉（1175-1245）《梅亭先生四六標準》的刊刻情形與版本系統，檢得中國國圖藏「天祿琳琅」遺書，正是宋刻初印本，而《後目》誤判為元版，著錄於卷 11〈元版集部〉；吳娟對於李劉文集歷代編刻流傳的考察則更加全面，也具體釐清現存七部宋本之間的版刻與印次關係。<sup>19</sup>

15 李峻岫，〈《孟子音義》影宋抄本考校——兼論宋蜀刻大字本之刊刻質量及文獻價值〉，《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 14 輯（2022.8），頁 72-102。

16 孫碧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天祿琳琅」典籍考略〉，《明清論叢》，第 18 輯（2018.12），頁 433-446；劉薈，《書錄》，頁 562。

17 劉明，〈金刻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小識〉，《古典文學知識》，總第 208 期（2020.1），頁 44-49。另收入氏著《中國古書版本筆記》（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題作〈清宮舊藏金刻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頁 355-368。

18 舒大剛、尤瀟瀟，〈兩種宋版《三蘇文粹》比較研究〉，《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 3 期，頁 74-85。

19 沈如泉、王瓊，〈《梅亭先生四六標準》敘錄〉，《駢文研究》，第 2 輯（2018.6），頁 178-179；吳娟，〈李劉《四六標準》《梅亭先生四六》編刻流傳考〉，《版本目錄學研究》，第 12 輯

臺北故宮典藏《後目》卷7〈宋版集部〉著錄之宋咸淳間刊劉震孫（1197-1268）《新編諸儒批點古今文章正印》，乃舉世僅存孤本，岑天祥、吳學敏幾乎同時撰就專題論文；二文篇幅長短、架構繁簡有別，既有共同關注的重點議題如編選與評點，也互見各自發掘的學術旨趣。吳文從文章輯佚、版本校勘、科舉材料三方面總結此書的價值意義，岑文則指出劉震孫的體例設計與編選好尚對於文章學研究的特殊價值。<sup>20</sup>

當然，學者對於古籍版刻的鑑別審定，憑藉專業與經驗，各持理據，有時未必能形成共識。《後目》卷7〈宋版集部〉誤收一部應該歸入子部的巾箱小版類書《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沈津多年前即撰文認定為明刻，指出其中存在偽製元人印記、紙張墨色不古、書葉裁切割裂等疑點，劉蕃亦認為「版刻風格似明代刻本」；<sup>21</sup>李致忠則依據字體刀法、紙張墨色、避諱習慣以及多用簡體、異體、俗體字等風格特徵，申明其贊同前人審定為南宋閩建書坊刻本的觀點。<sup>22</sup>

上述之外，也有學者著重辨析、追索「天祿琳琅」藏書（或與其版本相同之別本）與《四庫》繕錄底本的關係。李振聚指出《四庫》本《謝宣城集》底本即《前目》卷3〈宋版集部〉著錄之乾隆御題宋嘉定本《謝宣城詩集》，內容完整，闕誤甚少，頗具版本校勘價值，堪稱精善；文淵閣《四庫》本《考古圖》之底本，同樣是乾隆朝「天祿琳琅」鑑藏的錢曾影鈔宋本，而文津閣本則出自近代刻本，誠遜於文淵閣本。<sup>23</sup>張學芬在考辨《四庫》本《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底本之前，欲先釐清《前目》、《後目》俱見著錄之明嘉靖十五年（1536）玉几山人刊本與轉版後印的明易山人本二者先後關係，點出劉蕃《書錄》以為「明易本先於玉几本」，繼而評論其「『玉几山人刻明易山人印本』之說法是不恰當的」。<sup>24</sup>儘管《書

---

（2020.11），頁 140-158。

- 20 岑天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刻孤本《文章正印》考論〉，《斯文》，第7輯（2021.6），頁 166-184；吳學敏，〈南宋劉震孫《文章正印》研究〉（杭州：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1）。
- 21 沈津，〈一個美麗的「錯誤」——古籍版本鑒定札記〉，收入氏著《伏握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頁 305-311；劉蕃，《書錄》，頁 266-268。
- 22 李致忠，〈宋刊巾箱本《萬卷菁華》考論〉，《山東圖書館學刊》，2019年4期，頁 1-4。
- 23 李振聚，〈論《四庫全書》本《謝宣城集》出於清宮天祿琳琅藏宋刻本〉，《天一閣文叢》，第16輯（2019.9），頁 86-93；李振聚，〈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的底本來源及其價值——兼論《四庫全書》纂修與清宮天祿琳琅藏書之關係〉，《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22輯（2020.12），頁 194-204。
- 24 張學芬，〈四庫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底本考辨——兼論玉几本與明易本之關係〉，《古籍研究》，總第74輯（2021下），頁 154-166。

錄》將「明易」皆誤作「明易」，固有微瑕，然遍檢劉蕃所述，卻未嘗主張明易本刻印在前、玉几本在後，不知作者如何讀出這一層意思？當屬誤解。

另一方面，自 2013 年 8 月 27 日，中國國圖啓動修復館藏「天祿琳琅」藏書專案，至 2022 年元月 7 日，宣告完成 300 餘冊屬於「一級破損」<sup>25</sup> 古籍的搶救性修復。<sup>26</sup> 伴隨著保存維護工作的推進，團隊成員陸續發表修復個案紀錄暨相關研究成果，介述紙質文物劣化損壞類型、修復材料的分析、修復策略的研擬、修復工作的程序，乃至從中發現前代修補的痕跡與技法，從「物」與「術」的層面進行最直接而深刻的對話。朱振彬藉由「宋版」《春秋經傳集解》（實為明嘉靖間覆刊宋阮仲猷種德堂本）、「元版」《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實為明初刊本）等多部實例，檢討傳統「以補帶襯」的修復方法，說明對於襯紙去留或改變裝幀原貌的態度，闡述古籍修復「最少干預」及「整舊如舊」的原則；而他也在修復明版《十七史詳節》時，發現前代工匠設計出一種有別於常規的接背（腦）方式，好讓裝訂書冊時書腦空間較為寬裕，遂沿用此一工法修復還原。<sup>27</sup> 崔志賓歸納前人修復方式，評述其缺失，規劃出較為妥善的解決措施，也介紹函套裝具、染色工藝、接背技術的實務應用成效。<sup>28</sup> 田婷婷、潘菲則分別敘述負責修復的書籍實例，以及對於修復紙張材質與清宮藏書裝潢樣貌等課題的延伸思考。<sup>29</sup> 此外，學界也開始關

- 
- 25 依據中國文化部 2006 年發布之「古籍特藏破損定級標準」（標準編號：WH/T 22-2006），凡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定為一級破損：(1) 書葉紙張酸鹼值小於 4；(2) 書葉紙張強度嚴重降低，翻動時出現掉渣、碎裂現象；(3) 書葉黏連面積大於 40% 且逾該冊總葉數之 40%；(4) 書葉蟲蛀面積大於 50% 且逾該冊總葉數之 80%；(5) 書葉黴蝕、鼠齧、燼毀超過 30% 且逾該冊總葉數之 60%；(6) 書葉嚴重絮化比例超過該冊總葉數之 40%；(7) 葉面、書脊、書口、書腦各部位嚴重缺損，需整冊揭裱修復者。
- 26 朱振彬，《古籍修復探索與實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第四章第三節〈「天祿琳琅」的修復〉，頁 171-173；馮朝暉，〈8 年修復清宮舊藏 300 餘冊：國家圖書館發佈「天祿琳琅」古籍修復項目重大成果〉，（中國）國家文物局，<https://reurl.cc/pZORqI>。（檢索日期：2022.10.10）
- 27 朱振彬，〈關於國家圖書館藏「天祿琳琅」珍籍的修復〉，《文津學誌》，第 9 輯（2016.8），頁 336-342；朱振彬，〈國家圖書館「天祿琳琅」專藏修復案例〉，《文津學誌》，第 10 輯（2017.8），頁 476-483；朱振彬，〈國家圖書館「天祿琳琅」專藏修復札記二則〉，《文津學誌》，第 11 輯（2018.8），頁 424-429。另見氏著，《古籍修復探索與實踐》，第四章第三節〈「天祿琳琅」的修復〉，頁 168-222。
- 28 崔志賓，〈《宋板春秋經傳集解》函套修復簡述〉，《文津流觴》，2015 年 1 期（總第 49 期），頁 26-30；崔志賓，〈「天祿琳琅」珍藏中前人修復遺存及解決措施綜述〉，《文津學誌》，第 10 輯（2017.8），頁 484-496；崔志賓，〈傳統染色在「天祿琳琅」修復工作中的應用初探〉，收入陳紅彥、劉波主編，《芸香芬馥——古籍保護探索與實踐》（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7），頁 238-243；崔志賓，〈一種特殊「接背」方法在古籍修復工作中的應用——以國家圖書館「天祿琳琅」專藏《漢書》單冊修復為例〉，《文津學誌》，第 18 輯（2022.6），頁 247-254。
- 29 田婷婷，〈脆弱文獻的修補、加固與補紙的選擇加工——「天祿琳琅」藏書《唐文粹》修復紀

注「天祿琳琅」藏書的修復與裝潢特色，王曉鈺介紹《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的裝潢特點與修復應用，原松邑針對《六家文選》的裝潢修復與版本作偽進行綜合考察，曹萌則是簡要描述遼圖典藏二部元刻本的裝潢樣貌；<sup>30</sup>惟曹文介紹案例有限，復據其描述之裝潢材質樣式，悉屬同治、光緒朝以降修復重裝而非嘉慶朝原裝，尚不足以涵蓋或代表清宮「天祿琳琅」元刊本之裝潢形制。

綜觀學界近年研究動態，不僅從多元面向深度考掘「天祿琳琅」的古籍版本內涵與物質技藝資源，對於這座皇家善本特藏的「始」、「末」，抑或百數十年間諸如書目著錄、管理維護等史事脈絡，也漸趨形成共識；某些論題儼然殆無疑義，餘則不乏因文獻闕如而徒留想像者。本文撰著之宗旨，冀能在前賢持續累積的研究基礎上勉為推進，甚至有所突破；主要借重晚近整理出版之清宮史料，以及訪查知見之檔案文獻，試就關涉「天祿琳琅」鑑藏源起、規模數量、清查盤點、藏書餘緒等歷史環節，盡量予以補白辨訂。藉由本文梳理之文獻史證，當可明確察知：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即位後不久，便有網羅宮中古籍善本匯聚一處的想法，也已付諸實踐；「天祿琳琅」的肇建，相較於書畫、銅器、陶瓷、古硯、釋道經卷……等專門項目的蒐藏研究，標誌著乾隆皇帝擘劃其大規模整理宮廷傳藏文物，延伸出各類型古物珍玩典藏陳設版圖的起點。換言之，「天祿琳琅」不僅延續了晚明藝文界將古書視作古（文）物（玩）的鑑藏理念，更恢而弘之，成為乾隆皇帝將紫禁城建構成彷彿皇家博物館的第一塊拼圖。

此外，有關光緒朝接續此一特藏脈絡而啟動編輯的《天祿琳琅目錄四編》，過往僅見清人出自傳聞或轉述的零星記載，以及極少數帶有接近「天祿琳琅」藏書之皇家鈐印特徵的存世古籍，聊供類推、揣想，<sup>31</sup>卻未見任何目錄稿本或纂輯資料

要》，《文津學誌》，第 12 輯（2019.6），頁 369-377；潘菲，〈國家圖書館藏「天祿琳琅」元版《通志》第七冊的修復〉，《文津流觴》，2021 年 1 期（總第 73 期），頁 45-48；潘菲，〈國家圖書館天祿琳琅專藏《十七史詳節》單冊修復紀要〉，《文津學誌》，第 18 輯（2022.6），頁 255-263。

30 王曉鈺，〈清宮「天祿琳琅」藏宋刻本《萬卷菁華》修復與裝潢研究〉（濟南：山東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21）；原松邑，〈清宮「天祿琳琅」藏《六家文選》修復裝潢研究〉（濟南：山東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21）；曹萌，〈清宮「天祿琳琅」藏元刻本裝潢形制研究〉，《收藏與投資》，2022 年 1 期，頁 37-39。

31 （清）蕭穆，《敬孚類叢》（天津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二年刊本，索書號：P19228），卷 9，〈書記·記天祿琳琅目錄三四兩編本〉，葉 1-2。劉蕃《書錄》則是將鈐有「宣統御覽之寶」橢圓朱印之《新刊唐昌黎先生論語筆解》以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均歸屬於「天祿琳琅」「四編」書。案此二書現藏臺北故宮，前者為宋乾道淳熙間蜀刊本（統一編號：故善 001278），傳世孤罕；後者《書錄》定為「元建陽書坊刻本」（統一編號：故善 002144-



被錄副流傳，遑論得見「四編」書之確切實物。本文最後一節，也將根據不同類型的檔案文獻繫連互證，嘗試提出光緒朝建立「天祿琳琅」「四編」善本的藏書緣由、基本架構、書目內容、陳設地點、裝潢型態等粗略輪廓，或有可能形成後續研究清宮「天祿琳琅」藏書一個新的起點。期望透過本文的考察，能對研究清代宮廷史、藏書史乃至古物傳存脈絡，提供若干可資參據的線索、材料，或與其他領域、議題相互銜接對話的關懷視角。

## 二、起點和原型

清宮「天祿琳琅」善本特藏肇創於何時？匯度在何處？清代官方早有正式宣告，一再表明藏書始自乾隆九年（1744，甲子年），於乾清宮東夥昭仁殿列架度置。<sup>32</sup> 乾隆皇帝也曾親為申說，在乾隆四十年正月初三（1775年2月2日）所作〈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用天祿琳琅聯句是日復成二律〉的第一首，開篇起句便直道「甲子琳琅輯天祿，因之內殿求昭仁」，且有注云：

辨訂舊版書為「天祿琳琅」，自甲子年始。

當日君臣同作〈天祿琳琅鑒藏舊版書籍聯句〉，篇末御製「舊時寢息仰霄漢」句下，亦有注云：

「天祿琳琅」之書貯於昭仁殿，乃昔日皇祖寢宮也。<sup>33</sup>

降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弘曆撰〈五經萃室記〉，復云：

002159），經比對他館藏本書影，實乃明正統十三年崇化書林善敬堂王宗玉合刊韓柳二先生文集本。參見劉蕃，《書錄》，頁695-698；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冊7，頁251；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冊5，頁288；戶崎哲彦，〈『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合刊初考（上）：明代建陽における韓柳二集合刊本の種類とその刊行年代〉，《島大言語文化》，第38号（2015.3），頁50-56。

32 詳見劉蕃，《天祿琳琅研究》，第一章第二節〈「天祿琳琅」特藏的建立〉，頁22-23。

33（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統一編號：故殿019515-019576），卷25，葉8a、18a。本年新正茶宴舉辦日期，係據《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四十年正月上〉載：「辛亥，……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等茶宴，以『天祿琳琅』聯句。」見（清）慶桂等修，《清實錄·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冊21，卷974，頁3。

自乾隆甲子時，蒼萃宋、元、明三代舊板，藏之昭仁殿，名曰「天祿琳琅」。<sup>34</sup>

一手締造這座皇家善本鑑藏寶庫的當事人現身說法，則「天祿琳琅」之創立年分（乾隆九年）與藏書地點（昭仁殿）確鑿無疑，儼然已成定論。

### （一）乾隆元年：為藏宋版書處製匾

劉薈曾檢出一條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本文以下簡稱「活計檔」）記載的訊息，將乾隆皇帝有意建立「天祿琳琅」善本特藏的時間，向前推進到乾隆四年（1739）。活計檔載：

（二月）十二日，太監趙朝鳳來說，首領鄭愛貴、夏安交御筆「天祿琳琅」匾本文一張、御筆對字一副，傳旨：「着做包錦邊壁子匾一面、對一副，隨鍍金倒環、托掛釘、<sup>35</sup>挺鈎。欽此。」

（於二月二十七日，首領鄭愛貴將御筆「天祿琳琅」匾本文一張，配得包錦邊壁子匾一面、御筆對字一副，隨銅鍍金托掛釘、倒環、挺鈎持去訖。）<sup>36</sup>

這則史料，具體登載乾隆題寫「天祿琳琅」匾額暨對聯的日期，也清楚揭示內務府造辦處製作匾聯的形制、數量、配件、材質等執行細節。學者遂據以認定這便是後來懸掛在昭仁殿內的御匾，並推論「可知早在五年前皇帝即有計劃建立『天祿琳琅』並已題寫匾額、聯句了」。<sup>37</sup>

依循前賢研究基礎和文獻線索的啓示，再經過比較細緻的翻查檢索，於是有了更進一步的發現：「天祿琳琅」其實是乾隆皇帝即位改元後不久，便有意開展的一項古物蒐藏鑑賞專題，同時為其闢設一處專屬的典藏空間。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三日（3月5日），時逢「驚蟄」，正當弘曆初登大寶後還不到五個月，是日黎

34（清）清高宗，《御製文二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統一編號：故殿000340-000363），卷14，葉7b-8a。

35 懸掛壁子匾、對聯的配件，包括以黃銅（或鍍金）製作的倒環、托釘、掛釘、挺鈎等，此處將托釘、掛釘合併簡稱為「托掛釘」。

3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9，乾隆四年二月十二日〈祿作〉，頁5。

37 劉薈，《天祿琳琅研究》，第一章第二節〈「天祿琳琅」特藏的建立〉，頁24。

明猶親詣雍和宮向先帝梓宮行月祭之禮，「哭泣盡哀」，<sup>38</sup> 回宮後即諭令造辦處製作一面顏曰「天祿琳琅」的錦邊壁子匾。活計檔載：

二十三日，首領夏安來說，宮殿監督領侍蕙培盛、首領鄭愛貴、夏安傳旨：「着做錦邊壁子『天祿琳琅』<sup>39</sup> 扁一面。欽此。」

（於本年二月初二日，做得錦邊壁子扁一面，交大監趙朝鳳持去訖。）<sup>40</sup>

「錦邊壁子匾」是目前學者所見清宮遺存室內匾聯中最常見、最簡潔的一種形制，運用木質格柵匾心裝裱皇帝御書，邊框包裹綾錦，體量較輕也便於懸掛，不出十日即可製成。<sup>41</sup> 這是現今所能考見「天祿琳琅」首度出現的文獻記載，意味著一處特定的殿閣空間已然擘劃成形並獲賦予專名。至於這面壁子匾被持去後掛置何處？該空間的實際用途與命名內涵又如何？此際未見分說。可以確定的是，乾隆最初下令製作掛匾時，尚未題寫相應的對聯；就連「天祿琳琅」四字，檔案也不記載為御筆，容或並非出自皇帝親筆所書。

迨及乾隆二年（1737）初夏，皇帝為了御花園內有一處貯藏宋版圖書的地方，命造辦處配製新的書架，遂留下片段檔案記錄，恰好填補了部分關於「天祿琳琅」的重要細節。原來，前一年春天製作的那面錦邊壁子匾，其實正是要懸掛在御花園的這座藏書室，而這樣一個特別的空間以及當典藏、陳設的珍貴古書，乾隆皇帝為它取了一個專屬的名字——「天祿琳琅」。活計檔載：

（四月）初二日，首領鄭愛貴傳旨：「御花園『天祿琳琅』殿內陳設宋板書處，着照現陳設書之格樣，做楠木格子二架，糊藍杭細裡，掛青緞簾。欽此。」

於本月十九日，首領鄭愛貴傳旨：「御花園『天祿琳琅』殿內陳設宋板書處，着照先傳做楠木格子二架樣式，再做格子十九架，中間不必安抽屜。欽此。」

於本年五月初二日，司庫劉山久、催捻曾領弟來說，首領鄭愛貴傳旨：

38 據《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載，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1735年10月18日），「上即皇帝位於太和殿」，見（清）慶桂等修，《清實錄·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9，卷2，頁158。另據臺北故宮藏漢文《起居注冊》，乾隆元年丙辰正月分下載：「二十三日戊午，黎明，上詣雍和宮梓宮前行月祭禮。哭泣盡哀，禮畢回宮。」參見臺北故宮藏官書，統一編號：故官004815。

39 活計檔將「祿」記作「綠」，當為檔案文獻中常見的通假字或傳寫訛誤情形。

4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7，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祿作〉，頁137。

41 參考徐超英，〈淺談故宮藏匾聯的形制特色與文物價值〉，《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4期，頁37-38。

「前者着做楠木格子十九架，不必做楠木，改做杉木格子十九架。欽此。」回明內大臣海望准做，記此。

(於本年五月二十一日，做得楠木格子二架，隨青緞簾十件。領催白世秀送至「天祿琳琅」殿，交首領鄭愛貴收訖。)

(於本年十一月十七日，栢唐阿拴柱將做得杉木格子十九架，交首領梁善收訖。) <sup>42</sup>

無論這些宋版書是在何時或基於何種因緣貯藏於御花園內，吾人或許可以樂觀地推想：自乾隆皇帝即位伊始，便有意識、有計畫地在紫禁城御花園內闢立一處專門貯藏宋版書的空間，並且已經將一定數量的宋版書集中存放於此；歷經一年有餘，針對宋版書抑或其他珍稀古籍的蒐訪徵集活動持續推進，典藏規模漸次擴增，遂有添置新做書架以備容納續入書籍的需求。起初，殿內陳設宋版書的書架應為楠木製成，每架分五層，架樞內裡糊飾藍色杭細織料，<sup>43</sup> 正面每層皆懸掛青色緞質簾子。新製書架原訂按照既有材質、樣式僅增添二架，半個多月後，或因乾隆皇帝思慮未來藏書型態的發展趨勢以及陳設空間的整體規劃，下令追加 19 架不帶抽屜的書格；又過了近半個月，再把追加書格的材質從楠木變更為杉木。簡而言之，在乾隆二年歲末之前，御花園「天祿琳琅」殿內專供庋藏宋版善本的櫃架數量、空間配置可謂大致底定。當然，此後數年，入藏御花園的宋版書可能迭有擴增，不時需要添補書架，或製做相應的配件，例如：乾隆四年二月，要求在南、北稍間新增「栢木包鑲楠木格子」共三件，同樣都安上石青緞簾；乾隆六年（1741）二月，命造辦處製作 32 個「楠木胎包畫絹書格牌子」皆附釘子，<sup>44</sup> 倘若每座書架釘上一塊木牌，外裏畫絹並書寫年代、部類、架次等可資尋檢識別的文字，則殿內藏書總數明顯又充實不少。

憑藉上述史料記載，吾人方得確知：乾隆皇帝在御花園內貯藏宋版古籍的

4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7，乾隆二年四月初二日〈木作〉，頁 653-654。

43 「杭細」或即「杭西」，屬絹類織物的一種。據《天工開物》云：「凡織杭西、羅地等絹，輕素等紬，銀條、巾帽等紗，不必用花機，只用小機。織匠以熟皮一方實座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腰機。」參見（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宋應星刊本，善本書號：04915），卷上，〈乃服第二卷·腰機式〉，葉 38b-39a。

4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9，乾隆四年二月初十日〈皮作〉，頁 40；同書，冊 10，乾隆六年二月初十日〈匠作〉，頁 79。

「天祿琳琅」專殿，曾經先後懸掛兩塊「招牌」。乾隆元年初造的錦邊壁子匾，在乾隆四年替換成一塊御筆新匾，同時添置御筆對聯一副，與新匾相互搭配、呼應，使得這座善本特藏書室的建置規格更見完整、莊重、體面。到了乾隆六年，皇帝對於那塊舊匾壁子（木質格柵匾心）又有了重複利用的新想法，指示將「天祿琳琅」本文取下，匾心尺寸改製得略為縮小，再裱糊上另外題寫的「凝清室」本文，即可供其他殿閣懸掛使用。活計檔載：

（二月）初十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高玉等傳旨：「將『天祿琳琅』壁子匾一面呈覽，欽此。」

於本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天祿琳琅」壁子匾持進呈覽。奉旨：「將『天祿琳琅』本文起下，另寫『凝清室』本文一張，其壁子收小些用。欽此。」

（於本年三月十三日，司庫白世秀將改做壁子糊「凝清室」本文，隨「天祿琳琅」本文一張，持進交訖。）<sup>45</sup>

這塊利用舊料改製的「凝清室」匾，後來當是懸掛於御花園內稍偏西北、背倚宮牆修築的延暉閣上，乾隆十八年（1753）再換上御筆米色絹匾文。<sup>46</sup> 至於兩年前換上的那塊新匾，以及它所代表的「天祿琳琅」善本特藏暨陳設空間，乾隆皇帝也開始醞釀調動這座古物專殿的計畫。翌年（乾隆七年，1742）正月，乾隆下令將御筆「天祿琳琅」錦邊壁子匾移往乾清宮東側的昭仁殿內懸掛，六年多來匯聚御花園中的珍貴圖書，也理所當然地準備整批遷運至新的典藏空間。

## （二）絳雪軒：東壁圖書插架多

依據乾隆七年內務府活計檔案的記載，乾隆四年新製的御筆「天祿琳琅」匾移往昭仁殿後，原處懸掛的錦邊匾額、御筆對聯也隨之替換。活計檔載：

正月初六日，首領夏安來說，太監慙格傳旨：「將御花園降雪軒現掛之『天祿琳琅』匾，着挪在昭仁殿內懸掛。另做『視履考祥』錦邊壁子匾一

4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0，乾隆六年二月初十日〈祿作〉，頁 327。

4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9，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祿作〉，頁 790。另據《國朝宮史》載：「欽安殿之西稍北為延暉閣，閣上御筆扁曰『凝清室』。」（清）蔣溥等編，《國朝宮史》（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三十四年內府朱絲欄寫本，統一編號：故殿 004437-004460），卷 12，〈宮殿二·內廷〉，葉 26b。有關《國朝宮史》之編者，參考陳連營、張楠，《〈國朝宮史〉的編纂與乾隆年間的宮廷學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 年 1 期，頁 92-94。

面，掛在降雪軒殿內，隨錦邊掛屏一件、錦邊掛對一副。欽此。」

匾【心寬八尺，高二尺二寸。邊寬三寸，鑲五重線。】<sup>47</sup>

掛屏【心長六尺，寬三尺二寸。】

掛對【心長六尺，寬一尺二寸。】俱除邊淨心

於正月初八日交出御筆挑山一張、對子一副、匾文一張。

（於本年二月十七日，栢唐阿六十五將「天祿琳琅」匾一面，擲在昭仁殿安掛，再將做得錦邊匾一面、掛屏一件、掛對一副，持進安掛訖。）<sup>48</sup>

至此終於明白，從乾隆元年正月到乾隆七年二月，幾乎整整六年間，專門收藏古籍善本且持續蓄積藏品質量、擴充蒐羅範圍的「天祿琳琅」確切所在地點，正是紫禁城御花園內的絳雪軒。

絳雪軒位處御花園東南角，坐東朝西，面闊五間，俯視平面呈「凸」字形，恰與西南角呈「凹」字形的養性齋兩兩相對。《國朝宮史》載「軒前多植海棠」，<sup>49</sup>並有一座極為精細的琉璃山石花臺。雍正五年（1727），禮部欽天監漏刻科官員管志寧奏呈一份紫禁城各庭院門位相度題本，曾形容「軒內氣色幽深玄遠」，<sup>50</sup>確實是適合休憩、藏書、賞景的絕佳處所。御筆「天祿琳琅」匾移往昭仁殿後，軒內原處則代以御筆「視履考祥」錦邊壁子匾，搭配御筆掛屏、掛對，儘管就此卸下皇家善本特藏書室的專責，乾隆皇帝在多年之後，還是藉由題寫「東壁煥圖書，琳琅滿目」、「西清瞻典冊，經緯從心」（詳下文所引活計檔記載）這樣的對聯文句，將一段精雅且不可謂短暫的書香記憶，凝駐於這座緣乎體物取義、涵容滿園芳霏的御園殿閣之中，也寄寓著乾隆對於《易》理的體認——觀顧自身締創此一古物收藏專題的起點和過程，審察禍福得失之徵兆，俾使新的行動階段歸諸吉慶。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春遊御花園作〈絳雪軒〉詩，起句猶是「東壁圖書插架多」，<sup>51</sup>可見絳雪軒作為乾隆鑑藏古籍善本之肇端，而「天祿琳琅」又可說是乾

47 【】內文字，檔案或古籍原件係以雙行小字騰寫。以下皆同。

4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0，乾隆七年正月初六日〈裱作〉，頁715。檔案中借「降」為「絳」，亦屬同音通假之例。

49（清）蔣溥等編，《國朝宮史》，卷12，〈宮殿二·內廷上〉，葉25b。

50 劉庭風、周娉倩，〈庭院吉氣自何方——一份紫禁城庭院門位相度奏折的圖解〉，《紫禁城》，2020年3期，頁39。又，檔案中「玄」字因避清聖祖玄燁（1654-1722）名諱，皆寫作「元」。

51（清）清高宗，《御製文三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嘉慶間武英殿刊本，統一編號：故殿000364-000371），卷17，葉24b。

隆在位期間開展其宮廷文物蒐藏、整理、研究、賞鑑、陳設之壯闊宏圖的第一步；無論是這個起點本身，抑或對於往後回望一系列鑑藏活動的開端，皆有其特殊意義，誠然不僅止於一處清幽雅致的宮廷花園而已。

就在「天祿琳琅」藏書創建的初始階段，隨著空間機能漸趨完備、典藏內涵愈益精善，甚至已經編訂一部頗具規模的善本特藏總目。活計檔載：

（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交天祿琳瑯書總目外套一件。傳旨：「着另換木胎。欽此。」

（於七年二月初九日，司庫白世秀將總目外套換得木胎，持進交訖。）<sup>52</sup>

此處所述送交造辦處改換木胎書套的「總目」，很有可能正是乾隆朝纂修《國朝宮史》記載的那一部 12 卷本「天祿琳瑯」目錄，其內容包括「宋、元及明諸刻，各以經、史、子、集為序」；<sup>53</sup> 對照前述乾隆六年二月才為御花園絳雪軒訂製 32 個書格牌子，幾個月後又為藏書總目換裝書套，這些或許都可作為吾人想像「天祿琳瑯」藏書原型——乾隆元年至六年肇創於御花園絳雪軒此一階段的線索。換言之，從絳雪軒移往昭仁殿的「天祿琳瑯」，絕非單純臨時起意挪動一塊牌匾，而是有計畫地搬遷一座完整、成熟，包含數十架古籍善本，12 卷完整藏品目錄，以及按照「時代—四部」這般具體結構進行分類編目或架榻陳設的特藏書庫。

距離「天祿琳瑯」善本書室遷出絳雪軒的 16 年後，乾隆皇帝猶不忘重新題寫「視履考祥」匾文暨對聯，欽命送交同屬內務府系統且技藝卓越的蘇州工匠，製作較原先錦邊匾、錦邊掛對更加費工耗時的雕漆匾、雕漆掛對，汰舊換新，益見華美矜重。活計檔載：

（五月）十七日，太監董五經來說，首領桂元交御筆「視履考祥」匾文一張、御筆【東壁煥圖書，琳瑯滿目；西清稽典冊，經緯從心。】對文一張，<sup>54</sup> 傳旨：「着交南邊照本文做雕漆匾、對，邊在內。欽此。」（御花園絳雪軒明殿東牆用）

匾淨【高二尺八寸，寬八尺六寸五分。】

5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0，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匣作〉，頁 104。

53（清）蔣溥等編，《國朝宮史》，卷 33，〈書籍十二·目錄（附）〉，「天祿琳瑯一部」條，葉 32a。

54 案，清內府鈔本《國朝宮史》、《國朝宮史續編》皆作「瞻典冊」。

對淨【長八尺四寸七分，寬一尺六寸七分。】

於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蘇州送到做得雕漆匾、對一分，持進安在養心殿呈覽，奉旨：「着配匾釘、挺鈎安掛。欽此。」<sup>55</sup>

清代宮廷所使用的家具器物，除了直接交付京城內的造辦處承製，許多成本較高、用料精緻、工藝繁複的物件，也會「由造辦處設計畫樣，或撥蠟樣、或做木樣交蘇州、揚州、南京、浙江、江西、廣東等處，由當地最優秀的匠人製作」。<sup>56</sup>相較於乾隆元年、四年製作的「天祿琳瑯」或「視履考祥」錦邊壁子匾、掛對，前後歷時短則不到十日、長則至多月餘便可交件畢事，蘇州製作的雕漆匾暨掛對不僅量體加大，更需耗費長達一年半的時間，才運回宮中呈覽、安掛。而在新的雕漆匾送到之前，內務府也將懸掛多年的舊錦邊壁子「視履考祥」匾加以維修，「舊本文托黃絹一層，另挨壁子糊錦」。<sup>57</sup>

### （三）昭仁殿：書藏新殿換新裝

「天祿琳瑯」藏書最爲世人熟知的代名詞——昭仁殿，乃乾清宮之東暖閣（殿），原名「弘德殿」，萬曆十一年四月七日（1583年5月27日）改稱「昭仁殿」。<sup>58</sup>在雍正皇帝（1678-1735，1722-1735在位）移居養心殿之前，乾清宮向爲明、清二代帝王寢宮，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在位）便曾賦詩讚嘆昭仁殿中雕梁畫棟、崇高壯麗。<sup>59</sup>乾隆六年，皇帝或有感於御花園絳雪軒藏書空間有

5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3，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行文〉，頁608。

56 參考朱家潛，《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前言〉，頁2。

5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4，乾隆二十四年四月初五日〈匣祿作〉，頁428。

58 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中有一件「宮殿額名」冊載：「（乾清宮）東暖殿萬曆十一年閏二月添額名弘德殿，本年四月初七日更昭仁殿扁。西暖殿萬曆七年五月十五日添額名離肅殿，萬曆十一年四月初七日更弘德殿扁。」參見《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185005，葉1b。另見佚名，《明內廷規制攷》，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據借月山房彙鈔本排印），冊845，卷1，頁8。惟排印本「曆」皆作「歷」，「弘」皆作「宏」，「離肅殿」下缺「萬曆」二字。

59 參考劉蓀，《天祿琳瑯研究》，第一章第二節〈「天祿琳瑯」特藏的建立〉，頁22。另見（清）清聖祖，《御製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康熙五十三年蔣漣刊本，統一編號：故殿012018-012039），卷31，〈古今體詩五十二首·昭仁殿〉詩云：「雕梁雙鳳舞，畫棟六龍飛。崇高惟在德，壯麗豈爲威。」葉3a。



限，也期待自己建立的「天祿琳琅」特藏無論數量、品質、種類皆能持續累積延展，同時彰顯紹承皇祖「好書」之先志，<sup>60</sup>遂規畫將祖父寢殿溫室整建為典藏古物的專屬空間。

昭仁殿約莫於乾隆六年歲末動工，翌年二月便已掛上從絳雪軒移來的御筆「天祿琳瑯」匾，四月奏報修繕錢糧。活計檔載：

（十一月）初十日，司庫劉山从、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傳旨：「着員外郎常保畫照仁殿樣呈覽。欽此。」

於十二日，司庫劉山从、白世秀將畫得昭仁殿裝修紙樣二張，交太監高玉轉呈御覽。奉旨：「准做抱厦。正座樣一張，正面床罩不用安花心飛罩，西邊向北床上安夔龍飛罩。西山窓楞塌了，東西順山俱不要。其餘照樣准做。着動造辦處錢糧。欽此。」

於本年十二月十一日，員外郎常保持進書格、地盤樣二張，交太監高玉等轉呈御覽。奉旨：「昭仁殿地盤後圖書格照樣准做，前層有抽屜；書格照樣准做，往後挪二寸，前詹去過，寬二尺一寸。欽此。」

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員外郎常保將昭仁殿典工吉日用造辦處金磚，繕寫摺片一件，交太監高玉轉奏。奉旨：「知道了。欽此。」

於乾隆七年二月初一日，太監楊茂傳旨：「昭仁殿、弘德殿後抱厦二處玻璃瓦片，着用瀛臺拆出或六樣、七樣、八樣瓦；再板壁有蟻壞處，着抽換。欽此。」

於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員外郎常保繕寫得昭仁殿錢糧摺片一件，持進交太監高玉轉奏聞。奉旨：「知道了。欽此。」<sup>61</sup>

製作安裝用以陳設大量書籍的槓架，必然是這項修繕工程重新賦予內廷殿閣空間功能與意義的重點項目。據此略可想像，昭仁殿內的書架當有前、後二層，每層若干架，每架寬約 75 公分；前層書架中間設計裝有抽屜，後層則無。儘管未能考見彼時進呈之書格畫樣，或可藉由嘉慶年間重建昭仁殿後繪製的《天祿琳瑯排架

60 乾隆皇帝於〈昭仁殿〉詩序自稱昭仁殿乃「皇祖在御時，日夕寢興之溫室也，朕弗敢居焉」，詩中復作「好書敢謂承先志」之句。參見（清）清高宗，《御製詩初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統一編號：故殿 012110-012129），卷 44，葉 23。

6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9，乾隆六年十一月初十日〈裝修處〉，頁 694-695。

圖》(以下簡稱《排架圖》),稍加揣摩殿內書架形制。<sup>62</sup>(圖1)

昭仁殿從帝王寢宮暖閣整修為皇家善本圖書的典藏專殿後,殿內陳設和裝飾亦需隨之調整。從活計檔檢得之零星記載來看,從乾隆七年三月初開始,便有若干用品陸續送進安置,如桌上擺放的白瓷紅龍觀音瓶、白玉螭虎觥、宜興四方飛脊文王鼎等件,皆隨底座移入陳設;<sup>63</sup>殿內懸掛一面木邊玻璃鏡配銅鍍金托釘、掛釘,<sup>64</sup>掛鏡對面牆上則是張雨森(1694-?)絹畫錦邊壁子掛屏,尺寸做得跟鏡子同寬;另用畫雲畫斗鷲子、楣杆掛乾隆御筆題張鵬翀(1688-1745)畫詩堂及山水畫,牆上再貼梁詩正(1697-1763)所書挑山和「畫狀元」唐岱(1673-1752後)山水絹畫;<sup>65</sup>殿內寶座上的坐褥(分粧緞、氈氍、葛布、青緞)重新添製或改做,並比照弘德殿鋪設黑毡子與沿青邊燈草涼蓆;<sup>66</sup>後殿鋪沿青緞邊藤蓆,牆上掛著可能是乾隆御筆的白宣紙畫宋花邊挑山且中心滿畫宋花,以及玉掛屏、掛對;<sup>67</sup>殿前抱廈下所掛的燈,則全部換成宮詞燈吊掛回頭穗。<sup>68</sup>此外,部分書格背面會飾以清初書法名家張照(1691-1745)所書橫披或宮廷畫家方琮、金廷標(?-1767)等人的畫作,而殿內有些地方也請郎世寧(1688-1766)繪製油畫或配畫通景畫,<sup>69</sup>

62 《天祿琳琅排架圖》首葉注曰:「前層十五架,寬三尺六寸五分,深一尺三寸;後層二十架,寬三尺三寸五分,深一尺五寸。每架五層,通高六尺八寸五分。」另見焘兩山房編,《故宮圖書及內務檔案史料》(揚州:廣陵書社,2008,據民國二十二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影印本影印),冊1,頁5。

6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0,乾隆七年三月初二日〈裝修處〉,頁668。

6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1,乾隆七年三月初五日〈記事錄〉,頁121。

6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0,乾隆七年四月初二日〈裱作〉,頁674;同書,同冊,乾隆七年三月初三日〈裱作〉,頁684;同書,同冊,乾隆七年三月十五日〈裱作〉,頁685。張雨森、唐岱之生卒年,參考聶崇正,〈清代宮廷畫家唐岱和張雨森〉,《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4期,頁9-12。

6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1,乾隆七年三月初二日〈皮作〉,頁178;同書,冊15,乾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皮作〉,頁305-306。

6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3,乾隆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裱作〉,頁496。另參考翁宇雯,〈乾隆朝《活計檔》中的「宋花邊」〉,《故宮學術季刊》,第35卷第2期(2017.6),頁141-211。作者指出:「以『宋花邊』為裝飾的文物,除了乾隆十一年至十五年間(1746-1750)的七條紀錄未明確寫出作者,其餘全部是清高宗『御筆』作品。因此,『宋花邊』並非一般紋飾,在宮廷藝術中可能隸屬更高層次的級別與內涵。」

6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3,乾隆十年正月初三日〈燈作〉,頁342。

6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1,乾隆

頗見巧思也兼具富麗與雅趣。當然，殿中陳設絕非長年不變，乾隆七年擺放桌上的觀音瓶、白玉觥、文王鼎，到了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八日（1756年11月29日）所立《昭仁殿陳設冊》，<sup>70</sup>已經不見蹤跡，改換成其他物件。

不僅宮殿格局、空間配置、殿內陳設、用具裝飾皆有所異動，從御花園絳雪軒移藏的珍貴圖書也全部換上新裝，並選擇不同的材質、顏色製作裝盛書冊的函套，用以區分這些藏品的版本年代，兼示其級別等第。活計檔載：

（乾隆九年八月）初五日，首領鄭愛貴傳旨：「天祿琳琅宋板、元板、明板的書套，着換杉木板做套外，宋板用錦糊，元板用淺藍絹糊，明板用深藍絹糊。再，除派造辦處官一員，除派武英殿官一員監管。欽此。」<sup>71</sup>

在這條史料發現之前，世人對於「天祿琳琅」藏書裝潢規制的理解和想像，僅能根據乾隆四十年（乙未年）編定之《前目》卷首〈凡例〉所述：

……籤題舊未畫一者，今悉更正套籤；於舊藏者添識「乙未重訂」，續入者則識「乾隆乙未重裝」，用志哀集次第。

……其宋、金板及影宋鈔，皆函以錦；元板以藍色緋，明板以褐色緋，用示差等。<sup>72</sup>

如今看來，「天祿琳琅」特藏在乾隆七年整批遷入昭仁殿之前，不僅具備一定的規模，從專藏宋版書擴展至兼收宋、元、明三朝善本，也編有一部「總目」，此時正好換上新的木胎書套，伴隨藏品搬遷，備供稽檢，也作為昭仁殿從寢宮轉型為書房的陳設書目。<sup>73</sup>乾隆九年，是弘曆御極後第一個、也是清朝開國後的第二個甲子年；前一個甲子年，正是祖父康熙皇帝首次南巡的時候。乾隆或許格外看重這個

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祿作〉，頁711；同書，冊11，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如意館〉，頁377-378；同書，冊20，乾隆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如意館〉，頁375；同書，冊27，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初十日〈如意館〉，頁167。

70 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8），卷5。冊5，頁281-282。

7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2，乾隆九年八月初五日〈匣作〉，頁299。

72 （清）于敏中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內府寫本，統一編號：故殿025468-025477），〈凡例〉，葉2。

73 乾隆二十一年所立《昭仁殿陳設冊》，記載明殿正寶座左邊洋漆香几上陳設「天祿琳琅書目壹套」並「周諸孟卣壹件」，應當便是這部「總目」。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冊5，頁281。

「起點」應當擔負某種承先啓後的意義，爲了標誌並彰顯一個全新階段的開始，便下令將「天祿琳琅」藏書既有的函套，不論何種形式、材質，全部改用杉木版製做，再按照古書時代，外層糊飾織錦或淺藍色、深藍色的絹面，齊整中寓以等第之別。因此，30年後的書目〈凡例〉第一條也才會這樣起筆：

「天祿琳琅」彙自乾隆甲子年，冊府重裝，標函列架，閱今三十餘載。<sup>74</sup>

換言之，乾隆九年既是「天祿琳琅」藏書的里程碑，也是一道分水嶺。此時所有書籍第一次重新裝潢，新製杉木板錦套、絹套，按照宋版、元版、明版時代先後、函套材質色系或是已經纂輯成編之「總目」著錄體例，排定度藏陳設的順序和位置，逐部、逐函歸架。整座昭仁殿善本特藏由內而外，美輪美奐、氣象一新。

乾隆甲子（九）年「初定」各書，<sup>75</sup>是爲「舊藏」；此後迄至乙未（四十）年之前，藉由蒐羅、進呈等不同方式進入昭仁殿的歷代善本，則屬「續入」；蓄積日久，蒐藏愈富，「視舊益加廣焉」。迄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詔開四庫館之後，乃思「以舊藏、續入諸種，編輯書目，以合於古者秘書分中、外之義」，<sup>76</sup>遂再一次啓動對於殿中古書的全面整理、重新審定，也是乾隆朝「天祿琳琅」特藏最終定型的階段。此時匯合所有「舊藏」、「續入」之書，一方面仔細考證、鑑別每一部書的版本時代，存真去僞、裁汰贗刻，<sup>77</sup>編定成10卷本的《前目》，著錄400餘部精品；另一方面則是再度裝潢這些確定能留在昭仁殿的「天祿琳琅」皇家特藏，宋版、金版及影宋鈔本仍用織錦函套，元版書函套裱糊藍色緜，明版書則改用褐色緜面。爲便於區辨古物鑑藏的時間先後，順勢統一所有函套題籤的書寫格式，將這400餘部善本中屬乾隆甲子以前「舊藏」者，套籤加註「乙未重訂」；甲子之後「續入」者，則標識「乾隆乙未重裝」。以是〈天祿琳瑯鑒藏舊版書籍聯句〉福隆安（1746-1784）作「甲觀聯披甲子裝」句下有注云：

74（清）于敏中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凡例〉，葉1a。

75 乾隆四十九年（1784）作〈五經萃室聯句〉「昭仁仍弗出前目」句下注：「昭仁殿『天祿琳琅』各書初定於乾隆甲子年，至乙未年復命內廷翰臣等重輯書目。」（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嘉慶元年武英殿刊本，統一編號：故殿000256-000311），卷1，葉33a。

76（清）于敏中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凡例〉，葉1a。

77 可參考拙文〈贗製還應重訂正——說乾隆朝天祿琳琅撤出書〉，《故宮文物月刊》，368期（2013.10），頁56-67。又，篇題暨內文徵引〈天祿琳瑯鑒藏舊版書籍聯句〉，武英殿刊本原文爲「贗製還因重訂正」，筆者於撰（校）稿時未及檢出，今當改正。另可參考劉蕃，《書錄》，附錄一〈天祿琳琅目外書·前編目外書〉，頁635-658。

書自乾隆甲子重裝以來，凡有所得，均籤書年月，以誌鑒藏先後。<sup>78</sup>

至此，方可謂藏書美備，薈萃琳琅，新舊臚陳，秩然有紀。

綜合以上列舉解析的檔案文獻，有助於更加明確地勾勒出乾隆年間創建、整理「天祿琳琅」藏書的階段性輪廓：首先，自乾隆元年正月至乾隆六年底，乾隆皇帝將御花園絳雪軒庋藏宋版書處題匾命名「天祿琳琅」，隨即漸次擴充藏書規模與範圍，博采歷代古籍善本，並初步編撰為 12 卷本之總目，奠定以「時代（宋、元、明版）—四部（經、史、子、集）」建構藏品著錄序次之體例，是為創始階段。其次，自乾隆七年二月至乾隆九年八月，絳雪軒「天祿琳琅」悉數移藏昭仁殿，重新改換書籍函套，劃一樣式，依據宋版、元版、明版，分別以織錦及淺藍、深藍色絹裹覆杉木板，象徵這座皇家善本特藏的地點、數量、類例、裝潢正式宣告確立，是為初定階段。最後，自乾隆九年八月至乾隆四十年正月，數十年間，迭有新獲善本續入昭仁殿，為求版本時代之真確精善，遂再度展開全面檢視鑑別，撤出先前誤判或偽贗之品，編纂成 10 卷定本《前目》，也重新換裝函套面料、顏色，宋版、金版、影宋鈔沿用錦套，並於套籤標明書籍入藏「天祿琳琅」的時間，是為乾隆朝所有古物鑑藏活動中古籍善本專項重整成型的完善階段。

### 三、藏書幾何？

乾隆肇建、嘉慶續輯的「天祿琳琅」，總共收藏多少古籍善本？亦即《前目》、《後目》各自著錄的數量為何？學者綜整各家說法，並覈對光緒十年（1884）王先謙（1842-1918）二編書目合刻本，得出一個比較明確的統計數字：《前目》著錄 429 部，《後目》著錄 664 部。<sup>79</sup> 然而，王氏刊本是否如實重現兩朝內府特藏的完整面貌？又按前、後二編書目體例，每部善本皆註明裝訂為幾冊、共盛入幾函，當能據以統計出實際載錄的函數與冊數，或有助於更具體而完整地理解乾、嘉年間「天祿琳琅」列架庋置、籤羅縹碧的典藏規模。

本文採用臺北故宮典藏乾隆內府鈔本《前目》以及嘉慶內府鈔本《後目》，<sup>80</sup>

78（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卷 25，葉 11b。

79 詳見劉薈，《天祿琳琅研究》，第一章第一節〈「天祿琳琅」特藏的建立〉，頁 44-46。

80（清）彭元瑞等編，《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嘉慶間內府鈔

覆核王先謙刊本，嘗試探究其間著錄異同之因由。《前目》另參酌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校訂繕錄之《欽定四庫全書薈要》（以下簡稱《薈要》）本與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校訂繕錄之《四庫》本；<sup>81</sup>《後目》則另參酌嘉慶朝內府繪製之《排架圖》，「宣統十四年」（民國十一年，1922）遜帝溥儀（1906-1967）《賞溥傑書畫目》、《收到書畫目錄》<sup>82</sup>或本文後節所要介紹光緒年間清查書單的相關記載，兼及學者訪查存世「天祿琳琅」遺書之目驗實錄，以期提高覈校內容之準確度。

### （一）《前目》著錄部、函、冊數

依據乾隆內府鈔本重新點算《前目》著錄部數，實為：宋版 71 部，金版 1 部，影宋鈔 20 部，元版 86 部，明版 252 部，通計 430 部；其與王先謙刊本唯一不同之處，乃王刊本著錄明版書為 251 部。這一部之差，出現在卷 7〈明版經部〉之《六經圖》，內府鈔本著錄有四部，王刊本則是三部。茲表示如下：

表一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明版《六經圖》著錄異同表

乾隆內府鈔本	王先謙刊本
<p>《六經圖》【一函六冊】 宋楊甲撰，不分卷。前明顧起元序，次載校刊姓氏、宋苗昌言原序。 顧起元序稱：「新都吳氏，購得宋本，始授梓人。計部大夫汝南方公覽而善之，謀於同察諸大夫，出帑羨復刻而存於署。」……</p>	<p>《六經圖》【一函六冊】 宋楊甲撰，不分卷。前明顧起元序，次載校刊姓氏、宋苗昌言原序。 顧起元序稱：「新都吳氏，購得宋本，始授梓人。計部大夫汝南方公覽而善之，謀於同察諸大夫，出帑羨復刻而存於署。」……</p>
<p>《六經圖》【一函六冊】 篇目同前，顧起元序及校刊姓氏俱闕。 此書即前版，書費見其樸刻精良，遂割去序文并校刊姓氏，以希僞充宋槧也。……</p>	<p>《六經圖》【一函六冊】 篇目同前，顧起元序及校刊姓氏俱闕。 此書即前版，書費見其樸刻精良，遂割去序文并校刊姓氏，以希僞充宋槧也。……</p>

本，統一編號：故殿 025478-025487)。

81 收入《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6），冊 242，頁 509-78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675，頁 335-592。校訂繕錄年月依據二本書前提要署記之校上時間。

82 此二種目錄，原係民國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養心殿物品所檢得之「賞溥傑（字畫）單」一束以及「收到（交下字畫）單」一束，貯於一雕漆匣內，編為「呂字五二四」號。收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34），頁 1-32。另參見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民國十四年至十九年排印本，統一編號：購善 000186-000213），第 3 編第 4 冊《養心殿》，卷 1，〈養心殿〉，頁 33。

乾隆內府鈔本	王先謙刊本
<p>《六經圖》【一函六冊】 篇目同前，顧起元序及校刊姓氏俱闕。</p>	
<p>《六經圖》【一函六冊】 篇目同前，顧起元序及校刊姓氏俱闕。 以上二書，與前第二部，皆曾經書賈之手，作偽伎倆如出一轍。然是書之善摹宋槧，亦可概見。</p>	<p>《六經圖》【一函六冊】 篇目同前，顧起元序及校刊姓氏俱闕。 以上二書，與前第二部，皆曾經書賈之手，作偽伎倆如出一轍。然是書之善摹宋槧，亦可概見矣。<sup>83</sup></p>

又，《國朝宮史續編》亦載「明版六經圖 不分卷 重本凡四部」。<sup>84</sup> 經比對稍晚傳鈔之《薈要》本與《四庫》本，同樣皆著錄為四部，文字內容與內府鈔本大抵一致，唯第二部提要後摹錄之印記順序略有小異。<sup>85</sup> 再就內府鈔本提要敘述觀之，第一部有明人顧起元（1565-1628）序暨校刊姓氏，表明為明代翻刻宋本；第二、三、四部皆將顧序及校刊姓氏撤除，顯係書賈慣用偽充宋槧原本的手段，故提要所稱「以上二書，與前第二部」，蓋指這三部而言。王刊本只見後二部為假宋本，究其文意，即生齟齬；可見王氏據以校刻的底本，當是傳寫時不慎遺漏原書目之第三部。案此四部《六經圖》皆裝訂為1函6冊，後三部提要首段文字又完全相同，傳鈔或校刻一時失察，極易將第三、四部書合併為一個條目，遂致此誤。

乾隆內府鈔本《前目》著錄之函、冊數，另有幾處與王刊本不同。茲參照《薈要》暨《四庫》本所載，試為覈校如下：

卷2，〈宋版子部〉《容齋三筆》1函4冊，《薈要》本、《四庫》本皆同；王刊本作「一函三冊」，當從鈔本改。

83 《薈要》本、《四庫》本皆有「矣」字。

84 (清)慶桂等纂，《國朝宮史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嘉慶十一年內府朱絲欄寫本，統一編號：故殿004461-004560)，卷79，〈書籍五·鑒藏一·昭仁殿天祿琳琅前編〉，葉26b。

85 臺北故宮藏乾隆內府鈔本所錄藏印順序為：「行遠」、「南昌袁氏家藏」、「漢陽太守印」、「項子京家珍藏」、「項子京家藏印」、「翠微山莊」、「子子孫孫其永保之」；《四庫》本、《薈要》本以及王先謙刊本皆作：「項子京家珍藏」、「行遠」、「漢陽太守印」、「南昌袁氏家藏」、「項子京家藏印」、「翠微山莊」、「子子孫孫其永保之」。參見(清)于敏中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內府鈔本)，卷7，葉19b；(清)于敏中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薈要》本)，冊242，頁681；(清)于敏中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四庫》本)，冊675，頁494；(清)于敏中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清光緒十年王先謙刊本，請求番号：別053-0003)，卷7，葉21a。

卷3，〈宋版集部〉《黃氏補千家註杜工部詩史》1函13冊，《薈要》本、《四庫》本皆同；王刊本作「一函十二冊」，當從鈔本改。

卷5，〈元版史部〉《史記》第三部8函64冊，《薈要》本、《四庫》本、王刊本皆作「六函六十四冊」。案64冊分裝8函、每函8冊，自是勻稱合理，然《薈要》、《四庫》皆作6函，亦不無可能。北京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北京故宮」）所藏另一部內府鈔本記作「八函六十四冊」，<sup>86</sup>則《薈要》、《四庫》當是採用其他底本逐錄，而幾部內府鈔本之間也或有異文，值得通檢互校。此處暫且先從鈔本改。

卷6，〈元版集部〉《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第三部1函12冊，《薈要》本、《四庫》本皆同，王刊本作「一函十三冊」；《欒城集》第一部2函30冊，《薈要》本、《四庫》本皆同，王刊本作「三函三十冊」，皆當從鈔本改。

卷8，〈明版史部〉《陳書》第一部2函16冊，《薈要》本、《四庫》本皆同；王刊本作「一函六冊」，當從鈔本改。

卷9，〈明版子部〉《五倫書》第三部4函62冊，《薈要》本、《四庫》本皆同，王刊本作「四函二十六冊」；《南華真經副墨》1函6冊，《薈要》本、《四庫》本皆同，王刊本作「一函四冊」；《初學記》第一部5函30冊，《薈要》本、《四庫》本皆同，王刊本作「五函二十冊」；《初學記》第三部3函31冊，《四庫》本同，《薈要》本作「三函十一冊」，王刊本作「四函三十二冊」，皆當從鈔本改。

此外，卷7〈明版經部〉著錄之《改併五音集韻》第一部，臺北故宮藏乾隆內府鈔本未記函、冊數，《薈要》本、《四庫本》、王刊本以及前述北京故宮藏另一部乾隆內府鈔本皆作「二函十冊」，當據以訂補。

綜合上述，乾隆四十年最終確定之「天祿琳琅」善本特藏規模，以及《前目》纂定之著錄數量，應為：430部、1,565函、11,548冊。可重新製表如下：<sup>87</sup>

86（清）于敏中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內府鈔本，書號：抄12331-12340），卷5，葉22a。據北京故宮網站介紹，該院典藏三部乾隆內府鈔本《前目》，裝潢各異：「一為織錦書面及書函；一為石青絹書面及書函；一為米色紙面、石青絹函套。」筆者委請該院圖書館員及章偉先生代為查閱，此為其中一部；封面用米色地五色朵花龜背紋仿宋錦，明黃暗花緞書籤，籤題「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參見北京故宮典藏《欽定天祿琳琅書目》網站介紹：<https://reurl.cc/ykWzVq>。（朱賽虹撰，檢索日期：2022.10.10）

87《前目》頗有書籍分部歸類失誤者，此處暫先按照原本著錄部類計算。分類誤例：卷2〈宋版子部〉之《嘯堂集古錄》，卷4〈影宋鈔子部〉之《考古圖》，卷7〈明版經部〉之《國語》，卷9〈明版子部〉之《戰國策》，卷10〈明版集部〉之《歷代名臣奏議》，均應入「史部」；卷



表二 乾隆朝《欽定天祿琳琅書目》著錄數量統計表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合計
宋版 金版	部	19	18	10	25	72
	函	42	84	19	75	220
	冊	277	615	113	548	1,553
影宋鈔	部	8	4	4	4	20
	函	10	13	4	7	34
	冊	47	66	12	32	157
元版	部	14	28	16	28	86
	函	29	222	26	65	342
	冊	192	1,960	193	514	2,859
明版	部	58	55	70	69	252
	函	154	386	210	219	969
	冊	983	2,643	1,689	1,664	6,979
總計	部	99	105	100	126	430
	函	235	705	259	366	1,565
	冊	1,499	5,284	2,007	2,758	11,548

## (二)《後目》著錄部、函、冊數

嘉慶朝重建昭仁殿「天祿琳琅」特藏並續輯《後目》之著錄總數，比對內府鈔本與王先謙刻本皆為 664 部，殆無可疑。至於殿中庋藏群書的函數與冊數，鈔本與刊本尚有幾處出入，試為覈校如下：

卷 1，〈宋版首部〉御題《班馬字類》1 函 3 冊，王刊本作「一函五冊」。今原書 3 冊尚存，<sup>88</sup> 當從鈔本改。

卷 2，〈宋版經部〉《大易粹言》1 函 20 冊，王刊本同。惟古籍一函裝盛 20 冊者，殊非常態，且《排架圖》「前層第一架」已繪出四函並各標號次，光緒朝清查書單與《賞溥傑書畫目》皆記作「四函」、「四套」，<sup>89</sup> 當據以改訂為 4 函 20 冊。

3 〈宋版集部〉之《蘭亭考》，卷 5 〈元版經部〉之《大學衍義》，〈元版史部〉之《自警編》、《山海經》，卷 6 〈元版集部〉之《新編古賦題》、《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 7 〈明版經部〉之《大學衍義》、《童蒙訓》、《養正圖解》，卷 8 〈明版史部〉之《帝學》、《水經山海經》，卷 10 〈明版集部〉之《詩學大成》、《龍筋鳳髓判》，均應入「子部」；卷 8 〈明版史部〉之《班馬字類》，應入「經部」；卷 9 〈明版子部〉之《唐詩紀事》，應入「集部」。

88 劉薈，《書錄》，頁 8-9。

89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賞溥傑書畫目》，葉 3b，「宣統十四

卷3,〈宋版經部〉《春秋經傳集解》第六部4函32冊,王刊本作「四函三十一冊」。今原書32冊尚存,<sup>90</sup>當從鈔本改。

卷4,〈宋版史部〉《校正北史詳節》2函,鈔本未記冊數,王刊本作「二函十二冊」。原書28卷,今尚存26卷、13冊,係每二卷裝釘成一冊,<sup>91</sup>當據以訂補為2函14冊。

卷5,〈宋版子部〉《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第一部2函12冊,王刊本作「二函十一冊」,今原書12冊尚存;<sup>92</sup>《梁谿漫志》1函3冊,王刊本作「一函二冊」,今原書3冊尚存;<sup>93</sup>《初學記》2函15冊,王刊本作「一函十五冊」,《排架圖》「前層第七架」記作「宋版初學記二函」;<sup>94</sup>《西京雜記》1函2冊,王刊本作「一函一冊」,今原書2冊尚存,<sup>95</sup>皆當從鈔本改。

卷6,〈宋版集部〉《盧戶部詩集》,鈔本未記函、冊數,王刊本作「一函三冊」,《排架圖》「前層第八架」記作「宋版盧戶部詩集一函」,今原書3冊尚存,<sup>96</sup>當據以改訂為1函3冊。《臨川先生文集》第二部4函40冊,王刊本作「四函十四冊」,當從鈔本改。<sup>97</sup>

卷7,〈宋版集部〉《漫塘劉先生文集》1函10冊,王刊本作「二函十冊」,

年」八月二十三日賞溥傑。

90 劉薈,《書錄》,頁67-68。

91 劉薈,《書錄》,頁137-138。合中國國圖與黑龍江省圖書館二家所藏,尚闕一冊(卷5、6),且中國國圖藏本第14冊猶帶原黃綾書籤。

92 劉薈,《書錄》,頁174-175。

93 劉薈,《書錄》,頁187。

94 煮雨山房編,《故宮圖書及內務檔案史料》,冊1,頁11。

95 劉薈,《書錄》,頁199-200。

96 煮雨山房編,《故宮圖書及內務檔案史料》,冊1,頁12;劉薈,《書錄》,頁218-219。

97 《後目》卷6著錄二部《臨川先生文集》,第一部2函20冊,提要稱「前有紹興十年黃次山序」;第二部4函40冊,與前一部「係一版摹印」。劉薈《書錄》研判第一部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應雲鸞刊本,今僅存8卷、3冊;第二部為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遷刊本,現藏日本鹿兒島大學圖書館,另有一冊(目錄上)藏中國國圖。參見劉薈,《書錄》,頁229-231。案經訪查海內外應雲鸞刊本書影,卷首為吳澄〈臨川王文公集序〉,無總目;半葉11行,行22至24字,花口,四周雙邊,雙黑魚尾;書口刻「荊公文集」,上魚尾下刻卷次,下魚尾下刻葉次,卷端大題「臨川王先生荊公文集」;此與《書錄》所記殘卷版式迥異,當非《後目》著錄之版本。《後目》著錄二部,應皆屬何遷翻刻杭州本系統,第一部即鹿兒島大學藏本,首尾完整,光緒中後期已輾轉流出宮外;第二部在光緒二十年清查昭仁殿藏書時(詳下節所述)尚完整無缺,「宣統十四年」溥儀賞賜溥傑、盜運出宮後散逸,現存殘帙包括:中國國圖藏目錄上、1冊,卷12至14、卷18至20共2冊;吉林省博物院藏卷95至96共1冊,合計9卷、4冊。

《排架圖》「前層第九架」記作「宋版漫塘劉先生文集二函」，今原書尚存，<sup>98</sup>其杉木板仿宋錦套係屬同治、光緒年間修補重製，而分裝2函則猶仍舊貌，當據以改訂為2函10冊。

卷8，〈元版經部〉《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第二部2函10冊，王刊本作「四函十六冊」，《排架圖》「前層第十二架」記作「元版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二函」，今原書尚存，書冊頗寬大，其杉木板糊緇黃地三色朵花龜背紋仿宋錦套亦為同、光時重製，而函數則沿用嘉慶朝舊制，<sup>99</sup>當從鈔本改。

卷9，〈元版史部〉《文獻通考》6函60冊，王刊本同，唯《排架圖》「前層第十四架」已繪出12函並各標號次，光緒朝清查書單亦記曰「今作十二函」，當據以改訂為12函60冊。

卷13，〈明版經部〉《音韻日月燈》4函22冊，王刊本同，今原書尚存，覆核其原始分裝冊數暨每冊首、末葉鈐印，實為20冊，<sup>100</sup>當據以改訂為4函20冊。

卷15，〈明版史部〉《四明尊堯集》1函2冊，王刊本作「一函一冊」，今原書2冊尚存，當從鈔本改。<sup>101</sup>

卷16，〈明版子部〉《南華真經》第一部2函16冊，王刊本作「三函十六冊」，《排架圖》「後層第十架」記作「明版南華真經二函」，當從鈔本改。

卷17，〈明版子部〉《姓氏急救篇》1函4冊，王刊本作「一函一冊」，今原書4冊尚存，當從鈔本改。<sup>102</sup>

卷19，〈明版集部〉《六家文選》第一部6函30冊，王刊本作「六函二十冊」，今原書尚存，覆核其原始分裝冊數暨每冊首、末葉鈐印，實為31冊，<sup>103</sup>當據以改訂為6函31冊。

卷20，〈明版集部〉《唐百家詩集》6函60冊，王刊本作「六函八十冊」，

---

98 煮雨山房編，《故宮圖書及內務檔案史料》，冊1，頁13；劉蕃，《書錄》，頁245-246。

99 劉蕃，《書錄》，頁308。

100 劉蕃，《書錄》，頁427-429。

101 劉蕃，《書錄》，頁456-457。

102 劉蕃，《書錄》，頁532-533。

103 劉蕃，《書錄》，頁592-594。

今日所見 80 冊內含民國初期傅增湘（1872-1949）購藏後配入之二十餘家，<sup>104</sup>原裝書冊必不至此數；《菊坡叢話》2 函 16 冊，王刊本作「二函十八冊」，今原書 16 冊尚存，皆當從鈔本改。<sup>105</sup>

綜合上述，嘉慶三年（1798）完成重建昭仁殿、恢復「天祿琳琅」特藏以及續纂《後目》之著錄數量，應為：664 部、1,823 函、12,308 冊。可重新製表如下：

表三 嘉慶朝《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數量統計表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合計
宋版 影宋鈔	部	74	40	56	73	243
	函	130	183	103	185	601
	冊	767	1,336	630	1,336	4,069
遼版 影遼鈔 金版	部	2	0	1	0	3
	函	2	0	4	0	6
	冊	10	0	32	0	42
元版	部	27	26	25	42	120
	函	48	114	60	85	307
	冊	303	754	373	623	2,053
明版 明鈔	部	58	45	78	117	298
	函	128	294	211	276	909
	冊	850	1,741	1,562	1,991	6,144
總計	部	161	111	160	232	664
	函	308	591	378	546	1,823
	冊	1,930	3,831	2,597	3,950	12,308

藉由這次較為全面而詳細的覆核，大致釐清乾隆、嘉慶兩朝內府善本特藏的具體規模，可以作為後續討論嘉慶續輯的這批書籍歷經耗損離散，每每需要重新清查盤點時的參考基礎，或有助於更完整地勾勒出「天祿琳琅」藏書二百餘年佚存變遷的量化軌跡。此外，透過比勘內府鈔本與通行刊本對於數量註記的異同，不難察覺王先謙校刊本雖具刊布廣傳、嘉惠學林之功，亦多有文字或數字因其參用底本傳鈔錯漏導致訛誤的缺憾；於今觀之，確非善本。2007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二編書目整理本，整理者以王刊本作為標點底本，雖云參校文淵閣《四

104 劉薈，《書錄》，頁 622-624。

105 劉薈，《書錄》，頁 626-627。

庫》本與其他未明言之「他書」，<sup>106</sup> 猶未將各本著錄條目暨函、冊數量之歧異處摘出，殊感可惜。時至今日，有關「天祿琳琅」書目版本乃至藏書實物的調查研究漸臻周備，倘若能蒐遍內府鈔繕各本先予通檢互覈，形成最接近內府書目編定原貌的底本，再則《前目》參校《薈要》、《四庫》暨其他傳鈔本，《後目》兼採《排架圖》、各家鈔本、王先謙刊本乃至現存原書的實物樣貌綜合稽考，學界當可以期待一部更見完善的匯校本；同時，容或能在重新點校的過程中，梳理出傳鈔各本之間的關聯性，從而發覺若干錯誤訊息是如何經由轉錄、因襲，最終固著於刻本中化身千萬，卒令書目局部失真的文獻流變線索。

#### 四、光緒二十年全面清查

清宮對於「天祿琳琅」藏書的點檢維護，時間較早也相形隱蔽的痕跡，遺留在嘉慶年間內府繪製的《排架圖》上。其後層第 12 架至 20 架，即自《後目》卷 17〈明版子部〉以降至卷 20〈明鈔諸部〉，當中 16 部書籍的末函格線上，貼有一長方形白紙黏籤，墨筆註記「餘○函」；<sup>107</sup> 儘管黏籤時代尚難考知，猶可藉以推想部分書籍曾經出現清查實際裝函數量與書目或《排架圖》登載未盡相符的情形。其後則是道光元年（1821）、同治十三年（1874）以及光緒二年（1876），數度進行大規模的藏品點查與修復，這也造成存世絕大多數「天祿琳琅」書早已不復可見嘉慶朝續輯昭仁殿善本特藏的裝潢原貌。<sup>108</sup> 而在光緒六年（1880）之前繕錄的一份《乾清宮等處書目》中，「昭仁殿」一處陳設書籍如下：

《天祿琳琅書目》一部二套

「天祿琳琅」三百九十六部 計一千四百十一套

仿宋版五經一部十二套（黏籤：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一日喜錄傳上要去）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一部四十二套

106 (清)于敏中、彭元瑞等著，徐德明標點，《天祿琳琅書目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整理說明〉，頁 2。

107 煮雨山房編，《故宮圖書及內務檔案史料》，冊 1，頁 31-39。書籍函格白紙黏籤豎註記樣式，可參見圖 1。「餘○函」意指較《排架圖》所繪尚多出若干函。

108 參考楊玉良，〈清宮保護善本古籍小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91 年 2 期，頁 83-90；劉蕃，《天祿琳琅研究》，第一章第三節〈天祿琳琅藏書的典守、利用與維護〉，頁 57-60；曾紀剛，〈院藏「天祿琳琅」書衣小識〉，收入宋兆霖主編，《護帙有道：古籍裝潢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 264-290。

《欽定勦平捻匪方略》一部三十二套  
 列聖御製詩文集二十九部 一分計七十六套，餘安十五分  
 大清聖訓九朝九部 六分，每分計四十八套  
 《順天府志》一部八套 每套八本<sup>109</sup>

此時殿內實存「天祿琳琅」書 396 部、1,411 函，約為《後目》原始著錄部數的六成，以函數計則近八成，且無細目可稽。不過，根據目前考察知見的檔案文獻，就在光緒二十年，適逢慈禧太后（1835-1908）六旬壽辰之年，德宗載湉（1871-1908，1875-1908 在位）受戶部尚書翁同龢（1830-1904）影響並採納其建議，曾經針對「天祿琳琅」藏書進行一次全面的清查整理並留下相關盤點紀錄。

### （一）三月十五日：詳查昭仁殿書籍

光緒皇帝親政後，儘管大權猶為慈禧太后掌控，「每日章疏，上閱後皆封送（頤和）園中」，<sup>110</sup> 卻未嘗稍減其亟欲勵精圖治、關注典籍文教的意念。在帝師翁同龢的耳濡目染下，不僅頗留心於碑版目錄之學，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3 年 12 月 30 日）翁氏更刻意「以天祿書目進」，<sup>111</sup> 因而對這批內府善本特藏的歷史淵源、文物內涵形成初步認識甚或醞釀出興趣之後，遂責成南書房翰林檢查宮中現存「天祿琳琅」藏書。

翰林院編修陸寶忠（1850-1908）於光緒十七年（1891）承旨在南書房行走。<sup>112</sup> 據其年譜記載，光緒二十年三月十五日「奉硃諭檢查天祿琳瑯書籍」，<sup>113</sup> 十六日便偕同徐郃（1836-1908）、陸潤庠（1841-1915）、吳樹梅（1845-1912）、

109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內廷中路·後三宮區·乾清宮〉，冊 4，頁 745-746。據書目中載錄養性齋陳設「《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部四套」下有黃籤註記「光緒六年七月十三日上要去」，推測該檔冊繕錄時間當在此年之前。參見同書，同冊，頁 776。

110（清）惲毓鼎，《崇陵傳信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影印），冊 446，頁 364。

111（清）翁同龢著，陳義杰整理，《翁文恭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光緒十九年癸巳〉，冊 5，頁 2651。

112 參見《陸寶忠傳包》（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故傳 011503），〈陸寶忠事蹟冊〉載有「南書房行走」，「（光緒）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113（清）陸寶忠編、陳宗彝續編，《陸文慎公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據民國十二年鉛印本影印），冊 177，卷上，「光緒二十年甲午四十五歲」，頁 58-59。

張百熙（1847-1907）等南書房同仁前赴昭仁殿檢書。《陸文慎公年譜》記曰：

昭仁殿在乾清宮之東，聖祖當年寢宮也。殿制儉樸，僅五間；後隔置一室，即御榻。乾隆間為藏書之所，凡最精本，皆蓋「天祿琳琅」、「石渠秘笈」小璽。同治初年，由內務府派員查過，所寫之簽，不無錯誤，且有殘缺者，皆發武英殿。此次清查，上命逐一點檢、換籤，並繕書檔，一呈覽，一存書房。次日，添派毓慶宮師傅翁同龢、孫家鼐二公會同檢閱。四月初一日檢齊，分別經、史、子、集安架畢。<sup>114</sup>

透過陸氏親身經歷的工作記憶，可見皇帝對於這次清查昭仁殿藏書的工作要求十分仔細，除了按照「天祿琳琅」前、後二編書目著錄之各條目逐部點檢，覈驗原書，還要全面換寫籤條，以更正前一次在同治初年點查期間所留下的錯誤資料；全部工作，歷時半個月完成，並將殿中藏書按照四部分類歸架。臺北故宮典藏清代宮中檔案，有一摺件即是本次點查畢事後所陳：

三月十五日，臣等奉硃諭詳查昭仁殿書籍，遵即恭詣昭仁殿，按照《天祿琳琅書目》詳細校覈，其《書目》前編所列各書，均不在內。茲謹依後編《書目》，將現存書籍分別部居，逐一換籤，歸架安設，開列五單。所有書中闕佚不符及蟲蝕之處，逐加詳註，恭呈御覽。<sup>115</sup>

顯然，參與清查昭仁殿藏書的成員，製作了二份完整的點查清冊，載錄「天祿琳琅」現存書籍的具體數量和保存現狀，一份呈覽，另一份收存南書房備查。其所開列的五件清單，不僅是一份詳實而全面的工作記錄，更可視為在溥儀、溥傑（1907-1994）自「宣統十四年」起有計畫地竊運清宮舊藏宋、元版善本圖書出宮之前，最完整也是最後一次保留昭仁殿內「天祿琳琅」藏書景況的簡明書目。

這五件點查清單，目前分藏於臺北故宮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一檔館」）。前者所藏，係點查《後目》卷1〈宋版首部〉著錄書籍的清單，九部御題書具存無缺且未遭蟲蝕；<sup>116</sup>（圖2）後者所藏，則是區分經、史、子、集四部，每

114（清）陸寶忠編、陳宗彝續編，《陸文慎公年譜》，卷上，「光緒二十年甲午四十五歲」，頁59。

115 臺北故宮藏宮中檔，統一編號：故宮 154304，〈三月十五日奉硃諭詳查昭仁殿書籍事〉。又，本文所徵引之臺北故宮藏宮中檔，皆未收錄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4），惟目前皆可利用院方建置之「清代檔案檢索系統」（<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查詢、下載。

116 臺北故宮藏宮中檔，統一編號：故宮 154309，〈御題書籍九部附書目二部〉。

部各繕一單，載列該部現存的宋、元、明版圖書，而非依循《後目》以版本年代為序，同代之中再按四部分類著錄群籍的體例。五件清單的封面題寫格式，皆與臺北故宮所藏這件一致，註明該類現存書籍的數量暨皮架位置。諸如：

御題書籍九部（謹安設前層中架 附書目二部）

經部現存一百一十部附一部（謹安設前層東架）

史部現存六十八部（謹安設前層西架）

子部現存一百零五部（謹安設後層東架）

集部現存一百四十四部（謹安設後層西架）<sup>117</sup>

由此可知，南書房翰林奏摺所陳「分別部居」、「歸架安設」，以及陸寶忠年譜所記述之「分別經、史、子、集安架」，確非套語虛辭，而是重新排序歸架的實務執行方案暨成果報告。這樣的作法，恰好完全改變了《後目》的編纂體例以及《排架圖》描繪的典藏實景，乃至於「古物－蒐藏－陳設－編目－繪圖」這套活動模式意欲傳達的文物鑑藏意識——原本明間正殿前層書架皆為宋、元版善本，中設寶座，專供皇帝就近品讀賞玩，最顯貴重、悅目；後層書架存放為數眾多的明版圖書，距離明間御座有前層書架相隔，從殿外進入後也不是一望可見，空間布局正可反映藏品級別的差等。如今則回歸最基本的四部典籍分類架構，讓經、史、子、集各據昭仁殿正殿之一方；一部之中，再依版本時代先後安頓架榻位次。有別於凸顯坐擁珍稀秘藏的帝君風雅，反倒比較接近盤點歷朝遺存的宮中故物，力圖振衰起敝，營造留心文獻、表彰古籍的中興氣象，同時從中汲取可資治道或發揚學術的研究資源。當然，南書房翰林們敢於一改舊制，重新分部安置「天祿琳琅」遺書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清查後發現數量確實短少許多，難以按照書目或《排架圖》的時序部次復歸昔日藏書原貌，倘若架上迭見空缺，不僅有損帝王顏面，恐怕還要因維護不力遭到論責究辦。工作人員但求能夠各按四部所隸釐清數量、註明書況，然後匯聚一處，排置穩妥，誠已克盡檢查校覈之責矣。

那麼，光緒二十年全面清查昭仁殿書籍的結果，究竟查出多少「天祿琳琅」遺書？藉由這份現存書單，還能提供哪些訊息，填補後人對於相關藏書史事的理

117 一檔館藏宮中檔案全宗，檔號：04-01-38-0024-001，〈呈經部現存周易等各部書函名目數量清單〉。該館網站「資源檢索」（<https://www.fhac.com.cn/consult.html>）將此件原紀年定為「乾隆朝」，今當可訂正為光緒二十年。又，經部現存書單末附「武英殿仿宋相臺本五經十二函七十冊」，係殿中陳設用書，非「天祿琳琅」藏書。



解，抑或調校若干既有的認知？甚至衍伸出新的疑問？

首先，現存書單的編製條理，是以經、史、子、集四部為綱，各部之下分別匯入宋、元、明等版本類目，<sup>118</sup> 恰與前、後二編「天祿琳琅」書目先時代、後四部的體例相反。以經部為例，內分「宋版經部」、「影宋鈔經部」、「遼版經部」、「影遼鈔經部」、「元版經部」、「明版經部」、「明鈔經部」，但不記原書目編排卷次。接著核對《後目》著錄的原始條目，依序載錄現存書籍及其函、冊數量，另以單行或雙行小字註明是否有闕佚、蟲蝕或裝訂數量不同等保存現況。清查書單比照奏摺形式，墨筆端楷素紙謄寫，每折 6 行，每行 18 字。茲逐錄經部現存書單首二折「宋版經部」部分內容為例，以見其條目體例：

#### 宋版經部

- 《周易》一函四冊（卷八至卷十裝訂舛錯）
- 《周易本義》一函八冊
- 《大易粹言》四函二十冊
- 《童溪王先生易傳》二函十二冊（卷一錯訂五頁）
- 《周易輯聞》二函八冊（今作一函六冊）
- 《纂圖互注尚書》一函六冊
- 《附釋音尚書注疏》二函十六冊
- 《增修東萊書說》一函十二冊（今作二函）
- 《毛詩》一函四冊（今無函）
- 《詩集傳》四函十六冊
- 《呂氏家塾讀詩記》二函十六冊

在清查所得全部現存書 436 部當中，有如前述奏摺所陳「逐加詳註」者計 69 部，例如：《後目》卷 2〈宋版經部〉著錄「《周易輯聞》二函八冊」，現存書單小字註曰「今作一函六冊」；卷 4〈宋版史部〉著錄「《資治通鑑》十八函一百十七冊」，書單註曰「今作一百十六冊」；卷 17〈明版子部〉著錄之第二部「《羣書集事淵海》十函一百冊」，書單註曰「第六函有蟲蝕」；卷 6〈宋版集部〉著錄「《集千家

118 略有不同的是，《後目》卷 8 的〈影宋鈔諸部〉，被拆分爲「影宋鈔經部」、「影宋鈔史部」、「影宋鈔子部」、「影宋鈔集部」，附於經、史、子、集各部宋版之後；卷 20 的〈明鈔諸部〉則被拆爲「明鈔經部」、「明鈔子部」、「明鈔集部」，附於各部明版之後。

注分類杜工部詩》四函二十四冊」，書單註曰「今只一函二冊，所闕甚多」。這類註記內容，確實反映出「天祿琳琅」藏書在宮中曾因遺失毀損、修復重裝等不同因素而產生的數量增減變化。

其次，書單中的註記資料，足以呈現翰林諸臣奉旨執行本次檢書工作的細緻程度。翁同龢率同南書房翰林欲在半個月內翻遍殿內所有書籍，即便僅按照《後目》從書架上檢出現存的「天祿琳琅」遺書，總數也在 6,000 冊之譜，還得連帶完成校覈、分部（類）、寫籤、換籤、歸架、繕檔等一系列工作，無論份量、時程，都十分繁重緊湊；而諸臣詳加註記的內容，仍能具體指出書頁錯裝、闕誤、函套佚失等問題，可謂兼具專業水準與執行效率。例如：《後目》卷 2〈宋版經部〉著錄「《周易》一函四冊」，現存書單小字註曰「卷八至卷十裝訂舛錯」；卷 14〈明版史部〉著錄「《河防一覽》一函十二冊」，現存書單小字註曰「今作二函，闕于序首頁」；卷 16〈明版子部〉著錄「《慈溪黃氏日抄》四函二十四冊」，現存書單小字註曰「卷六十二之六十四頁數舛錯」；卷 11〈元版集部〉著錄「《增類撰聯詩學攔江網》一函十四冊」，現存書單小字註曰「今作二函，末闕一葉」。如此準確的描述，想來非得通檢、細察全書，不能為也。

比較特別的一例，是《後目》卷 13〈明版經部〉著錄之「《十三經註》二十函一百七十四冊」，現存書單小字註曰：

今作二十四函、一百六十四冊。內《春秋左傳》四函錦面不同，標題亦異，應係重裝時誤作單行之本。

該書現藏於臺北故宮，明崇禎十二年（1639）葛氏永懷堂刊本，共有 24 函、174 冊，<sup>119</sup> 普遍採用月白（淡藍）色絹質書衣，杉木板糊黃綠色地三色朵花紋仿宋錦四合函套，明黃雲龍紋綾包角、書籤、套籤，籤題「十三經註疏」；唯獨其中第 15 至 18 函共 30 冊《春秋左傳》，書衣用黃綠色（或米色）地三色朵花紋仿宋錦（同其他各經函套錦面），函套糊米色地朵花龜背紋仿宋錦，書籤、套籤題「明版春秋左傳」，（圖 3）外觀迥異於同一部叢書之其他函套與書冊；各函皆安有黃高麗紙掛籤，墨筆書「明版十三經注 十五（六、七、八）函 左傳一（二、三、四）」。

119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08649-008822。本文所列臺北故宮典藏古籍，讀者皆可按附注之文物統一編號，於故宮建置之「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pall>）檢得基本資料，本文不另詳列引用書目。

書籍實物狀態和現存書單註記情形大抵相符，確實是在同治年間至光緒初期修補重裝時，誤以為這四函《春秋左傳》自成一單行本，忽略了它其實是整部永懷堂《十三經古註》之一種，遂導致裝潢材質、題籤有別；至於現存書單所記冊數，容或緣乎全套書冊較多，點檢計數遺漏有誤。通過比對《後目》原始著錄數量以及現存書單的註記訊息，當不難察覺「天祿琳琅」書在經過前朝大規模的修復維護工作後，若干現存書籍的函、冊數量確實出現損益不一的變化。

其三，清查書單所載錄現存「天祿琳琅」書的數量，約僅占《後目》著錄數量的一半。茲據書單所列，核算各部類現存書籍之部數、函數、冊數，以及所占原目著錄數量之比例，列表如下：

表四 光緒二十年清查「天祿琳琅」現存書數量統計表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合計
光緒二十年現存書單載錄數量	宋版 影宋鈔	部	57	21	43	57	178
		函	90	87	58	141	376
		冊	520	583	305	944	2,352
	遼版 影遼鈔 金版	部	2	0	0	0	2
		函	2	0	0	0	2
		冊	10	0	0	0	10
	元版	部	18	13	13	25	69
		函	28	46	22	48	144
		冊	179	288	102	324	893
	明版 明鈔	部	38	34	50	65	184
		函	95	148	114	129	486
		冊	581	860	790	740	2,971
《後目》 著錄總數		部	161	111	160	232	664
		函	308	591	378	546	1,823
		冊	1,930	3,831	2,597	3,950	12,308
光緒二十年現存 書籍總數、比例		部	115	68	106	147	436
			71.4%	61.3%	66.3%	63.4%	65.7%
		函	215	281	194	318	1,008
			69.8%	47.5%	51.3%	58.2%	55.3%
冊	1,290	1,731	1,197	2,008	6,226		
	66.8%	45.2%	46.1%	50.8%	50.6%		

在這五份現存書單中，史部書單略有短少，佚失最後二折。其封面題曰存書 68 部，實則可見條目為 60 部；自《後目》卷 15〈明版史部〉著錄之《兩漢博聞》以下共 12 部書，皆因原件殘損而不詳其存缺狀況。幸運的是，吾人尚可藉助一檔館所藏另外二份清單相互比對，<sup>120</sup> 確認其他 8 部現存書為：《兩漢博聞》、《十七史詳節》（第二部，3 函 24 冊）、《水經注》、《三輔黃圖》、《楚故畧》、《歷代地理指掌圖》、杜氏《通典》、《通志》。然而，倘若將這 68 部史部現存書逐一對應《後目》著錄條目，則為 65 部；其間落差原因在於，南書房翰林將原書目著錄的兩部彙（合）刻書籍各自拆分載錄，導致對部數的認定和核計出現歧異。分述如下：

第一部，是《後目》卷 14〈明版史部〉著錄之《資治通鑑》，乃明天啓、崇禎間陳仁錫（1579-1634）彙刻本，內容包括數種皆曾單獨刊行的著作：宋司馬光（1019-1086）《資治通鑑》294 卷附《目錄》30 卷、元胡三省（1230-1302）《通鑑釋文辯誤》12 卷、明薛應旂（1500-1574）《甲子會紀》5 卷、《宋元通鑑》157 卷。現存書單將之分別列出：

《資治通鑑》十函六十八冊

《宋元通鑑》四函十八冊

《通鑑釋文辯誤》一函二冊

且有小字註曰：

按《書目》以上三書共十四函九十冊，統名曰「資治通鑑」。今分作十五函共八十八冊。（圖 4）

可見此時《甲子會紀》二冊未見於架上，或已流出宮外，現存書冊也被重新分裝為 15 函、88 冊。全部書冊現藏於臺北故宮，只不過書頁多經托裱修補，紅絹書衣、藍布四合函套皆為晚近新製重裝，<sup>121</sup> 非復舊觀；《甲子會紀》二冊現藏

120 一件為一檔館藏宮中檔案全宗，檔號：04-01-38-0024-002，〈呈經史子集四部宋元明版本儀禮圖等書冊清單〉，此係光緒二十年四月二日覈校武英殿傳進書籍，開列與《後目》著錄相符之清單，〈明版史部〉載有「《十七史詳節》八十六冊」、「《文獻通考》一百冊」；另一件為一檔館藏宮中檔案全宗，檔號：04-01-38-0024-005，〈呈天祿琳瑯書目後編缺書清單〉，〈史部〉最後列有「明版雍大記」、「明版通志」（《後目》著錄有「六十函二百四十冊」與「二十八函一百十二冊」各一部，當為其中一部）。據以推知這四部書必不見載於四月一日檢齊的現存書單中。又，一檔館網站「資源檢索」前一件原紀年不詳，後一件則定為「嘉慶朝」，今皆可訂正為光緒二十年。

121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10909-010978（《資治通鑑》、《通鑑釋文辯誤》）、

國家圖書館，<sup>122</sup> 合二館所藏，即成完璧。

第二部，則是同為《後目》卷 14〈明版史部〉著錄之《通鑑紀事本末》，乃明萬曆三十四年（1605）黃吉士取宋袁樞（1131-1205）《通鑑紀事本末》以及明陳邦瞻（1557-1623）《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合而刻之。現存書單認為當分作二部：

《通鑑紀事本末》四函四十二冊

《宋元紀事本末》二函十二冊

亦有小字註曰：

按《書目》統歸《通鑑紀事本末》作五函五十二冊，今分作六函五十四冊。（圖 4）

此書現藏臺北故宮，總共 6 函 54 冊，<sup>123</sup> 與現存書單註記的條目、數量皆一致。其書冊、錦函經過修補重裝後的材質樣式，則具體呈現也充分印證彼時檢校人員將之視為不同著作，甚至不認同《後目》之纂輯條理，遂離析合刻書籍子目予以分別裝潢、登載、計數的思維模式。《通鑑紀事本末》書衣用黃綠色地朵花紋仿宋錦，函套糊飾淺灰色地朵花龜背紋仿宋錦；《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書衣用藍紫色絹，函套糊飾黃地朵花紋仿宋錦。（圖 5）並置而觀，確實會讓人以為它們不屬於同一家刊行之系列出版品。

這種將彙刻書籍判定為獨立著作，並重裝成不同樣貌以凸顯彼此差異的做法，難以確定是本次南書房翰林諸臣負責清查時才決定拆分，或在更早期的修復階段便已經改變了裝潢規制；其立意固然出於詳慎，卻未必妥適。「天祿琳琅」書目是一部強調「古籍」之為「古物」的賞鑑暨典藏名錄，而非歷代著作總目；前者相對著重凸顯不同時代、地區所產製圖書的物態特性和傳藏價值，卻未必要承擔後者常被賦予所謂「辨章學術」或梳理撰述脈絡的任務。因此，在這樣一部版本目錄中將彙刻、合刻書籍著錄為一個條目，確屬合理；否則，類似「前後漢紀」、「元白長慶集」等書，豈不都該分別開列計數？反倒更覺冗蕪。

故善 010979-010996（《宋元通鑑》）。經細檢原書，若干書冊之前、後副葉與書衣黏合拆裝處，可以看出殘留織物纖維以及絳紫色箋紙痕跡，推測此書先前至少已經過二次修補重裝。

122 參考劉薈，《書錄》，頁 441-443。

123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08823-008864（《通鑑紀事本末》）、故善 008865-008874（《宋史紀事本末》）、故善 008875-008876（《元史紀事本末》）。

## (二) 四月二日：補查武英殿交進書

光緒二十年四月二日（1894年5月6日），緊接在陸寶忠等人清查完「天祿琳琅」遺存書籍並重新按照四部歸架畢事之後，皇帝再度指派南書房翰林前往昭仁殿，覈校武英殿修書處人員通傳交進的一批書籍中與《後目》著錄相符者，絕大部分都有多寡不一的殘闕，且蛀蝕損傷情況較為嚴重；或許因為殿內藏書歷經修復整飭，許多書籍移置別處，有些也還尚未完成修補，故而先前清查時未能及時檢出。執事人員遂比照前例，將武英殿傳進書籍同樣按照四部歸架安設，且一律放置在該區書架的下層書桶；唯恐時日漸久，潛伏書冊內的書蟲蠹蟲會逐漸「感染」侵害上層相對完好的藏書。

有關這段延續清查「天祿琳琅」的工作，陸寶忠自訂年譜記得頗為簡略：

「天祿琳瑯」查竣，又派查武英殿傳進書籍，內宋、元、明板精本頗夥，有缺一卷或數卷者，皆人間不易見之本。<sup>124</sup>

翁同龢日記述及此事，並直言清查「天祿琳琅」乃因己而起：

（四月初五日）詣昭仁殿。昨武英殿將不全之本盡數交進，此端自余發之。今檢閱，宋版不過三四部耳。一到即行。

（初六日）照常進講五刻，後至殿上檢書即出。<sup>125</sup>

臺北故宮所藏光緒朝宮中檔案，恰有一件奏摺，具體陳報相關工作內容：

四月初二日，臣等恭奉硃諭覈校武英殿傳進各項書籍，遵即恭詣昭仁殿逐一檢查，多與《天祿琳琅書目後編》相符；惟全者不過數部，餘多殘闕、蟲蝕。現已分別標籤，仍按經、史、子、集分設架之下層；另有六部在書目之外，一併標籤、安設，開列五單，恭呈御覽。臣等謹查此次書中蟲蝕過多，現雖安設下層，仍恐緣及上架，致傷完善之本，似宜重為修整，俾復舊觀。再殿之東北頂桶上有滲漏情形，合併附陳。<sup>126</sup>

至於這件奏摺所附「五單」，目前皆藏於北京一檔館。其中四單，是同樣按照四部

124（清）陸寶忠編、陳宗彝續編，《陸文慎公年譜》，卷上，「光緒二十年甲午四十五歲」，頁61。

125（清）翁同龢著，陳義杰整理，《翁文恭公日記》，冊5，〈光緒十九年癸巳〉，頁2688、2689。

126 臺北故宮藏宮中檔，統一編號：故宮154307，〈四月初二日奉硃諭覈校武英殿傳進各項書籍事〉。

開列的「天祿琳琅」補查書籍 62 部，<sup>127</sup> 另一單則是登載 6 部未見於《後目》著錄的目外書籍。<sup>128</sup> 它們不僅相互填補了檔案文獻暨藏書史事的完整程度，更為後人留下一份覆核「天祿琳琅」存世書籍的點查紀錄，可據以考見這些宮廷藏書定止於光緒二十年昭仁殿內的數量、相對位置、保存現況等實物狀態。

補查書單的載錄體例，乃是比對《後目》原始著錄條目，凡遇查得相符者，即按原目順序開列題名與原冊數，省略函數不記；每條之下，再以雙行小字註記現存冊數、闕卷情形、佚闕冊數，以及是否有蟲蝕、破損等情形，十分詳細、確實。茲舉子部為例，逐錄書單部分內容暨其載錄格式如下：（圖 6）

子部共十九部

宋版子部

《纂圖互注荀子》六冊（蟲蝕）

《朱子語類》八十冊（存七十五冊闕卷十七卷四十一卷七十六卷七十七卷百二十一之百二十四計五冊 蟲蝕）

《自警編》十四冊（存十二冊缺乙卷戊卷計二冊）

《藝文類聚》四十冊（存三十九冊闕卷六之卷八一冊 蟲蝕）

《初學記》十五冊（存十四冊闕卷十一卷十二一冊 蟲蝕）

《孔氏六帖》二十冊（存十九冊闕卷十一一冊 蟲蝕破損）

元版子部

《經史證類大全本草》三十二冊（存二十九冊闕卷四卷十三計三冊 蟲蝕）

明版子部

《二十子全書》十八冊（存十七冊闕管子第九之十九一冊 蟲蝕破損）

《南華真經》十六冊（存十五冊闕卷一一冊 蟲蝕）

……

127 一檔館藏宮中檔案全宗，檔號：04-01-38-0024-002，〈呈經史子集四部宋元明版本儀禮圖等書冊清單〉。

128 一檔館藏宮中檔案全宗，檔號：04-01-38-0024-004，〈呈天祿琳琅書目外書籍名目清單〉。一檔館網站「資源檢索」原紀年定為「嘉慶朝」，今可訂正為光緒二十年。本件書單封面題「天祿琳琅書目外書籍共六部」，包括：「高宗御製詩初集」、「康熙字典」、「方輿勝覽」、「宋版重廣注揚子法言」、「六家文選」、「宋詩鈔」。每條之下各記現存冊數暨闕卷卷數、冊數。經比對後可確定《新編方輿勝覽》與《六家文選》現藏臺北故宮，前者為宋咸淳三年（1267）吳堅劉震孫刊本，統一編號：故善 003730-003753；後者為明嘉靖十三至二十八年（1534-1549）袁聚嘉趣堂覆刊宋廣都裴氏本，統一編號：故善 013175-013203。

補查書單共載錄經部 8 部、158 冊，史部 12 部、598 冊，子部 19 部、579 冊，集部 23 部、889 冊；將此數匯入前述現存書單核計數量，現已清查「天祿琳琅」遺書共 495 部、8,450 冊，較諸本節首段引述光緒六年以前所繕錄之《乾清宮等處書目》，多出整整近百部，分別佔《後目》著錄總量之 74.55%、68.65%。

試將書單所記 62 部書籍的卷冊存闕狀況，與學者調查存世「天祿琳琅」書的結果相比對，可知有 4 部在「宣統十四年」八、九月間假借「賞賜」之名盜運出宮，現藏於中國國圖與遼圖。<sup>129</sup> 其餘 58 部書，除了 6 部在本次補查後出現部分卷冊流失，<sup>130</sup> 絕大部分皆維持書單上登載的數量，持續存貯在昭仁殿內，後來隨文物南遷，如今全數由臺北故宮典藏，且有 23 部書籍，可以和光緒二十年補查時尚未檢出或已經流出宮外而現藏於中國國圖、臺灣大學圖書館或日本的殘帙配成全璧。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過於南宋撫州本《春秋經傳集解》、乾道本《孔氏六帖》以及明州本《文選》。

補查書單的註記內容詳實，取之與《後目》以及前述現存書單相覈互證，頗有助於檢驗或標記「天祿琳琅」書在傳藏脈絡中的佚存時序和實物樣態。茲舉一例：《後目》卷 17〈明版子部〉著錄明人俞安期（1550-1627 後）<sup>131</sup> 編刊之《唐類

129 「宣統十四年」八月六日，賞溥傑「宋板纂圖互註荀子一套」（實為明初刊本），補查書單註記「蟲蝕」，現藏遼圖；九月二日，賞「宋板六家文選一部六套」（《後目》卷 7 著錄《六家文選》之第一部，實為明嘉趣堂本），補查書單註記「存五十九冊，闕卷四十二一冊」，現藏中國國圖，實存 55 冊；九月十四日，賞「宋板節孝先生文集二套」（《後目》卷 6 著錄，宋淳祐本），補查書單註記「蟲蝕」，今存佚不明；九月二十三日，賞「宋板六家文選六十一本」（即《後目》卷 7 著錄之贛州本《文選》，6 函 61 冊），現藏中國國圖。參考劉蕃，《書錄》，頁 161、249-250、228、248-249。案，《後目》卷 5〈宋版子部〉著錄《纂圖互註荀子》二部，一為 1 函 6 冊，一為 1 函 8 冊，前述現存書單記有 1 函 6 冊者，而補查書單又記為 6 冊，或為筆誤？又，據《賞溥傑書畫目》所載，「宣統十四年」九月七日賞溥傑「宋板六臣文選一部八匣」，當即《後目》卷 7 著錄之《六家文選》第三部，8 函 61 冊（葉 4a）。《後目》〈宋版集部〉共著錄九部《文選》、《六家文選》，然原裝訂成 61 冊者，僅此二部，而一為 6 函，一為 8 函，據以與《賞溥傑書畫目》相核，尚不難釐辨。劉蕃《書錄》記此二書賞賜出宮日期顛倒，應相互對調。

130 《後目》卷 2 著錄之《儀禮圖》，補查時尚為完帙，書單註記「蟲蝕」，後又佚失 4 卷、4 冊；卷 3 著錄之《春秋經傳集解》第一部，書單註記「存二十七冊，缺卷十九一冊」，後又佚失 2 卷、2 冊；卷 4 著錄之《諸臣奏議》，書單註記「存五十八冊，闕卷六十一之卷六十五，計三冊」，後又佚失目錄 1 冊；《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書單註記「存十八冊，闕卷五、卷二十八之卷三十，計三冊」，後又佚失 12 卷、7 冊；卷 5 著錄之《藝文類聚》，書單註記「存三十九冊，闕卷六之卷八一冊。蟲蝕」，後又佚失 8 卷、4 冊；卷 7 著錄之《南軒先生文集》，補查時尚為完帙，後佚失 6 卷、2 冊。參考劉蕃，《書錄》，頁 43、58、132、148、191、243。

131 俞氏生卒年參考何朝暉，〈山人與出版：俞安期生平、著述與刻書考〉，《古典文獻研究》，第 15 輯（2012），頁 370-372。



函》共三部，分別為 5 函 40 冊、5 函 40 冊、8 函 40 冊，先前清查之現存書單亦登載有「唐類函八函四十冊」，正與原目之第三部相符。此帙現藏臺北故宮，正是 8 函、40 冊，<sup>132</sup> 竹紙印本，書頁有蠹蝕並經裱襯，石青絹書衣，淺綠地圓形獸紋仿宋錦四合函套，明黃雲龍紋綾包角、書籤、套籤，籤題「唐類函」，屬於清代中期修護後重新裝潢的材質款式。其他二部同為 5 函 40 冊者，補查書單「明版子部」載有「唐類函四十冊」一部，下有雙行小字註曰：

存十八冊。闕卷十五之卷十九、卷四十之卷四十四、卷五十之卷一百，  
卷一百四十一之卷一百四十五、卷一百五十五之卷二百，計二十二冊。

而臺北故宮另藏一部白麻紙印本，所存卷次、冊數與這段敘述完全相符，但書衣、函套皆屬晚近新製，僅書籤仍保留清宮白紙舊籤，題「明版唐類函 第○冊」。<sup>133</sup> 那麼，當如何推定其究係《後目》著錄之第一部或第二部？所幸原目第一部書附撰提要，描述卷首序文篇次先後，揭示實物樣態：

前有萬曆癸卯申時行、沈思孝二序，又李維楨序，又戊午程開祐序。<sup>134</sup>

驗諸臺北故宮藏本，卷首序文順序卻是：李維楨（1547-1626）〈唐類函敘〉、萬曆三十一年（1603）申時行（1535-1614）〈刻唐類函序〉、萬曆四十六年（1618）程開祐〈唐類函序辭〉、萬曆三十一年沈思孝（1542-1611）〈唐類函序〉，後接凡例 22 則、目錄 2 卷，與提要所述略有不同；再查中國國圖藏本，承蒙該館同仁協助覆核原書，係用磁青絹質書衣、黃絹包角、黃絹書籤，卷首諸篇序文次第，正是：申時行、沈思孝、李維楨、程開祐，與提要相符。據此可以確證，《後目》著錄三部《唐類函》之先後順序為：中國國圖藏本、臺北故宮藏白麻紙本（存 83 卷、18 冊，中國國圖存 97 卷、19 冊）、臺北故宮藏竹紙本。<sup>135</sup>

另一方面，南書房翰林在表現其審慎務實的工作態度之餘，不免偶有失誤。例如：補查書單「元版史部」中所載「戰國策八冊」，係《後目》卷 9 著錄之第一部。書單小字註曰：

132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10416-010455。

133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10456-010473。據劉薈《書錄》調查，此書另存 97 卷、19 冊，現藏中國國圖，二館藏本相合，尚闕 20 卷、3 冊。參見劉薈，《書錄》，頁 529。

134（清）彭元瑞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 17，〈明版子部〉，葉 16a。同書、同卷，第二、三部提要皆僅「同上，係一版摹印」，葉 16b。

135 劉薈《書錄》所記《唐類函》第一、三部藏本應對調。參見劉薈，《書錄》，頁 528-530。

存七冊。闕卷二十九之卷三十。蟲蝕。

此書乃南宋鮑彪（1091-1160 後）所注、吳師道（1283-1344）重校 10 卷本，在劉向（66B.C.-7B.C.）編定、曾鞏（1019-1083）輯校 33 篇的基礎上「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sup>136</sup> 四庫館臣反倒批評他率就已意改移篇次先後，非復向、鞏舊觀，直斥為「竄亂古本」之始。<sup>137</sup> 《後目》暨補查書單所著錄的這部《戰國策》，原書現藏臺北故宮，存卷 1 至 8，共 7 冊；<sup>138</sup> 卷 9 至 10 流出宮外後為周叔弢（1891-1984）所得，現藏中國國圖。<sup>139</sup> 由此可見，補查書單所註「卷二十九之卷三十」，確屬誤記，當改正為「卷九之十」。

再有一例，補查書單「明版集部」所載「臨川吳文正公集二十四冊」，係《後目》卷 19 著錄，書單小字註曰：

卷內有「元本」小印及蒙古文，似係元版。

原書現亦藏於臺北故宮，<sup>140</sup> 首冊〈吳文正公年譜序〉首葉天頭確實鈐有「元本」朱文橢圓小印，原目失載；附錄之〈大元累授臨川郡吳文正公宣勅〉亦為蒙古字書、漢字旁注。然而，僅憑藉這二項特徵，實在不足以推論其版刻年代，畢竟《後目》提要已經指出，此本係「宣德乙卯其五世孫炬所刻，有識，附宣德十年褒崇從祀事由」。<sup>141</sup> 覆核原書，諸般實證具在：外集卷首〈道學基統〉後有吳炬識語，署「宣德乙卯冬十月望日五世孫炬百拜謹識」；<sup>142</sup> 外集卷末附〈國朝褒崇臨川郡公草廬吳先生從祀事由〉，篇末可見「宣德十年四月貳拾壹日早，各官於西角門奉奏聖旨」云云，據以審定為明宣德十年（1435）吳炬刊本，殆無疑義。不知南齋翰林為何還會拘執於鈐印及蒙文二項特徵而疑稱「似係元版」？

136 (宋) 鮑彪，〈戰國策序〉。見 (宋) 鮑彪校注、吳師道重校，《戰國策》（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二十五年平江路儒學刊明修補本，善本書號：08669），葉 1b。

137 (清) 永瑤、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六十年武英殿刊本，統一編號：故殿 025488-025631，以下簡稱「《總目》」），卷 51，〈史部·雜史類〉，《鮑氏戰國策注》提要，葉 9b。

138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02270-002276。

139 參考劉蕃，《書錄》，頁 320-321。

140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14478-014501。

141 (清) 彭元瑞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 19，〈明版集部〉，葉 10b。

142 劉蕃《書錄》言此識語刊於外集「目錄」後，實則為吳澄擬定之「學統」、「教法」二部分，貌似篇次目錄，遂致誤認。又，此書外集 4 卷原應裝為最後一冊，推測或在清代中後期修復時封面錯裝為第 6 冊，今可見清宮白紙舊籤原題「明版臨川吳文正公集 第六冊」，另有墨筆註「係末冊」。

依據奏摺呈報內容，補查書單開列的 62 部書「仍按經、史、子、集，分設架之下層」，即分別置於昭仁殿正殿前、後兩層書架的東、西半邊，彼此當有一定間隔；同部之中，也可能再依循宋、元、明版的順序排列。然而，倘若將現藏臺北故宮的 58 部書一一追溯其登錄於民國十四年（1925）《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的號數，可以看出這些「天祿琳琅」書大多集中在「日字三一五」至「日字三二〇」這六座木書架上：<sup>143</sup> 換言之，他們幾乎都從前層東、西兩邊書架被移到後層北面東首這一區，且經、史、子、集四部書籍相混並置在同一座書架，也不再僅限於下層書櫥。試加揣想：這些書籍歷經不同時段，被安頓在特定空間的相對座標，不啻意味著從嘉慶三年、光緒二十年到民國十四年將近 130 年間，昭仁殿書架上的書籍陳設，無論是「天祿琳琅」特藏或其他新、舊 / 中、西圖書，移易更動的程度頗見劇烈。昔日作為皇家善本特藏專屬宮殿的獨特功能、精雅涵蘊及其象徵意義，正不斷遭遇時代變遷的衝擊、消解，甚或遺忘。

光緒二十年四月初，在完成昭仁殿「天祿琳琅」特藏善本的全面盤點，緊接著覈校武英殿傳進數十部《後目》著錄書籍，陸續奏報現存書單以及補查書單之後，南書房翰林又另行整理出一份〈天祿琳瑯書日後編闕書清單〉進呈御覽，其載錄格式略如：

《欽定天祿琳瑯書日後編》各書籍除兩次開單恭呈

御覽外尚闕一百七十部

經部

宋版《呂氏家塾讀書記》

宋版《周禮訂義》

……

影宋鈔《歷代鐘鼎彝器款識》

元版《書集傳》

……

明版《音韻日月燈》

143 這六座書架上合計檢出 53 部。經部書多在「日字三一五」木書架，有 4 部，該架史部書也有 5 部；子部書多在「日字三一八」、「日字三一九」二架，共有 13 部；集部書多在「日字三一七」、「日字三一八」二架，共有 10 部。詳見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民國十四年至十九年排印本，統一編號：購善 000186-000213），第 1 編第 3 冊《昭仁殿、弘德殿、端凝殿》，卷 1，〈昭仁殿〉，頁 102-111。

## 史部

宋版《史記》

宋版《史記》

宋版《史記》

宋版《史記》

宋版《漢書》

宋版《晉書》

……

闕書清單同樣是分經、史、子、集四部，再按版本時代，簡單條列本次盤點清查未見的書名，不記函、冊數或其他任何註解文字。匯合南書房進呈的現存、補查、闕書這三份清單所記，可以說是在民國肇建、皇家紫禁城轉型為公共博物館之前，清宮內府針對「天祿琳琅」藏書所進行最後一次規模龐大、工作確實、紀錄也相對完整的清查報告。闕書清單共開列經部 38 部、史部 34 部、子部 36 部；集部列出 54 部，其最末一折原件缺損，經比對現存書單與補查書單，推知應該還有 7 部，<sup>144</sup> 總計實闕 169 部。

這 169 部被確認為「闕書」的「天祿琳琅」藏品，當中有許多確實在此之前便已經丟失或藉由各種管道流出宮外；有的確定已毀，還有一些至今猶能考知藏身何處，但更有許多不知是否還在人間？當然，也有部分書籍，光緒二十年清查時應該還在紫禁城內，只不過可能不在昭仁殿、武英殿等處，以致未能及時查出。例如：《後目》卷 2〈宋版經部〉著錄之《東巖周禮訂義》，原裝 4 函 32 冊，「宣統十四年」八月八日賞賜溥傑「二套」，顯然光緒年間原書尚在內廷，但已有半數殘缺。<sup>145</sup> 再如：臺北故宮典藏之明初建刊《纂圖互註揚子法言》，係《後目》卷 5〈宋版子部〉著錄之第二部（1 函 4 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點查字號為「餘字七九〇」；舊鈔《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後目》卷 8〈影宋鈔諸部〉著錄，點查字號「餘字五八八」；明刊《春秋胡傳》，《後目》卷 12〈明版經部〉著錄，

144 包括：《後目》卷 19、20〈明版集部〉著錄之《文苑英華》、《宋文鑑》（第二部，2 函 20 冊）、《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妙絕古今》（第二部，1 函 4 冊）、《晉二俊文集》、《唐百家詩集》、《升菴詩話》。

145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賞溥傑書畫目》，葉 2b。

點查字號「餘字三〇五」，<sup>146</sup> 以上皆是清室善後委員會在惇本殿檢得。又，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顧棫如月樓刊《埤雅》，原目卷 13〈明版經部〉著錄，點查字號「律字八一三一 21」，<sup>147</sup> 則是置於景陽宮古鑑齋帶紗簾書架上；這些書籍應當在光緒二十年之前，便因為種種理由借取、調離昭仁殿，直到清國覆滅，再未歸還。

以上所舉數例，都是猶存確切記錄可供追查的個案，讓後人有機會嘗試串聯起零瑣檔案之間的邏輯與關係，俾使藏身於文獻與實物當中的歷史碎片得以綴合。然而，還有更多無從鉤稽索隱的「失聯者」，彷彿正暗示著我們：清代宮廷內部書籍的典藏、陳設、進呈、賞賜、提調、傳進，從屬於一張看似規章嚴密、制度井然卻又極其繁複幽隱的流動網絡，若非文獻足徵，委實不易相互繫連或拼湊出書籍自身傳、藏、佚、存的流轉軌跡。

### （三）四月九日：建福宮等處檢得目外書

爲了徹底清查宮中現存的「天祿琳琅」善本，不致遺漏，光緒皇帝諭令南書房翰林擴大檢書範圍至建福宮、御花園以及景陽宮等處。這項任務對於陸寶忠等人而言，不啻爲一次難得的機遇，可以憑恃欽命特許的身分，進入紫禁城中長期封閉的管制區域，除了觀覽皇宮大內富麗恢弘的建築營構，也不時發現令人讚嘆的先帝珍藏遺物。

陸寶忠年譜記曰：

四月初九日，又命詣建福宮查書，次日至御花園查書，得徧窺各殿座之勝；前此侍從，所未有也。在建福宮檢得宋刻《文選》，卷首有高宗畫像；又聖祖御書〈千字文〉，奏明後移奉香案前。<sup>148</sup>

舊時臣民倘若有幸得見用皇帝肖像裝潢的古書，必然奉若聖物。乾隆朝鑑藏「天祿琳琅」善本之最精者，如宋版《漢書》、廬陵刊《資治通鑑綱目》、廣東漕司刊《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前目》題名著錄爲《九家集注杜詩》），皆命臣工寫繪

146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00394-000397、故善 002645-002648、故善 007148-007163；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 2 編第 7 冊《惇本殿、毓慶宮》，卷 1，〈惇本殿〉，頁 41、31、17。

147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13102-013103；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 2 編第 5 冊《景陽宮》，卷 3，〈古鑑齋、靜觀齋〉，頁 15。

148（清）陸寶忠編、陳宗彝續編，《陸文慎公年譜》，卷上，「光緒二十年甲午四十五歲」，頁 61。

御容於卷首，標舉其為琅函鴻寶，倍極珍貴。如今，陸寶忠等人於建福宮檢得的宋版《文選》，儘管並非「天祿琳琅」舊藏，卻因卷首同樣裝有乾隆御容，引人入勝、印象深刻，遂特別記下。而這部書，當即藏書家蕭穆（1835-1904）所稱翰林院編修江標（1860-1899）「聞於某翰林，曾恭觀之」的「宋刻巾箱本《文選》李善注」。蕭穆又從江標口中得知有關這部書的其他特徵：

板片高廣徑寸，十數冊，印紙又極寬大。每冊上冠以高宗純皇帝自少至老御容。<sup>149</sup>

乾隆皇帝不同時期的肖像畫，目前已知僅見於臺北故宮典藏之內府烏絲欄精寫大開本高宗御製詩集、文集各集卷首，冠以一幅圓光御容半身小像，其餘則零星出現在乾隆收藏的印譜、畫冊，以及屢次命翰林詞臣繕寫進呈的幾部《昭明文選》書冊首頁。<sup>150</sup>不意百餘年前的深宮中，竟然珍藏著一部宋版《文選》，能同時匯集乾隆「自少至老御容」數幅，不僅彰顯皇帝獲藏此書的寶愛程度歷久不衰，其裝潢規格之高，徵諸清宮鑑藏古籍，實屬罕見特例。

陸寶忠等南齋翰林並未在建福宮、御花園查出任何「天祿琳琅」舊藏善本，卻發現有二部書，雖未著錄於前、後二編書目，而書冊首、末葉竟同樣鈐有「天祿繼鑑」等鑑藏璽印。這可說是清代內府全面清查「天祿琳琅」遺存書籍的另一收穫，即首次發現有目外之書，以及仁宗顥琰（1760-1820，1796-1820 在位）在重新恢復昭仁殿藏書後仍持續蒐羅善本，意欲仿效乾隆舊制，延展出屬於嘉慶一朝「天祿琳琅」宮廷文物鑑藏的實物史證。南書房奏曰：

本月初九日、初十日，臣等遵旨恭詣建福宮、御花園等處，所有陳設書籍逐一檢查，並無「天祿琳琅」前、後編之書。惟建福宮有宋版《六家文選》一部，計六函六十冊；漱芳齋有宋版《宣和博古圖》一部，計四函三十二冊，均有「天祿繼鑑」小璽及「嘉慶御覽之寶」。其餘書籍，間有宋、元舊版，皆非書目所列。合併陳明。<sup>151</sup>

149（清）蕭穆，《敬孚類叢》，卷9，〈書記·記天祿琳琅目錄三四兩編本〉，葉2a。

150 參考邱士華，〈清高宗御容圓光小像研究〉，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MOST 105-2410-H-136-001-MY2），頁2-6；朱寶虹，〈清宮寫抄類典籍裝幀形制探微〉，《中國書法》，總349期（2019.3），頁140。乾隆十九年御題梁國治等人繕錄袖珍本《昭明文選》卷首御容圖板，可參見北京故宮網站介紹：<https://reurl.cc/qZAq90>。（白伯編撰，檢索日期：2022.10.10）

151 一檔館藏宮中檔案全宗，檔號：04-01-38-0024-003，〈奏為遵旨恭詣建福宮等處檢查書函並無

建福宮檢得之「宋版」《六家文選》，當即臺北故宮典藏的一部明嘉靖間袁袞嘉趣堂覆刊宋廣都裴氏本。全帙實為 61 冊，<sup>152</sup> 配置 6 個楠木外匣，匣面陰刻「宋刊文選」加填灰色，並按禮、樂、射、御、書、數標次；每匣裝書一函，函套不用杉木板，而是以紙合背裏覆石青地織金天華錦製成；書冊採四眼線裝、素絹包角，淡粉色粉箋為面，貼古色紙質書籤、套籤，籤題「宋版六家文選」，每冊皆鈐「天祿繼鑑」、「嘉慶御覽之寶」、「天祿琳琅」三方璽印。惟此帙乃後印之本，書葉版心下方原鐫有大量刻工，多遭剷除；全書各卷末的嘉趣堂刊記，也幾乎全被鏟版或裁去該處書葉；紙張刻意染色仿舊，最末葉原本的「吳郡袁氏善本新雕」牌記則是沿著外框線內緣加以裁切，黏補偽刻之「紹興乙亥萬卷堂鐫」。當時廷臣難以覺察（甚或故意視而不見，知而不言）種種偽贗手段，故珍若宋槧。<sup>153</sup> 此書也是現存「天祿琳琅」相關書籍中唯一配有木匣且裝幀最顯華麗的一部；木匣容或為後來配製添附，書衣、錦套則猶仍保留嘉慶年間鑑藏善本——尤其是經審定為宋版的裝潢樣貌。至於另一部自漱芳齋查出之「宋版」《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實係元刊明修補本，今完整收藏於中國國圖。<sup>154</sup> 藉此二例，亦不難想見，無論是清代中、後期的內廷詞臣，抑或民國初年點查清宮遺存物品的成員，難免囿於客觀條件或其他因素介入，以致鑑別古籍時經常出現誤判版本或刻意拉抬版刻時代的情形，未可遽信；只要還有其他文獻或實物線索可徵，仍須進一步覆核驗證。

陸寶忠等人僅費時二日，便將建福宮、御花園、漱芳齋等處書籍「逐一檢查」畢事，但清查宮中珍秘古籍的計畫，並未就此告一段落。光緒二十年四月十一日起，諸翰林奉旨前往景陽宮，展開新的清查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密集整理，

天祿琳琅前後編書目所列書籍事)。一檔館網站「資源檢索」原紀年定為「嘉慶朝」，今可訂正為光緒二十年四月。

152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10739-010799。

153 可參考拙文〈院藏「天祿琳琅」書衣小識〉，收入宋兆霖主編，《護帙有道：古籍裝潢特展》，頁 287；劉薈，《書錄》，附錄一〈天祿琳琅目外書·天祿琳琅「三編書」「四編書」〉，頁 694-695。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下午，清室善後委員會吳承仕等人於養心殿體順堂查得此書，編號「呂字二一八二」，點查報告猶登載為「宋版六臣文選 六函（六十一冊，廣都裴氏本）。劉薈《書錄》記此書存燕喜堂齋宮，不確。參見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 3 編第 4 冊《養心殿》，卷 3，〈體順堂及各廂房等處附補號〉，頁 7。

154 劉薈《書錄》記為「三十冊」；參見劉薈，《書錄》，頁 689。據中國國圖網站「館藏目錄」（<http://www.nlc.cn/>）或「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http://202.96.31.78/xlsworbench/publish>）檢索，善本書號「12396」之《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實際冊數皆為 32 冊。（檢索日期：2022.10.10）

初步掌握宮中書籍概況後，即先行奏報查出同樣帶有「天祿琳琅」相關印記特徵卻未經書目著錄的目外書清單，並擬訂後續的工作規畫。奏曰：

本月十一日，臣等遵旨恭詣景陽宮，逐日檢查書籍，與「天祿琳琅」前、後編書目均不相符。其有「天祿繼鑑」及「乾隆御覽之寶」、「嘉慶御覽之寶」各書共計三十三部，先行開列清單，恭呈御覽。此外，宋、元、明舊版及國朝所刊之書甚多，臣等現擬分別部居，逐一換籤，俟殿座修葺工竣後，再行歸架安設，開單呈遞。<sup>155</sup>

這 33 部目外書清單，至今尚未檢得，未知是否存世？不過，根據學者調查研究，目前知見的「天祿琳琅」前、後二編目外書以及嘉慶朝意欲續纂的「三編」書，總數近 60 部，<sup>156</sup>想必已經包括景陽宮中檢出的若干甚至大部分目外之書。南書房翰林們排定接下來的工作，是要將景陽宮中清查出來為數眾多的歷代古籍重新分類，全面更換前朝點查書籍的掛籤，待宮殿修繕工程完竣後，各按部類歸架庋貯，並編製完整的陳設書籍清冊，奏報呈閱。

顯然，陸寶忠等人在景陽宮可謂完成了所有「天祿琳琅」現存書連同目外書的清查工作，同時無意間掘開另一座宮廷古物收藏寶庫；景陽宮內豐富的書籍資源，正驅策他們設定新的整理方向和工作目標。不過，接踵而至的工作進展，竟預示著一個新的皇家善本特藏重心的轉移和成形。

## 五、發現「四編」書

從光緒二十年三月中至四月初，南書房諸翰林在翁同龢的率領和提點之下，陸續完成所有嘉慶朝續輯《後目》的清查工作，也具體呈報「天祿琳琅」藏書的存、闕情形。翁氏嘗謂「此端自余發之」，難道單純只為釐清這座網羅琅函秘籍於一處的皇家善本珍藏，如今所賸幾何而已？抑或身為兩朝帝師，其實真正致力完成的理想，是啟發、引導光緒皇帝紹承乾隆、嘉慶的文化志業，從御花園絳雪軒到乾清宮昭仁殿，載活也將建立足以顯揚於當代、屬於自己的「天祿琳琅」？

155 一檔館藏宮中檔案全宗，檔號：04-01-38-0030-029，〈奏為遵旨檢查景陽宮書籍與天祿琳琅前後編書目多有不符現擬換籤俟工竣後歸架安設事〉。一檔館網站「資源檢索」原紀年定為「宣統朝」，今可訂正為光緒二十年四月。

156 劉蕃，《書錄》，附錄一〈天祿琳琅目外書〉，頁 635-698。



清人蕭穆根據江標轉述聽聞自南書房翰林所言內容，記下光緒朝曾經展開編纂《天祿琳琅目錄四編》，還提到彼時清查內府宋、元善本的範圍，涵蓋景陽宮、慈寧宮、翰林院、清祕堂、寶善亭等處，且編目著錄兼載行格，其體例之完備，更勝前朝。<sup>157</sup>而在翁同龢日記中，也有光緒二十年六月二日「上命臣偕孫某會南齋詣景陽宮檢書」、六月十日「至寶善亭看藏書」的記載，<sup>158</sup>時間點正好接在清查昭仁殿「天祿琳琅」之後，可以證明江標所聞、蕭穆所記確實不虛。本節將綜合年譜、檔案以及現存實物，嘗試探察其間的關聯性，或可提供若干新的文獻佐證，進而重新追索、想像、勾勒「天祿琳琅」「四編」書的善本特藏輪廓。

### （一）景陽宮：典藏格局與書籍清單

陸寶忠同樣參與了檢查景陽宮書籍的工作，其自記年譜對於這段親身經歷，留下較多也更具體的工作印象和細節描述：

（光緒二十年四月）十一日，上諭南齋諸臣至景陽宮檢書籍、字畫。宮為乾東五所之一，距乾清宮約里許，正殿五間，滿儲書籍；兩旁木壁中，皆宋、元、明磁器；左、右有大柜四，皆係字畫；後層為御書房，乃文宗初年讀書之所，亦有珍本在架上；兩廂各三間，皆藏殿本各書及舊鈔本，盈牀插架，年久失修，塵封尺許。【有何義門手校宋本三《禮》、影鈔《六一集》，最精；餘舊刻甚夥，不勝記載。此三年手翻目覩，皆海內罕有之本，當年未錄副目，至今以為恨】初，偕同直往視，幾無從着手，嗣後寫差事畢，即詣景陽宮，午正甫散，約兩閱月甫粗了。書分經、史、子、集，宋本、影宋本及舊本之至精者，皆陳設御書房；殿版大部分設正殿，餘分置兩廂。人間未見之本甚多。予手繕檔冊，一存書房，一呈覽。庚子之變，檔冊失去，深以未錄副本私藏為憾。字畫亦徧閱，大約宋以前贗鼎居多，元、明及國初者半，皆精品，仍分設柜中；惟磁器未查。<sup>159</sup>

透過這段陸氏追憶過往經歷的文字，適度填補了後人想像當時景陽宮內典藏陳設

157（清）蕭穆，《敬孚類叢》，卷9，〈書記·記天祿琳琅目錄三四兩編本〉，葉1a-2b。另參考劉蕃，《天祿琳琅研究》，第三章第四節〈關於《天祿琳琅書目》「三編」、「四編」〉，頁214-221。

158（清）翁同龢著，陳義杰整理，《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年甲午〉，冊5，頁2705、2707。翁氏且記下此時清祕堂所存《永樂大典》「剩八百餘本」。

159（清）陸寶忠編、陳宗彝續編，《陸文慎公年譜》，卷上，「光緒二十年甲午四十五歲」，頁62-64。

格局的史料基礎：正殿是以新舊書籍搭配瓷器、書畫，<sup>160</sup> 建構出琳瑯滿目、雍容精雅的藝文空間。專就書籍觀之，景陽宮正殿五間擺滿了各種書籍；後殿區的御書房是文宗奕訖（1831-1861，1850-1861 在位）繼位後讀書治學的地方，多藏舊刻或影宋鈔珍本；御書房東配殿靜觀齋與西配殿古鑑齋，則主要存放武英殿本與舊鈔本。根據學者研究，紫禁城東六宮區御書房、靜觀齋、古鑑齋三處懸掛的滿漢合璧匾額，皆係咸豐九年（1859）皇帝御題，將滿文從音譯改為意譯，分別表示「皇帝的書房」、「肅靜觀看之齋」以及「賞鑑古物之齋」，與同一時期改建後西六宮長春宮區轉型為接見朝臣、處理國政的空間功能相輔相成、互為表裡。<sup>161</sup> 換言之，御書房區遺存的珍稀圖書，或許也是咸豐皇帝仿倣前朝匯聚宮廷善本特藏的延續，只是隨著宮殿區域關閉，御書房藏書逐漸湮沉不為外人知曉，直到光緒朝的這次全面清查，塵封多年的舊資產遂再度成為重寫鑑藏新頁的實物基礎。

南書房諸翰林奉旨來此檢查書籍，要求逐一點檢，且須考定版本時代，再區分部類，寫換掛籤；歷時約二個月，初步完成各項清查整理工作，需再等到景陽宮修繕竣工，才能將書籍全數歸架並開單呈覽。依據陸寶忠年譜所記，重新規劃安頓的典藏空間，景陽宮正殿主要陳設大部分的武英殿版圖書，御書房區則是典藏書品上佳也最顯貴重的宋本、影宋本與歷代舊刻、舊鈔精本。以上所有書籍，皆按照經、史、子、集四部排架度貯；景陽宮容納不下的殿版官書，再分置御書房兩側的靜觀齋與古鑑齋。臺北故宮典藏宮中檔案有一件摺片，當是此時陸寶忠「手繕檔冊」收存於南書房的繕錄副本：

四月十一日，臣等奉旨清理景陽宮書籍，遵即逐加查檢、考定時代、分別部居。於殿座脩葺工畢後，謹遵旨按部換籤、歸架安設。現已一律完竣，開列三單，恭呈御覽。<sup>162</sup>

南齋翰林呈覽之「三單」，或許即是分別開列景陽宮、御書房、靜觀齋三處安設書籍清單；臺北故宮藏有一件〈景陽宮正殿安設書籍清單〉，正是其中之一。清單

160 臺北故宮典藏光緒朝宮中檔案，有一件〈景陽宮櫥內字畫冊子清單〉，載錄「冊子字類」34件、「冊子人物類」13件、「冊子花鳥類」40件、「冊子山水類」96件。此件繕錄字體與本文前節所述清查書籍諸份清單如出一手，應即當時檢查景陽宮字畫後所列清單。臺北故宮藏宮中檔，統一編號：故宮 154323。

161 張杰，〈故宮東六宮區意譯滿文匾額初探〉，《故宮學刊》，總第 16 輯（2016.7），265-274。

162 臺北故宮藏宮中檔，統一編號：故宮 154308，〈四月十一日奉旨清理景陽宮書籍事〉。

起首曰：

景陽宮正殿安設各書籍，皆國朝所刊本。<sup>163</sup>

此與陸寶忠年譜所述相符。其後分四部開列陳設書籍名目，每書記其名稱、函數（間有不記者）、冊數、重本情形，總共載錄經部 134 部、史部 70 部、子部 61 部、集部 107 部；清單最後登載「東西壁櫃榻上原設」書籍如石經、聖訓、御製詩文集等共 11 部，末云「今重加整理，照舊安設」，維持咸豐時期殿內藏書舊制，整體規模頗見宏大。全部景陽宮正殿書籍中有 4 部，天頭黏貼黃箋，該條之下又以朱筆註記如「儲秀宮要去」，乃是被慈禧太后調取；「唐詩正一函七冊」下另記「於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交回本處」（圖 7），可見這份清單乃至於本文所徵引其他筆跡相同、工作性質或呈報內容相近的奏摺暨附片清單等文件，想必皆是由陸寶忠親手繕錄、南書房收存備查且隨時註記陳設書籍出入情形的檔冊副本。

另有一份〈靜觀齋安設書籍清單〉，起首曰：

靜觀齋安設各書籍，明版經、史、子部在南裏間，集部在中一間。<sup>164</sup>

本件格式、體例同於〈景陽宮正殿安設書籍清單〉，載錄經部 67 部、史部 61 部、子部 116 部、集部 337 部，<sup>165</sup> 其後又附載「靜觀齋北裏間安設各書籍」，內容包括「各種官書」、「重出各書籍」、「各種時文」、「單本書」、「地輿礮臺圖冊」等項共 138 種。顯然是在全面清查並重新整理景陽宮各殿書籍後，將靜觀齋之南裏間、中一間規劃為典藏明版圖書的專區，當中還有若干逸出「天祿琳琅」前、後二編書目著錄內容之外，傳世頗罕的珍稀品目。例如：經部之趙光大《講易手錄》，史部之姜志衡《先餘錄》，子部之馬如麟《六稽雜錄》，集部之何喬遠（1558-1632）《何氏萬曆集》、張以誠（1568-1615）《（張宮諭）酌春堂集》、李嵩《醒園文略》、朱奠培（1418-1491）《（懶仙）竹林漫錄》……等等，目前考知僅見北京故宮圖書館有藏，當即昔日舊藏於景陽宮靜觀齋之明版古籍，俱係陸寶忠所謂「人間未見之本」。此外，經部書中另收入二種日本刊本，內容包括《書經》、《大學》、《中庸》、《孝經》等書，反映當時東亞漢籍循環交流的一小片段。

163 臺北故宮藏宮中檔，統一編號：故宮 154322，〈景陽宮正殿安設書籍清單〉。

164 臺北故宮藏宮中檔，統一編號：故宮 154315，〈靜觀齋安設書籍清單〉。

165 後來經部另以墨筆添入「禮經會元節要一套四冊」，子部添入「沈括夢溪筆談一套八冊」，地輿礮臺圖冊添入礮臺分圖、刻本、鈔本共 13 種，皆續為增補安設者。

## (二) 御書房：光緒朝善本特藏核心

依循前述史料線索類推，陸寶忠所繕錄奏呈之「三單」，理應還有一份〈御書房安設書籍清單〉，惜乎未能檢得，亦無從確知原奏摺是否尚存人間？極可慶幸者，是這件檔案猶有鈔錄本可資查考，適足作為本文考探光緒皇帝意欲賡續整編「天祿琳琅」「四編」善本特藏暨書目的關鍵文獻。

北京故宮典藏一件《景陽宮清查書籍冊》，封面題有「光緒二十年甲午七月」，<sup>166</sup>正是陸寶忠年譜所述檢查景陽宮書籍「約兩閱月甫粗了」再等待宮殿修繕完成後擬摺開單進呈的時間。該冊多用「松竹齋」印製之九行稿紙鈔寫，第一部分即為御書房各處安設書籍清單；起首文字說明的格式、語氣，和前文所述〈景陽宮正殿安設書籍清單〉、〈靜觀齋安設書籍清單〉幾乎如出一轍，曰：

御書房正殿中間安設各書籍，均係宋元版及翻宋版、翻元版之佳者。<sup>167</sup>

其後載錄「宋版經部」16部、27函、173冊，「宋版史部」10部、38函、368冊，「宋版子部」7部、13函、109冊，「宋版集部」9部、9函、35冊，「元版經部」6部、5函、39冊，「元版史部」3部、11函、84冊，「元版子部」3部、22函、205冊，「元版集部」2部、3函、14冊，「翻宋版」17部、33函、271冊，「翻元版」6部、13函、97冊；總計79部、174函、1,395冊。<sup>168</sup>（圖8）儘管規模遠遜於乾隆、嘉慶二朝，版本時代也未必盡如清單所列那般真確，但這份清單的分類排序方式，已經不像前述現存書單或補查書單先以經、史、子、集四部為綱，再按版本時代排序，而是完全沿襲「天祿琳琅」書目的結構，並仿倣前、後二編書目加入影宋鈔諸部的概念，設置「翻宋版」、「翻元版」二類，不僅在編目條理上僅次於宋、元版，實際安頓這些書籍的典藏陳設位置，也和宋刻、元槧、舊鈔同在御書房內，而有別於存放在靜觀齋的其他明版古籍；如此安排，意圖抬升明版佳槧之肖似宋、元舊版的文物價值和收藏意義，格外顯豁。

166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內廷東路·東六宮區·景陽宮等〉，冊8，頁515。

167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內廷東路·東六宮區·景陽宮等〉，冊8，頁516。

168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內廷東路·東六宮區·景陽宮等〉，冊8，頁516-526。其中，「宋版經部」之《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宋版子部」之《大學衍義》、「宋版集部」之《南軒文集》、「元版經部」之《禮經會元》第二部、「翻宋版」之《國語》等5部書，只記冊數，不記函數，可能原本藏放時便無函套裝具。

在這份清單最末，尚有用不同字體接續鈔錄的內容。起首曰：

光緒乙未九月，由天穹寶殿前庫移設御書房中間。<sup>169</sup>

天穹寶殿鄰近景陽宮東側，始建於明朝，乃清代皇家祭祀昊天上帝的道教齋壇。殿中陳設書籍，多以道經為主，西配殿則固定陳設有宋版《道德經》、《真武啓聖記》，元版《真武經》、《道德經集解》，明版《玉皇經》、《玉樞寶經》、《北斗經》等約 10 部。<sup>170</sup> 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年）七月下旬，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不久，陸寶忠等人即奉旨清查天穹寶殿等處長期未經檢點的內府藏書，持續從中挑選珍貴的宋、元版書乃至舊鈔精本，移往景陽宮御書房中一間貯藏，遂在清單後續補二類：「宋版類」載列《詩集傳》等 5 部、3 函、32 冊，「元版類」載《博古圖》等 5 部、24 函、231 冊；宋版《漢雋》與元版《昌黎文集》下皆有小字註「蟲蝕」。<sup>171</sup>（圖 9）

關於光緒二十一年這波宮廷藏書的清查、整理、調撥、移藏等工作，陸寶忠門人陳宗彝續編之《陸文慎公年譜》記曰：

七月，轉補翰林院侍讀學士。上派查天穹殿、古董房書籍，皆數十年來未經檢點者。塵封蠹蝕，悉度正。月餘，始畢。於此見先朝嗜學之篤與公趨事之勤焉。<sup>172</sup>

尋檢臺北故宮典藏光緒朝宮中檔案，恰有二件清查工作結束後陸氏親書的奏摺，可與陳設清單、年譜所記相互繫連、印證。陸氏奏曰：

七月二十五日，奉旨清查天穹寶殿前庫所藏書籍。臣等遵即逐日前往清查，現已分別布居，加籤歸架。謹繕清單，恭呈御覽。所有西間各架舊藏歷朝《時憲書》，一併分析整理。惟東間清文書籍甚多，臣等無從辨晰，可否請旨派通習繙譯之員前往恭查之處，伏候聖裁。<sup>173</sup>

169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內廷東路·東六宮區·景陽宮等〉，冊 8，頁 526。

170 參考王子林，〈天穹寶殿考〉，《故宮學刊》，2015 年 1 期，頁 181-198。另詳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內廷東路·天穹寶殿區〉，冊 10，頁 189-320。

171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內廷東路·東六宮區·景陽宮等〉，冊 8，頁 526-527。

172（清）陸寶忠編、陳宗彝續編，《陸文慎公年譜》，卷下，「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四十六歲」，頁 69。

173 臺北故宮藏宮中檔，統一編號：故宮 154305，〈七月二十五日奉旨清查天穹寶殿前庫所藏書籍事〉。

又奏曰：

七月二十七日，由懋勤殿傳旨，命查古董房書籍。臣等逐日恭詣清查歸架後，復奉旨分別移設景陽宮。遵即逐一檢點，所有宋、元版各部及舊鈔精本，移設御書房；其版本較善之書，謹就古鑑齋、靜觀齋所有各架鱗次安設，已無隙地；其餘各書，除留存古董房正間各架外，分置前庫，地較爽塏，現已一律完竣。謹分繕清單，恭呈御覽。此外，蟲蝕過甚、殘缺不全及坊行甚陋之本，另設前庫格頂，合併聲明。<sup>174</sup>

陸寶忠等南書房諸翰林清查天穹寶殿前庫書籍的清單，目前雖尚未查知，惟藉由傳鈔書單，至少可以掌握從此處移藏御書房陳設的 10 部宋、元版書。至於古董房現存書籍清查完畢後，本已全部歸架，卻接到光緒皇帝新的諭旨，要求將特定兩類書籍移入景陽宮區：一是但凡宋、元版暨舊鈔之四部精善書籍，悉數移歸御書房庋藏；二是篩選出版本校勘價值較高或流傳較為珍稀者，調撥至古鑑齋與靜觀齋存貯。其餘遺留在古董房的書籍，則分別安置於正間與前庫。今檢得臺北故宮藏有〈御書房添設書目清冊〉、〈靜觀齋添設書目清冊〉以及〈古董房留存書目清冊〉，<sup>175</sup> 應該就是這件奏摺所附的三份清單。而在辦理完皇帝交付的全部工作之前，陸寶忠也曾經奏報大規模搬動藏書所遭遇的困難並擬議執行順序。奏曰：

臣等伏蒙派查古董房藏書，當即親詣藏書處所，敬謹瞻仰。中間及東二間書架林立，卷軸太多，固非半月所能藏事。又地勢逼狹，時值隆冬，鑪火既屬不便，且日光隔闕，燈光紛雜，亦非敬慎之道。非春日和煦，不能將書籍移出院內。擬俟春融等日，即當通力清釐。除先行安置御書房西配殿各種書籍外，所有古董房書籍暫時未便動查緣由，理合具陳。<sup>176</sup>

據以推測，從光緒二十一年七月下旬至九月間，陸寶忠等人陸續完成天穹寶殿前庫與古董房藏書的清查工作。先是將從天穹寶殿前庫檢出的宋、元版書移設御書房，因數量不多，得以即時完成；而再度受命要將古董房已經各歸原架的精本、

174 臺北故宮藏宮中檔，統一編號：故宮 154306，〈七月二十七日由懋勤殿傳旨命查古董房書籍事〉。

175 臺北故宮藏宮中檔，統一編號：故宮 154311，〈御書房添設書目清冊〉；統一編號：故宮 154316，〈靜觀齋添設書目清冊〉；統一編號：故宮 154317，〈古董房留存書目清冊〉。

176 臺北故宮藏宮中檔，統一編號：故宮 154306，附片一〈奏為御書房西配殿各種書籍外所有古董房書籍暫時未便動查緣由〉。

善本從中提取移設景陽宮時，或許已在當年的十月以後，因慮及數量、氣候暨安全等因素，只能先移動部分書籍到古鑑齋安置，至於奏摺所稱「一律完竣」的時間，當要延至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季。

三份清單中最值得注目者，正是〈御書房添設書目清冊〉。（圖 10）本件分二類開列：一為「御書房中間添設書目」，計有宋版 13 部，元版 12 部，翻宋版 3 部；一為「御書房東暖閣添設書目」，載錄宋、元、明鈔本 4 部。書單上原本載錄的「宋版禮經會元節要一函」以及「宋版沈括夢溪筆談一函」，<sup>177</sup> 後來用紙條黏貼遮蔽，乃是因為仔細考察後發現這二部皆非真正的宋版書，於焉撤出，改移入主要存放明版書籍的靜觀齋收藏，南書房存檔的〈靜觀齋安設書籍清單〉也同步註記添補。（圖 11）陸寶忠奏曰：

再臣等前查古董房書籍，內有原標宋本《禮經會元節要》，沈括《夢溪筆談》二書。臣等細加考證，知非宋版，應請旨將此二書分別移入「明版經部」及「明版子部」書內，以免淆雜。<sup>178</sup>

最後留下 30 部宋元版、翻宋版與歷代鈔本，他們都是原藏古董房的珍稀古籍，如今皆為皇帝欽命入藏御書房，和其他 79 部書並置於正殿及東暖閣，不僅代表書籍自身兼具歷史、學術、文物等豐厚意義與價值，被賦予尊崇的典藏陳設位階；更重要的，是這批宋元佳槧、舊鈔精本以及靜觀齋中的明版四部群書，共同建構起景陽宮後殿御書房作為光緒年間皇家善本特藏新的核心區域。

再回到那份以松竹齋稿紙鈔錄的《景陽宮清查書籍冊》。接續御書房正殿安設書籍清單之後，是東暖閣安設書籍清單，起首曰：

御書房東暖閣安設各書籍，皆鈔本。<sup>179</sup>

177 經查《故宮物品點查報告》，點查字號「律字二二二一三」著錄「禮經會元節要 一函（四冊明版）」；此書現藏北京故宮圖書館，已影印出版。參見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 2 編第 5 冊《景陽宮》，卷 2，〈御書房〉，頁 2；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經部·禮類〉，冊 11，頁 1-61。至於所謂「宋版沈括夢溪筆談一函」，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字號「律字二〇八」，被放置在一張「描漆花方桌」（「律字二〇〇」）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著錄為「元版夢溪筆談 八本」，實係明刊本，現藏於臺北故宮，統一編號：故善 008110-008117，1 函 8 冊。參見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 2 編第 5 冊《景陽宮》，卷 1，〈正殿〉，頁 68-69。

178 臺北故宮藏宮中檔，統一編號：故宮 154306，附片二〈奏為原標宋本禮經會元節要沈括夢溪筆談二書非宋版請旨移入明版事〉。

179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內廷東路·東六宮區·景陽宮等〉，冊 8，頁 528。

其後載錄「鈔本經部」96部、「鈔本史部」24部、「鈔本子部」59部、「鈔本集部」28部，總計207部。<sup>180</sup>（圖12）當中經部收錄二部影宋鈔本（「影宋鈔春秋張氏集註八冊」、「影宋鈔春秋繁露一函四冊」），並未延續前朝獨立一類的做法；另有一部《論語》記為高麗鈔本，<sup>181</sup>是唯一的域外鈔本；復收入四種清代御製書籍，可見御書房特藏圖書的時代範圍更為擴大，刻本仍限於明版以前，鈔本則降至清。

東暖閣書籍清單之後，是「御書房西暖閣安設各書籍」，載錄8部版本類型（刻本、鈔本皆有）、時代（宋版1部、清本7部）、內容（經、史、子部兼備）各異的書。僅陳設一部宋版巾箱本《禮記》，其餘諸如「古香齋袖珍十種」之《史記》與《淵鑑類函》，再有《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欽定勦平粵匪方略》、《欽定勦平捻匪方略》，<sup>182</sup>皆屬累朝欽命敕纂之書，旨在銘誌昭代功業，似乎概與鑑藏無涉。此外，西暖閣內陳設一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二函十冊」，本不足為奇；書籍清單卻又另外載錄一部「天祿琳琅摠書目一函二冊」，則頗費猜疑。（圖13）此條只記作「天祿琳琅摠書目」，究係為「總」乾隆、嘉慶二編著錄書籍之簡目？抑或是乾隆六年那部交由造辦處更換書套木胎的絳雪軒12卷本《天祿琳琅書總目》傳存至今？又或是一部彙整光緒朝御書房各處典藏陳設書籍而仍承沿「天祿琳琅」名號的總目？既然只裝訂為二冊且已盛函，容或此時仍為南齋翰林繕錄進呈的擬目，猶未編定賜名？文獻既不足徵，徒留臆揣於此。

自御書房西暖閣陳設書籍以降，迄至整份《景陽宮清查書籍冊》結束，則是鈔錄南書房存檔備查的「景陽宮正殿書目」與「靜觀齋安設書籍」，即前述現藏臺北故宮的宮中檔案。因此，若將御書房、景陽宮、靜觀齋這三處陳設書籍清單匯合並觀，他們正是光緒二十年南書房翰林奉旨清查景陽宮區陳設書籍所開列

180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內廷東路·東六宮區·景陽宮等〉，冊8，頁528-549。集部最後有以不同筆跡增補「四書五經一部四夾板」，小字註「計四十五本 魯局本」。應為後來置入東暖閣書架之山東官書局刊本，故不列入「鈔本集部」計數範圍。

181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002610-002614。1函5冊，朱紅灑銀箋書衣，金箋書籤，籤題「魯論 高麗國抄本」，黃高麗紙掛籤題「高麗鈔本論語 全函」。全書經文旁均附日文片假名，實為日本鈔本，又各冊首葉鈐「汲古閣」朱方。張允亮《故宮善本書目》著錄為「景鈔日本正平本」。參見張允亮編，《故宮善本書目》（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民國二十三年故宮博物院排印本，請求番號：別045-0005），第二編〈天祿琳琅錄外書目·鈔本經部〉，葉58a。

182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內廷東路·東六宮區·景陽宮等〉，冊8，頁550。



「三單」呈覽的完整內容。陸寶忠遺憾自己未曾錄副私藏，幸而彼時尚有其他同僚——甚至可能正是倡議促成這一連串藏書調查活動的翁同龢倩人傳鈔——留下這件檔冊副本，一直保留在北京故宮，成爲今日查考光緒朝廷續皇家善本特藏或文物鑑藏傳統的關鍵線索，也讓因緣際會建立關係、相銜互繫的文獻檔案，織成一組重新發現清宮「天祿琳琅」「四編」書的核心史料。

### （三）從實物驗證四編書的可能面貌

光緒二十年對於乾隆、嘉慶時期「天祿琳琅」藏書的全面清查，最終促成了宮廷古籍善本特藏重心的轉移乃至重建。透過本文列舉的若干歷史文獻，或可推測光緒皇帝命南書房翰林檢查宮中珍藏古物、書畫各處所，「稽檢宋、元本書，編排目錄」、「編爲天祿琳琅目錄四編」<sup>183</sup>的基本格局與藏品來源，其實是以咸豐朝遺留在景陽宮後殿御書房區所藏的舊刻、舊鈔珍本爲基礎，進行整理；甲午戰後，再從鄰近的天穹寶殿、古董房等處，調撥宋元版、舊鈔精本與其他版本較善之書，加以充實，特藏空間主要包括御書房與靜觀齋。換言之，從乾隆初年御花園內的絳雪軒，轉往乾清宮東移昭仁殿，再到百餘年後景陽宮御書房，古籍作爲清代皇帝古物鑑藏對象的精神意脈未曾泯滅，屬於光緒朝的「天祿琳琅」也在宮中歡慶慈禧太后六旬壽辰這年正式復甦、成立。

至於御書房善本特藏的規模數量，光緒皇帝是否也有意兼收博採，冀能更勝前朝？儘管四編書目的纂輯因甲午戰爭而中輟，後來也未能接續完成，吾人猶能藉由存世的清宮檔案拼湊、勾勒出一個大概的輪廓——北京故宮所藏松竹齋傳鈔《景陽宮清查書籍冊》中的御書房正殿中間與東暖閣安設書籍清單，加上臺北故宮藏〈靜觀齋安設書籍清單〉中的南裏間與中一間部分，即是光緒二十年七月之前初步建立的藏書規模。光緒二十一年九月至翌年春季間，從天穹寶殿移入御書房的宋、元版書，同樣見諸《景陽宮清查書籍冊》增補；從古董房調撥的善本，則載於臺北故宮藏〈御書房添設書目清單〉與〈靜觀齋添設書目清單〉。前、後二部分書單相加，總計約 1,041 部。<sup>184</sup> 略如下表所示：

183 (清) 蕭穆，《敬孚類藁》，卷 9，〈書記·記天祿琳琅目錄三四兩編本〉，葉 1a、2a。

184 鑑於各書單中有許多書籍本無函套，登載時只記冊數不記函數；另有許多書籍，只記函數、不記冊數，故本文此處暫不列出統計之函、冊數量。目前粗略合計得出光緒朝「天祿琳琅」四編書共約 1,581 函、9,423 冊，也只是各書單確有載示數字之總和，並非、也暫時無法精準統計出御書房、靜觀齋實際藏書數量，不可據以和《前目》、《後目》著錄數量相比較。

表五 光緒朝御書房善本特藏數量統計表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合計
宋版	部	20	17	12	9	58
元版	部	10	8	8	5	31
翻宋版	部	12	3	2	3	20
翻元版	部	2	0	4	0	6
鈔本	部	99	34	64	28	225
明版	部	68	65	397	396	926
總計	部	112	93	423	413	1,041

倘若再仔細排比整合這幾份陳設書籍清單，按照四部分類架構將少數分類失誤的書各歸其類，<sup>185</sup> 幾乎就可以視為一份最為簡略的《天祿琳琅書目四編》初稿了，而這也和蕭穆〈記天祿琳琅目錄三四兩編本〉所記傳聞史事大致相符。

在這份書目當中，有不少書籍至今仍然存世，部分現藏臺北故宮。例如原本藏放於御書房中間的南宋紹熙建刊《纂圖互註毛詩》、蜀刻初印《論語筆解》、國子監本《爾雅》、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錦溪張監稅宅刊《昌黎先生集》、嚴州本《南軒先生文集》，元至順官版《四書集義精要》、日新書堂刊《朱子成書》、慶元路儒學刊《玉海》、大德本《元豐類藁》，汲古閣翻宋版《說文解字》，籍山書院翻元版《重刊本經史證類大本本草》等；再如後來從古董房調撥移藏御書房的宋版《四朝名臣言行錄》，金版《泰和五音新改併類聚四聲篇》、《崇慶新彫改併五音集韻》（此二部書單記為「元版」），元版《詩經疑問》，添設於東暖閣的影宋鈔《類篇》、影元鈔《四書箋義》、明鈔《孝經總類》、《永樂琴書集成》、《歷代祭祀儀注》等，<sup>186</sup> 確實頗稱珍稀，不乏傳世孤帙。此外，也有許多書籍歷經時代變遷與文物流轉，未嘗離散佚失，一直遺留在紫禁城內，現藏北京故宮圖書館；這些大多屬於清代早期的內府鈔本，原本皆度藏於御書房東暖閣，晚近有賴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影印出版，始為世人所知。經初步核對，即檢出經部有

185 例如：〈御書房安設書籍清單〉中，「宋版子部」載「晁公武讀書志一函五冊」，應入史部；〈靜觀齋安設書籍清單〉之「子部」載錄三部《文心雕龍》，應入集部。

186 以上所列臺北故宮典藏古籍，皆可於故宮「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檢得基本資料，各書現存之函、冊數量，亦皆與陳設清單所列相吻合。另可參見張允亮，《故宮善本書目》，第二編〈天祿琳琅錄外書目〉；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

《周易義例》、《易圖解》、《周禮正義》、《律呂新書》，史部有《龍虎山志》，子部有《三三等數圖》、《算法纂要總綱》、《類苑麗語》、《事類異名》、《類苑菁華》、《增訂馬經》、《梧岡琴譜》，集部有《御選唐宋元明詩》、《明代選屑》等十餘種。據此推想，理應還有更多御書房、靜觀齋特藏古籍遺存海內外，等待著被後人尋訪、發現並確認他們和光緒朝御書房善本特藏的連結關係。

藉由已知存世的「天祿琳琅」四編遺書，還可以觀察這個宮廷善本特藏新階段、新局面的裝潢樣貌或規格，俾有助於據以類比或核對其他具備共同特徵的古籍典藏，從而更細緻地梳理其傳藏脈絡。首先，有若干書籍，必然是易代鼎革之際，接收前明皇宮的遺存，入清二百餘年猶未改裝，大致保留明代內府書藏原貌。例如御書房東暖閣安設書籍清單之「鈔本史部」登載「直省土產便覽輯要五部五冊」，臺北故宮典藏三部，明朱絲欄朱墨鈔本，首行題「天下各省直府州縣所屬地方出產土物類總集要」或「天下各省直府州縣所屬地方出產土物類總揭帖」，書籤、套籤題「直省土產便覽集要」；其中一部為杏黃素緞書衣，包背裝；<sup>187</sup> 另二部經摺裝，殼面覆以杏黃暗花緞，<sup>188</sup> 三部皆收貯於明黃素緞插套內。再如書單所載「明帝后妃紀略六部六冊」，臺北故宮典藏五部，四部為明萬曆間朱絲欄鈔本，一部烏絲欄鈔本，卷端題「皇明帝后紀畧」；<sup>189</sup> 其中四部朱絲欄本仍保留原有的月白鳳鳥雲紋暗花緞面書衣，同材質書籤四周以墨筆繪製外粗內細的邊框，籤條下再墊一層略大於書籤的朱紅暗花緞，形成一道鮮明的外框，此乃明代內府藏書最典型的裝潢材質、樣式。又如「鈔本子部」所載之「兵法丹書一部五冊」，內含《星書秘要》一卷、《武經總規袖中金》三卷、《兵書秘奧》一卷、《俊靈機要》一卷、《臨爐機要》三卷附《臨爐直指》三卷等五種著作，<sup>190</sup> 罕聞書目著錄，殆為孤本；書冊採包背裝，書衣選用明代宮廷藏書常見之杏黃鳳鳥雲紋暗花緞，其裝幀規制與臺北故宮典藏之明成化間內府寫繪《御製新集斷易精粹》如出一轍。儘管上述各書，皆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在昭仁殿內檢得，但憑其版本特徵，仍可確信它

187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02671。

188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13163，故善 013164。此書圖版，可參見宋兆霖主編，《護軼有道：古籍裝潢特展》，頁 50-51。

189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02655、故善 013157、故善 013158、故善 013159，以上四部為朱絲欄鈔本；故善 013160 為烏絲欄鈔本。

190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02682-002686。《武經總規袖中金》卷中、卷下卷端題「武經玉鑑袖中金」，後附〈武經玉鑑袖中金占法〉、〈六壬運移賦〉。

們都曾屬於景陽宮御書房特藏，後來再經流轉遷調至其他殿閣。

其次，是康熙年間皇帝將宮中舊藏古籍或進呈所獲善本發下重新裝潢，改分冊數、配製匣套，若干書中尚留有改裝時註記的白紙方籤，可據以建立彼此的關聯性。部分重裝後的書籍，歷經乾、嘉兩代帝君廣徵遺書、遍蒐珍秘的浪潮皆未現身，日漸沉埋，直到清季才終於再度匯聚於御書房；裝幀如舊，不減當年端莊雅緻的風貌。例如「元版經部」所載「四書集義精要一函十冊」，乃舉世僅存的36卷足本，而乾隆朝四庫館臣據以繕校、後來流入內閣大庫之元槧底本，則佚闕12卷；<sup>191</sup> 御書房藏本書衣染藏經紙色，書籤用米色素絹，內有浮籤記曰：

《四書集義精要》原一套二十本，五十五年三月十一日暢春園發下，改一套十本。元集賢學士劉因編集，前有至順年中書省咨翰林院文，並供給繕寫官吏職名。元板。(圖14)

此書後來進入光緒帝瑾妃（1873-1924）居住的永和宮，<sup>192</sup> 直到清國覆沒、皇室成員離開紫禁城前，未再易主。再如光緒二十一年御書房添設之元版《詩經疑問》以及東暖閣所藏舊鈔本《濂洛風雅》，<sup>193</sup> 分別在康熙五十八、五十九年（1719、1720）發交臣下，將原本裝訂為二冊與三冊的書均改作一冊，選用相同的淡粉色灑金箋書衣，黃絹包角，米色絹書籤，且改配插套而不用一般四合函套；根據臺北故宮典藏實物，猶可見《濂洛風雅》書冊上、下以石青素絹裱糊之紙合背板夾護，再置入明黃地六角球紋織錦插套貯存之原貌。此外，尚有康熙南巡期間所獲貢進書籍，改頭換面後同樣成為皇帝賞賜的禮物或宮廷陳設的珍品。例如據南宋書棚本影鈔之《宋詩秘本》，<sup>194</sup> 明黃箋書衣，黃絹包角，米色絹書籤；宮中改裝的同時，兼為之剝補訂正錯字，故書中夾附二紙浮籤，記曰：

南巡帶來《宋詩秘本》，原一套十本。四十四年五月初八日，暢春園發

191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14189-014198，平圖 000551-000559。前者為御書房藏本，首尾完具；後者係《四庫》底本，《四庫》本《四書集義精要》存28卷，其中卷9、10、20、21又皆註曰「原闕」，原書傳存至今則另闕卷3、4。參見（元）劉因，《四書集義精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02，頁149-329。

192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登載此書之點查編號為「歲字五九〇」。參見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2編第3冊《承乾宮、永和宮》，卷2，〈永和宮〉，頁30。

193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02117、故善 003546。

194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02049-002050。

下，去襯紙，改一套二本。乃選集宋朝趙崇鈔等十一人之詩，鈔寫成部。未記年、月並寫書人姓名。

另籤又記：

《宋詩秘本》，改錯字二十三個。

此帙原書套已佚失，今存綠地龜背紋仿宋錦四合套，乃是同治、光緒時期大量修復宮中藏書常見的錦套款式，且無套籤，當即後製之物。再如靜觀齋度藏之明版《濂溪集》，原書一套三冊，康熙四十六年於暢春園發下抽除襯紙，合訂為一冊，書衣用明黃灑金蠟箋，黃絹包角，米色絹書籤、套籤，書套則同樣改為插套，套面以湖綠卍字蝠獸紋織錦糊飾。<sup>195</sup>這幾部書，也大致反映出康熙朝裝潢古籍善本的共同元素和美學風格：書衣多用各色箋紙，或素面，或灑金；包角材質同為黃色素絹；書籤、套籤概用米色素絹題寫，籤題不標註版本時代；書套裏覆各色織錦，總以雍雅典麗為尚。

而在御書房東暖閣所安設之「鈔本經部」書籍清單中，還集中登載了七部書名之上皆加冠「大本」二字的藏書，分別是：

大本《尚書通考》一函六冊

大本《論語全解》五冊

大本《春秋權衡》四冊

大本《五經說》二冊

大本《學易說》二函八冊

大本《尚書》一函一冊

大本《太平經國之書》一函二冊

其中如《尚書通考》、《論語全解》、《春秋權衡》、《五經說》、《學易記》、《太平經國之書》等六部，憑其函、冊數量與臺北故宮藏本相覈，完全一致。六部皆為烏絲欄連四紙精鈔，書冊寬大；書衣皆用杏黃鳳鳥雲紋暗花緞，米色絹包角，明黃素緞書籤，籤題書名暨冊次，五眼線裝；予人之視覺暨觸感頗顯沉實厚重，氣象

195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09241。此書圖版，可參見宋兆霖主編，《護帙有道：古籍裝潢特展》，頁 102。

尊貴。<sup>196</sup>（圖 15）諸書各卷繕錄書法互有異同，當是出自數人合力鈔就。部分書籍留有黃高麗紙掛籤，以墨筆題如「鈔本大本尚書通考 全函」、「鈔本大本五經說 二冊全」等字樣，正與東暖閣書單所載相吻合。再按《尚書通考》中「玄」、「胤」皆缺末筆，「弘」、「曆」俱不改字，（圖 16）推測這六部當是雍正年間內府製作，或臣工精鈔進呈一系列用備宮廷陳設的「大本」經書，最遲於咸豐時期便已貯藏於御書房中，光緒二十一年成爲「天祿琳琅」「四編」特藏善本，後來又從御書房東暖閣輾轉移往昭仁殿，直到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故宮物品時再被發現。

至於另一部「大本」《尚書》，同爲臺北故宮典藏。<sup>197</sup> 棉紙端楷精寫，白文、無注，經摺裝，織錦殼面，藏經箋書籤；張允亮《故宮善本書目》著錄爲「明內府朱格大字寫本」，<sup>198</sup> 然全書實無任何界欄格線，（圖 17）故《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將版本改訂爲「明內府大字寫本」。<sup>199</sup> 觀此書之紙色、版式、行格、高廣、字體、朱圈等特徵，無一不與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明寫本白文《四書》相彷彿。<sup>200</sup> 宮內廳本卷末有王世貞（1526-1590）、趙用賢（1535-1596）題識二通，王氏稱寫者書風「結法圓熟端勁，妙不可言」、「波磔處小露鋒鍛」，<sup>201</sup> 鑑定出自明代前期臺閣體名家姜立綱（1444-1499）手筆，是爲東宮太子講論經典所進的白文大字讀本；趙氏儘管點出姜書「頗病譎僞」，然則此本「如宿學老儒，雖姿字不至峻茂，而嚴正可畏」，認爲猶應歸諸姜立綱所書。只不過，這二通題識或許並非王世貞、趙用賢親筆，正文字跡也和真正的姜立綱書法有所落差，則宮內廳所藏《四書》與故宮這部「大本」《尚書》，也只能暫時定位爲反映時人書法好尚品味，刻意模倣「姜字」清勁方正、謹飭嚴整風格的經書寫本。

196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00515-000520、故善 002615-002619、故善 003007-003010、故善 002608-002609、故善 000494-000501、故善 003000-003001。「學易記」書單記爲「學易說」。此六部書冊尺寸皆爲高 41 公分、寬 28.8 公分。雕版刷印烏絲欄稿紙，版框半葉高 22.8 公分、寬 17.3 公分，天地甚寬。

197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00514。

198 張允亮，《故宮善本書目》，第二編〈天祿琳琅錄外書目·鈔本經部〉，葉 50b。

19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冊上，頁 30。

200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文庫」藏古典籍，函架番号：506・32。查檢自「書陵部所藏資料目錄・画像公開システム」（<https://shoryobu.kunaicho.go.jp/>），可線上瀏覽全文影像。（檢索日期：2022 年 10 月 10 日）。

201 此篇題跋亦收錄於（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刊本，統一編號：平圖 015416-015455），卷 162，〈文部·墨蹟跋〉，〈姜立綱書〉，葉 21a。

最後，還可以再舉出二部臺北故宮典藏之清烏絲欄鈔本《易解》與《詩解》，皆屬光緒朝御書房東暖閣舊藏「鈔本經部」書籍；其裝潢材質、樣式完全相同，雙雙映現乾隆時期內府藏書的華麗樣貌。二書皆為一函六冊，明黃灑金箋書衣，黃素緞包角，六眼線裝，素箋書籤，籤題「易（詩）解」；盛以明黃地卍字蜂窩百花紋宋式錦四合套，明黃絹套籤，籤題「易（詩）解 全函」，燦爛悅目，一派天家富貴氣象。<sup>202</sup> 書中「弘」字缺末筆，「曆」則改作「歷」，可知其為乾隆年間鈔本。二書皆無序跋，亦未署著者名氏；觀其內容，實乃根據當時「以經術名於海內」<sup>203</sup> 的學者張敘（1690-1776）所撰《易貫》與《詩貫》改易題名繕錄而成。張氏二書，先後刻於乾隆二十、二十一年，<sup>204</sup>《總目》列入存目，館臣評價其說解《易》圖或《詩》義均不免強於牽合。<sup>205</sup> 然則其為何要改換書名？又是何時或在怎樣的情況下進入宮中？礙於文獻闕如，尚難具體探求原委顛末。

藉由以上簡要列舉光緒朝善本特藏之存世實物，儘管例證未盡周全，猶有助於吾人略窺彼時南書房翰林奉旨在景陽宮御書房區重新恢復、經營「天祿琳琅」「四編」藏書的規模雛型與典藏規制——一千餘部書籍主要分藏於御書房正殿（宋、元版暨翻版書）、東暖閣（鈔本）、靜觀齋（明版）三區，以鈔本及明版書為大宗，卻也摻入不少清版（鈔）書籍；有別於乾隆《前目》設置之〈影宋鈔〉專卷或嘉慶《後目》所立〈影宋鈔諸部〉、〈明鈔諸部〉，著錄數量都不算太多，光緒四編書的「鈔本」則佔據相對獨立的典藏空間與編目位置；所有書籍，大抵維持其原本裝潢樣貌，未因此際再次匯藏宮中古籍而重新改裝或劃一款式；書冊頁面不再鈐用「天祿琳琅」、「天祿繼鑑」相關印記或任何光緒御寶，雖然沒有明顯可

202 臺北故宮藏善本古籍，統一編號：故善 013700-013705、故善 010267-010272。《詩解》原書裝潢樣貌圖版，可參見宋兆霖主編，《護帙有道：古籍裝潢特展》，頁 104。

203（清）史善長編，《弁山畢公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據清同治十一年刻本影印），冊 106，「（乾隆）十七年壬申二十三歲」，頁 131。

204 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 2，〈經部二·易類二〉，冊 1，頁 106-107；同書，同冊，卷 4，〈經部四·詩類〉，頁 194-195。

205《總目》之《易貫》提要云：「是書用注疏本……蓋未知有吳（仁傑）、周（燾）二本也。至圖學傳自邵子，其位置皆依〈說卦〉；周子〈太極圖〉初不言八卦，此書皆強為牽合。又斥諸儒爻變之說……則又過於疑古矣。」《詩貫》提要云：「頗多與朱子異同……其說皆不免於牽合。且各章訓釋已詳經文之下，而又仿〈小序〉之體別為〈本旨〉一卷，冠之於前，於體例亦傷繁贅也。」（清）永瑤、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0，〈經部十·易類存目四〉，葉 11；同書，卷 18，〈經部十八·詩類存目二〉，葉 15b。

資辨識的鑑藏特徵，卻實質延續了乾、嘉諸帝開創的精神傳統，成為清季力圖重振皇家善本特藏的具體成果。既是一記隆重的絕響，也不啻鑿開另一座學術礦藏。

## 六、結語

本文嘗試利用訪查所及的檔案文獻，結合清代內府書目著錄，以及傳世書籍實物，對於清宮「天祿琳琅」善本特藏創立後二百餘年間的藏書史事，諸如：鑑藏源起、典藏規模、清查盤點、藏書餘緒乃至重振新局等方面，力圖補白辨訂，從而驗證或校準學界既有的認知觀點。在研究與寫作的過程當中，冀能探尋不同類型文獻的內在關聯，綴合原本看似片段零瑣的檔案，重建隱密其間的事件邏輯，再進一步讓檔案文獻與古籍實物得以驗證彼此的真確程度和存在意義，最後則是鈎稽書籍和書籍之間的傳藏脈絡並發掘其群組關係。

乾隆皇帝創建「天祿琳琅」，肇始於乾隆元年，以御花園內的絳雪軒作為專門陳設宋版書的善本特藏書室。此後藏品持續累積、擴充，至乾隆六年基本成形；其範圍涵蓋宋、元、明歷代舊刻佳槧，並已編纂一部 12 卷本的藏書總目。乾隆七年，整座「天祿琳琅」特藏移往甫整建竣工的乾清宮東移昭仁殿，康熙寢宮於焉轉型為專門典藏珍稀古籍的御用書房；乾隆九年，再將所有書籍函套更換材質、絹面樣式，此時殿中庋貯插架群書，是為初定之「舊藏」，其後再有獲選榮登昭仁殿的善本，則屬「續入」。清代官方乃至乾隆皇帝自己宣稱「天祿琳琅」自乾隆九年始，或許是基於格外看重這個「甲子」年應當擔負某種開展新局、承先啓後的象徵意義。實際追溯善本特藏的時空原點，弘曆甫即帝位不到半年，便特意建立一處庋藏古籍善本的專屬空間，而將古書視同藝術品般鑑藏賞玩，正是乾隆大規模整理宮廷傳藏文物，開展各類古物典藏陳設版圖的起點。

乾隆朝鑑藏「天祿琳琅」，歷經創始、初定乃至於成型的完善階段，最終編定《前目》的藏書數量，此前學界公認為 429 部；經筆者詳細核對，實為 430 部。這一部之差，乃因學者點校整理時尚難採用內府鈔本為底本，而是根據坊間通行的王先謙刊本；此外，又未能參據繕錄年代與內府本相對接近的《薈要》本或《四庫》本，將部、函、冊等數量歧異處一一檢校核實，致生此誤。藉由本次較為全面而詳細的覆核，大致釐清乾隆、嘉慶兩朝皇家善本特藏的具體規模——乾隆朝 430 部、1,565 函、11,548 冊，嘉慶朝 664 部、1,823 函、12,308 冊。今日有關



「天祿琳琅」書目版本乃至藏書實物的調查研究漸臻周備，學界當可以期待一部更見完善的整理本，或許也能在重新點校的過程中，梳理出傳鈔各本之間的關聯性，從而探究若干疑誤訊息是如何經由轉錄、因襲，最終定型在刻本中廣泛傳播的文獻流行脈絡。

本文綜合日記、年譜與分藏於臺北、北京的清代宮中檔案，首度揭示光緒二十三年三、四月間，南書房翰林奉旨全面清查宮中各處「天祿琳琅」遺書、闕書、目外書的完整過程，同時留下一份明確的盤點紀錄。這項工作，出自帝師翁同龢倡議，推動執行的時間，則恰逢慈禧太后六旬壽慶之年。存世的幾份點查書單，除了得以相互繫連，反映彼時宮內「天祿琳琅」書的存、闕數量，也具體呈現這些書籍被重新整理歸架後的實物樣態，已迥異於原本的典藏陳設配置與書目編纂體例。而書單載錄的各項書籍資訊，係出自陸寶忠等南書房翰林親身檢閱，多可徵信，儘管詳略不一，猶能和嘉慶朝重輯之《後目》著錄內容乃至原書相覈互證，頗有助於標定古籍傳藏歷程中的佚存時序，也可據以探究若干書籍之裝潢樣式變化所透露出整理維護書籍人員的觀念區別；甚至還能依循其間提示的線索，修訂學界對於若干「天祿琳琅」遺書的調查研究結果。光緒朝清查「天祿琳琅」書籍清單的發現，相當程度地填補並勾勒出這批皇家善本動態流轉的空白軌跡。

最後，德宗載湉敕諭清查盤點「天祿琳琅」遺存書籍乃至蒐訪其他宮殿舊藏善本的系列舉措，其目的可能並非僅止於單純地掇拾前朝故物，釐清乾、嘉兩代帝君相繼經營的古籍鑑藏至今實存幾何；而是有意識、有計畫地藉此建構出專屬光緒一朝、具備當代意義的古物資源和典藏空間，俾能讓自己接續這個由乾隆皇帝肇端的宮廷鑑藏傳統，展示其留心典籍文獻的一面。載湉以咸豐年間蓄積的舊刻（鈔）珍本為基礎，全面整理並重新安頓書籍皮貯格局，遂令皇家善本特藏重心從乾、嘉二朝的昭仁殿轉移至景陽宮御書房。百餘年來，學者對於光緒朝曾經編纂「天祿琳琅」「四編」藏書目錄的理解限度，始終停滯在傳聞或臆測階段，難成確鑿之論。本文依據新見史料線索，對應現存書籍實物，發掘其間共有之傳藏脈絡暨相互關聯，對於光緒朝重啟皇家善本特藏的時間、地點、內容、數量、裝潢特徵等方面，初步考察並歸納出相對具體的描述和例證，或可權充吾人重新認識或想像傳說中所謂「四編」書的基礎，也期望能為學界接續研究清宮「天祿琳琅」藏書，開啓另一座文物資源，建立新的起點。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 (唐) 魏徵，《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
- (宋) 鮑彪校注、吳師道重校，《戰國策》，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二十五年平江路儒學刊明修補本。
- (明)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刊本。
- (明) 宋應星，《天工開物》，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宋應星刊本。
- (清) 于敏中、彭元瑞等著，徐德明標點，《天祿琳琅書目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清) 于敏中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7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清乾隆間鈔本影印。
- (清) 于敏中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冊 242，臺北：世界書局，1986，據清乾隆四十三年鈔本影印。
- (清) 于敏中等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內府寫本。
- (清) 史善長編，《弇山畢公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冊 106，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據清同治十一年刻本影印。
- (清) 永瑤、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乾隆六十年武英殿刊本。
- (清) 洪亮吉，《北江詩話》，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冊 2598，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
- (清) 翁同龢著，陳義杰整理，《翁文恭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 清高宗，《御製文二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
- (清) 清高宗，《御製文三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嘉慶間武英殿刊本。
- (清) 清高宗，《御製詩四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
- (清)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嘉慶元年武英殿刊本。
- (清) 清聖祖，《御製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康熙五十三年蔣漣刊本。
- (清) 陸寶忠編、陳宗彝續編，《陸文慎公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冊 177，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據民國十二年鉛印本影印。
- (清) 嵇璜等編，《皇朝文獻通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嘉慶間武英殿刊本。
- (清) 彭元瑞等編，《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嘉慶間內府寫本。

- (清) 惲毓鼎，《崇陵傳信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44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影印。
- (清) 慶桂等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 慶桂等纂，《國朝宮史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嘉慶十一年內府朱絲欄寫本。
- (清) 蔣溥等編，《國朝宮史》，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三十四年內府朱絲欄寫本。
- (清) 蕭穆，《敬孚類藁》，天津：天津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二年刊本。
- 佚名，《賞溥傑書畫目》，收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34。
- 佚名，《明內廷規制攷》，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冊 845，北京：中華書局，1991，據借月山房彙鈔本排印。
- 《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 《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 《宮中檔案全宗》，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清代檔案檢索系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近代論著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
- 朱家潛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 朱振彬，《古籍修復探索與實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
- 宋兆霖主編，《護帙有道：古籍裝潢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
- 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8。
- 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

- 張允亮，《故宮善本書目》，東京：国立公文書館藏，民國二十三年故宮博物院排印本。
- 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民國十四年至十九年排印本。
- 煮雨山房編，《故宮圖書及內務檔案史料》，揚州：廣陵書社，2008。
- 劉明，《中國古書版本筆記》，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
- 劉薈，《天祿琳琅知見書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 劉薈，《天祿琳琅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 期刊論文

- 戸崎哲彦，〈『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合刊初考（上）：明代建陽における韓柳二集合刊本の種類とその刊行年代〉，《島大言語文化》，第38号，2015年3月，頁37-90。
- 王子林，〈天穹寶殿考〉，《故宮學刊》，2015年1期，頁181-198。
- 王鏐，〈明嘉靖本《禮記注》考略〉，《古典文獻研究》，第24輯下，2021年12月，頁57-77。
- 田婷婷，〈脆弱文獻的修補、加固與補紙的選擇加工——「天祿琳琅」藏書《唐文粹》修復紀要〉，《文津學誌》，第12輯，2019年6月，頁369-377。
- 朱振彬，〈國家圖書館「天祿琳琅」專藏修復案例〉，《文津學誌》，第10輯，2017年8月，頁476-483。
- 朱振彬，〈國家圖書館「天祿琳琅」專藏修復札記二則〉，《文津學誌》，第11輯，2018年8月，頁424-429。
- 朱振彬，〈關於國家圖書館藏「天祿琳琅」珍籍的修復〉，《文津學誌》，第9輯，2016年8月，頁336-342。
- 朱賽虹，〈清宮寫抄類典籍裝幀形制探微〉，《中國書法》，總349期，2019年3月，頁137-140。
- 何朝暉，〈山人與出版：俞安期生平、著述與刻書考〉，《古典文獻研究》，第15輯，2012年，頁369-393。
- 吳娟，〈李劉《四六標準》《梅亭先生四六》編刻流傳考〉，《版本目錄學研究》，第12輯，2020年11月，頁140-158。
- 岑天翔，〈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刻孤本《文章正印》考論〉，《斯文》，第7輯，2021年6月，頁166-184。
- 李致忠，〈宋刊巾箱本《萬卷菁華》考論〉，《山東圖書館學刊》，2019年4期，頁1-4。
- 李峻岫，〈《孟子音義》影宋抄本考校——兼論宋蜀刻大字本之刊刻質量及文獻價值〉，《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14輯，2022年8月，頁72-102。

- 李振聚，〈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的底本來源及其價值——兼論《四庫全書》纂修與清宮天祿琳琅藏書之關係〉，《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22輯，2020年12月，頁194-204。
- 李振聚，〈論《四庫全書》本《謝宣城集》出於清宮天祿琳琅藏宋刻本〉，《天一閣文叢》，第16輯，2019年9月，頁86-93。
- 李開升，〈古籍之為文物——明代出現的新型藏書家〉，收入氏著，《古籍之為文物》，北京：中華書局，2019，上編，頁12-17。
- 沈如泉、王瓊，〈《梅亭先生四六標準》敘錄〉，《駢文研究》，第2輯，2018年6月，頁176-194。
- 沈津，〈一個美麗的「錯誤」——古籍版本鑒定札記〉，收入氏著《伏櫪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頁305-311。
- 林世田、趙洪雅，〈宋刻本《經典釋文》的流散與合璧〉，《文獻》，2022年2期，頁178-191。
- 范景中，〈書籍之為藝術——趙孟頫的藏書與《汲黯傳》〉，《中國美術學院學報》，2009年4期，頁25-48。
- 范景中，〈從藝術的觀念看書籍史〉，《中國美術學院學報》，2021年2期，頁4-39。
- 孫碧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天祿琳琅」典籍考略〉，《明清論叢》，第18輯，2018年12月，頁433-446。
- 徐超英，〈淺談故宮藏匾聯的形制特色與文物價值〉，《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4期，頁33-46。
- 翁宇雯，〈乾隆朝《活計檔》中的「宋花邊」〉，《故宮學術季刊》，35卷2期，2017年，頁141-211。
- 郝潤華，〈《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集》版本考辨〉，《古典文獻研究》，第22輯下，2020年1月，頁41-52。
- 崔志賓，〈《宋板春秋經傳集解》函套修復簡述〉，《文津流觴》，2015年1期（總第49期），頁26-30。
- 崔志賓，〈「天祿琳琅」珍藏中前人修復遺存及解決措施綜述〉，《文津學誌》，第10輯，2017年8月，頁484-496。
- 崔志賓，〈一種特殊「接背」方法在古籍修復工作中的應用——以國家圖書館「天祿琳琅」專藏《漢書》單冊修復為例〉，《文津學誌》，第18輯，2022年6月，頁247-254。
- 崔志賓，〈傳統染色在「天祿琳琅」修復工作中的應用初探〉，收入陳紅彥、劉波主編，《芸香芬馥——古籍保護探索與實踐》，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7，頁238-243。
- 張杰，〈故宮東六宮區意譯滿文匾額初探〉，《故宮學刊》，總第16輯，2016年7月，265-274。

- 張學芬，〈四庫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底本考辨——兼論玉几本與明易本之關係〉，《古籍研究》，總第 74 輯（2021 下），頁 154-166。
- 曹萌，〈清宮「天祿琳琅」藏元刻本裝潢形制研究〉，《收藏與投資》，2022 年 1 期，頁 37-39。
- 章莎菲，〈撫州本《周易》抄補考〉，《古籍研究》，總第 73 輯（2021 上），頁 97-139。
- 郭明芳，〈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抄本天祿琳琅書目考述〉，《版本目錄學研究》，第 12 輯，2020 年 11 月，頁 77-93。
- 陳連營、張楠，〈《國朝宮史》的編纂與乾隆年間的宮廷學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 年 1 期，頁 92-101。
- 曾紀剛，〈院藏「天祿琳琅」書衣小識〉，收入宋兆霖主編，《護帙有道：古籍裝潢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 264-290。
- 曾紀剛，〈贗製還應重訂正——說乾隆朝天祿琳琅撤出書〉，《故宮文物月刊》，368 期，2013 年 10 月，頁 56-67。
- 舒大剛、尤瀟瀟，〈兩種宋版《三蘇文粹》比較研究〉，《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 3 期，頁 74-85。
- 楊玉良，〈清宮保護善本古籍小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91 年 2 期，頁 83-90。
- 趙長波，〈天祿琳琅元刻明修本《大學衍義》錯碼與誤訂摺拾〉，《圖書館學刊》，2021 年 11 期，頁 109-112。
- 劉冰，〈遼寧省圖書館藏天祿琳琅舊藏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考述〉，《圖書館學刊》，2021 年 6 期，頁 90-93。
- 劉明，〈金刻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小識〉，《古典文學知識》，總第 208 期，2020 年 1 月，頁 44-49。
- 劉庭風、周娉倩，〈庭院吉氣自何方——一份紫禁城庭院門位相度奏折的圖解〉，《紫禁城》，2020 年 3 期，頁 36-59。
- 劉薈，〈《天祿琳琅知見書錄》補說〉，寧波：天一閣博物院，「天一閣與流散書籍訪歸」中外學術研討會，2021 年 10 月 11 日，未刊稿。
- 劉薈，〈日本現藏清宮天祿琳琅遺書考述〉，北京：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第二屆「古籍文獻收藏、研究與整理出版」國際學術論壇之「東亞漢籍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研討會，2022 年 5 月 21 日，未刊稿。
- 潘菲，〈國家圖書館天祿琳琅專藏《十七史詳節》單冊修復紀要〉，《文津學誌》，第 18 輯，2022 年 6 月，頁 255-263。
- 潘菲，〈國家圖書館藏「天祿琳琅」元版《通志》第七冊的修復〉，《文津流觴》，2021 年 1 期（總第 73 期），頁 45-48。
- 聶崇正，〈清代宮廷畫家唐岱和張雨森〉，《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 年 4 期，頁 9-12。

### 研究計畫

邱士華，〈清高宗御容圓光小像研究〉，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MOST 105-2410-H-136-001-MY2。

### 學位論文

郭帥，〈《春秋經傳集解》版本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21。

吳學敏，〈南宋劉震孫《文章正印》研究〉，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1。

王曉鈺，〈清宮「天祿琳琅」藏宋刻本《萬卷菁華》修復與裝潢研究〉，山東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21。

原松邑，〈清宮「天祿琳琅」藏《六家文選》修復裝潢研究〉，山東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21。

### 網路資源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資料目錄・画像公開システム〉，<https://shoryobu.kunaicho.go.jp/>，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0日。

白伯縞，〈《昭明文選》（乾隆十九年御題梁國治寫本）〉，（北京）故宮博物院，<https://reurl.cc/qZAq90>，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0日。

朱賽虹，〈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北京）故宮博物院，<https://reurl.cc/ykWzVq>，檢索日期：2022.10.10。

馮朝暉，〈8年修復清宮舊藏300餘冊：國家圖書館發佈「天祿琳琅」古籍修復項目重大成果〉，（中國）國家文物局，<https://reurl.cc/pZORql>，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0日。

## 圖版出處

- 圖 1 《天祿琳琅排架圖》(局部)，清嘉慶間內府寫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品。
- 圖 2 宮中檔奏摺，光緒二十年清查昭仁殿「天祿琳琅」現存御題書籍清單。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 《十三經古註》，明崇禎十二年葛氏永懷堂刊本。諸經書冊多用月白(淡藍)色絹質書衣，函套裱糊黃綠色地三色朵花紋仿宋錦；唯獨《春秋左傳》採用黃綠色(或米色)地三色朵花紋仿宋錦，函套裱糊米色地朵花龜背紋仿宋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 宮中檔奏摺，光緒二十年清查昭仁殿「天祿琳琅」現存書籍清單，「明版史部」局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提供。
- 圖 5 《通鑑紀事本末》附《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萬曆三十四年黃吉士刊本。清宮修復重裝時，書衣、錦套分別採用不同顏色、材質、紋樣的織物裝潢。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6 宮中檔奏摺，光緒二十年清查武英殿傳進書籍清單，「子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提供。
- 圖 7 宮中檔奏摺，光緒二十年〈景陽宮正殿安設書籍清單〉(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8 光緒二十年〈御書房安設書籍清單〉之正殿中間部分(局部)。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景陽宮清查書籍冊》，據清鈔本影印，冊 8，頁 516-525。
- 圖 9 光緒二十一年九月由天穹寶殿移設御書房中間之宋版、元版書籍。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景陽宮清查書籍冊》，據清鈔本影印，冊 8，頁 526-527。
- 圖 10 宮中檔奏摺，光緒二十二年〈御書房添設書目清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1 宮中檔奏摺，光緒二十年〈靜觀齋安設書籍清單〉(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2 光緒二十年〈御書房安設書籍清單〉之東暖閣部分(局部)。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景陽宮清查書籍冊》，據清鈔本影印，冊 8，頁 528-549。
- 圖 13 光緒二十年〈御書房安設書籍清單〉之西暖閣部分。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景陽宮清查書籍冊》，據清鈔本影印，冊 8，頁 550-551。
- 圖 14 (元)劉因撰，《四書集義精要》，元至順元年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刊本。書冊裝潢樣式，卷首有江浙行省發給儒學提舉司之梓行書籍劄付，康熙五十五年發下改裝夾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5 景陽宮東暖閣皮藏「鈔本經部」之《尚書通考》、《論語全解》等「大本」書籍，書冊皆採五眼包角線裝，書衣選用杏黃鳳鳥雲紋暗花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元)黃鎮成撰，《尚書通考》，清雍正間烏絲欄鈔本。「胤」字缺末筆，「曆」字不缺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 景陽宮東暖閣皮藏「鈔本經部」之「大本」《尚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Further Evidence for the Historical Event of the “Tianlu Linlang” Collection of Rare Books \*

Tseng, Chi-kang \*\*

###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palace library known as “Tianlu Linlang” (“Gems of Tianlu”) represented the first time in the pre-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book collection that took the object of collecting specifically as rare books to form a special imperial holdings focusing on cataloguing according to edition studies, connoisseurship, and artistic appreciation. The present study is assisted by a variety of available archival documents corroborated by examining actual surviving books to develop a related historical network on the origins of collecting, scope and number of texts involved, inventorying and cross-referencing, and derivatives of book collecting for Tianlu Linlang in an attempt to identify and fill the gaps in its history.

First, the present study traces back to the original time and place of this special collection of rare books, starting with the first lunar month of the Qianlong emperor’s first reign year (1736). The Jiangxue (“Crimson Snow”) Pavilion in the imperial gardens was renovated to serve as the special location for this collection of ancient rare books, which were considered the equivalent of artworks worthy of appreciation and connoisseurship. This was to re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s new organization of a special palace collec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lecting and display layout for various kinds of cultural artifacts at the court.

Next is an examination of the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Tianlu Linlang Catalogue* ordered by the Qianlong court that indicates there were actually a total of 430 books, which differs by one from the 429 books officially recognized in the field. This is due to the difficulty in using manuscript copies from the Qing Inner Court as originals during the period of collation and the inability to consult copies of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Extracts of the Complete Books of the Four Treasuries* and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Complete Books of the Four Treasuries* transcribed around the same time to check and verify one by on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of volumes, cases, and books.

Then the study show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lunar months of 1894 (20<sup>th</sup> year of the Guangxu reign), the complete process of when Hanlin academicians

in the Southern Study were ordered by decree to do a complete inventory of all the surviving, incomplete and uncatalogued books of the Tianlu Linlang in various palace locations. And the contents of surviving inventory records can be used to cross-document with the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Later Compilation of the Tianlu Linlang Catalogue* and even the original books themselves, which in turns helps to probe the time they went missing and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rare books ov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Finally, the inventory conducted in the Guangxu reign actually results in the focus of the imperial rare books special collection in the Zhaoren Palace of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s shifting to the Yushu (Imperial) Study in the Jingyang Palace and the presence of a “Fourth Series” of the Tianlu Linlang that had been rumored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Also, for this reason,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were discovered for further correlation with actual surviving books, providing evidence for the re-imagining of the new rare books special collections established in the Guangxu reign. Through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it is hoped that scholars will continue to research the Tianlu Linlang book collection and establish a new beginning for the study of this heritage resource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Keywords:** Tianlu Linlang, 1<sup>st</sup> year of Qianlong, Jiangxue Pavilion, 20<sup>th</sup> year of Guangxu, Jingyang Palace, Yushu study, fourth series of books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

\* Received: 28 June 2022; Accepted: 29 August 2022

\*\* Assistant Curator, Department of Painting, Calligraphy, Rare Book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後 層 第 二 十 二 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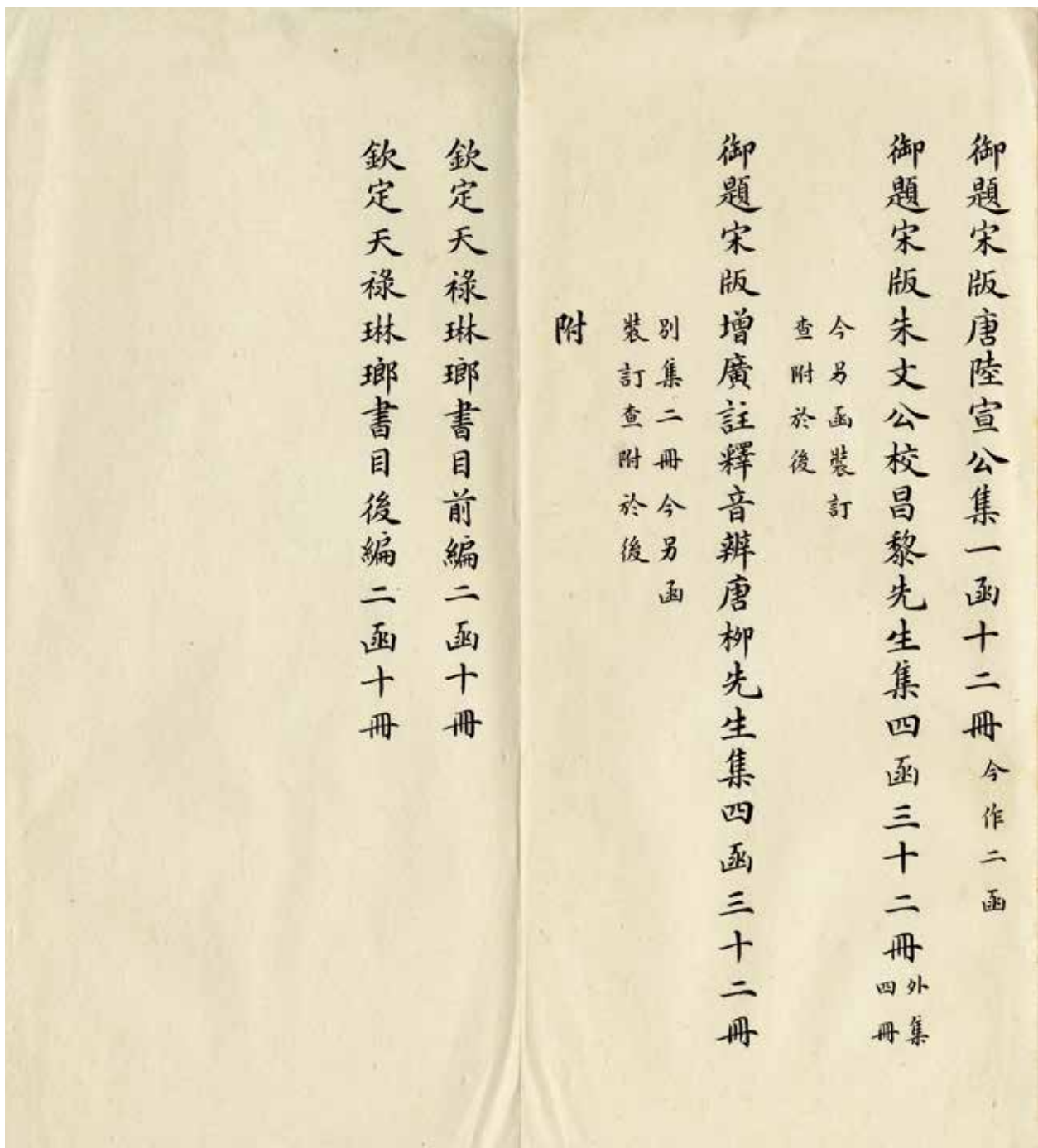
<b>天祿琳瑯排架圖</b> 共六百六十三部計千八百二十八函敬登 宋遼金元明各序時代仍分經史子集依仿四庫全書次第 御題冠首	函二第紀詩古版明	函一第新臺玉版明		
	函三第紀詩古版明	函一第新臺玉版明		
	函一第府樂古版明			
	函一第紀詩古版明	函二第觀大論古版明	函二第強詞記書版明	
	函二第雅唐版明			
	函三第雅唐版明	函五第苑類詩唐版明	函三第苑類詩唐版明	函一第苑類詩唐版明
	函四第雅唐版明	函一第雅唐版明	函四第苑類詩唐版明	函二第苑類詩唐版明
		函五第集詩家百唐版明	函三第集詩家百唐版明	函一第集詩家百唐版明
	函二第紀詩唐版明	函六第集詩家百唐版明	函四第集詩家百唐版明	函二第集詩家百唐版明
	函一第詩庵升版明		函一第詩庵全版明	
函一第梅金巨括版明				
函一第通詞妙絕版明	函二第詩常增明	函二第藝技前版明	函四第園菽宋版明	
函一第韻藻鐘度增鈔明	函一第言篆書鈔明			
函一第子劉鈔明	函一第韻解經詩鈔明			
函一第職總話詩家百鈔明	函一第問待書四鈔明	函四第傳篆書尚鈔明		

### 第 二 架

函三第解集傳姓秋春版宋	函一第解集
函四第解集傳姓秋春版宋	函二第解集
函第集姓春宋	函第集姓春宋
函二第解傳秋版	函三第解傳秋版
函第集姓春宋	函第集姓春宋
函三第解傳秋版	函四第解傳秋版
函第集姓春宋	函第集姓春宋
函四第解傳秋版	函一第解傳秋版
函第集姓春宋	函第集姓春宋
函三第解傳秋版	函一第解傳秋版
函第集姓春宋	函第集姓春宋
函四第解傳秋版	函二第解傳秋版
	函二第政集子孟版
函四第釋典姓版宋	函四第種九版宋
函一第類字馬班版宋	
函一第類字馬班版宋	
函一第類字馬班版宋	
函一第類字馬班版宋	
函一第類字馬班版宋	函二第五說許重宋
函一第鵝佩版宋	函清音大氏刊

圖 1 《天祿琳瑯排架圖》 局部 清嘉慶間內府寫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御題宋版唐陸宣公集一函十二冊 今作二函

御題宋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函三十二冊 外集四冊

今另函裝訂  
查附於後

御題宋版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四函三十二冊

別集二冊今另函  
裝訂查附於後

附

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前編二函十冊

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後編二函十冊

圖2 宮中檔奏摺 光緒二十年清查昭仁殿「天祿琳瑯」現存御題書籍清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御題書籍九部

謹安設前層中架  
附書目二部

御題宋版易傳一函六冊

御題宋版尚書詳解一函六冊

御題宋版三禮圖一函四冊

御題宋版佩觿一函四冊

御題影宋鈔本班馬字類一函三冊

御題宋版算經二函十冊  
查係影宋鈔本



圖3 《十三經古註》 明崇禎十二年葛氏永懷堂刊本 諸經書冊多用月白（淡藍）色絹質書衣，函套裱糊黃綠色地三色朵花紋仿宋錦；唯獨《春秋左傳》採用黃綠色（或米色）地三色朵花紋仿宋錦，函套裱糊米色地朵花龜背紋仿宋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通鑑紀事本末》附《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 明萬曆三十四年黃吉士刊本  
清宮修復重裝時，書衣、錦套分別採用不同顏色、材質、紋樣的織物裝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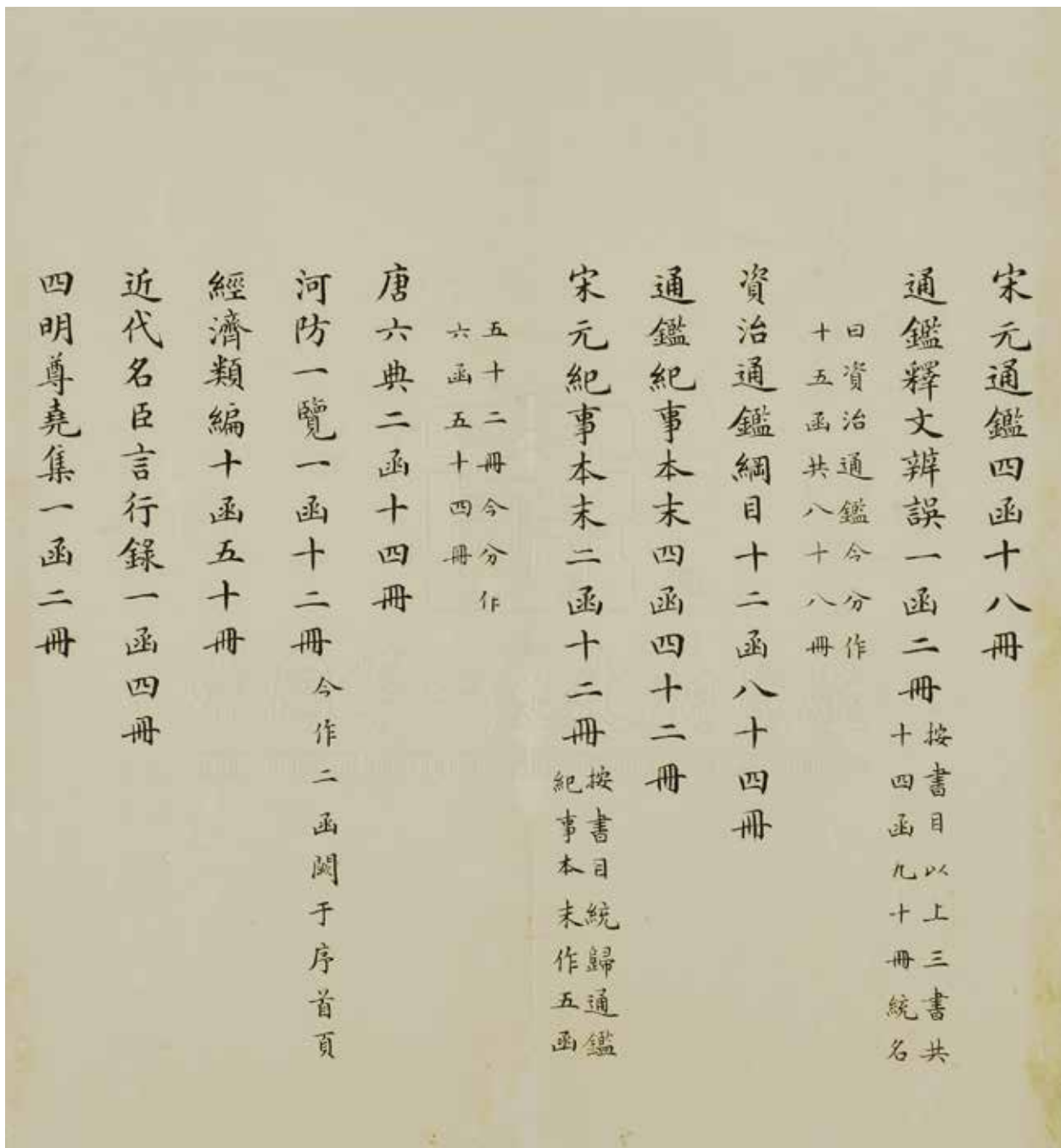


圖4 宮中檔奏摺 光緒二十年清查「天祿琳琅」現存書籍清單 「明版史部」 局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提供

文獻通考六函六十冊 今作十二函

明版史部

史記八函六十四冊

三國志四函二十冊 蟲蝕破爛函亦破損

逸周書一函二冊

國語解二函二十冊

前後漢紀二函十冊

貞觀政要一函十冊 今作二函

貞觀政要二函十冊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一函二冊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一函四冊

資治通鑑十函六十八冊

王氏農書六冊

白孔六帖三十二冊 存三十一冊 闕卷一之卷四一冊 原標宋版

白孔六帖四十八冊 存四十七冊 闕卷五十四卷五十五一冊

羣書考索三十二冊 存三十冊 闕目錄及卷一之卷五卷五十九之六十

六計 二冊

記纂淵海四十冊 存三十一冊 闕卷首之卷十六之七十三

計九冊

羣書集事淵海一百冊 存九十五冊 闕卷一後卷二前卷五全卷六前

計五冊 蟲蝕破損

唐類函四十冊 存十八冊 闕卷十五之卷十九卷一百卷一百四十一之卷一百四十五卷一百五十五之卷二百計二十二冊

詩壇叢韻六十冊

圖 6 宮中檔奏摺 光緒二十年清查武英殿傳進書籍清單 「子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提供

宋版子部

纂圖互注荀子六冊 蟲蝕

朱子語類八十冊 存七十五冊 闕卷十七卷四十一卷七十六卷七十七卷

百二十一之百二十四  
計五冊 蟲蝕

自警編十四冊 計存十二冊 闕乙卷戊卷

藝文類聚四十冊 存三十九冊 闕卷六之卷八一冊 蟲蝕

初學記十五冊 存十四冊 闕卷十一卷十二一冊 蟲蝕

孔氏六帖二十冊 存十九冊 闕卷十一一冊 蟲蝕 破損

元版子部

經史證類大全本草三十二冊 存二十九冊 闕卷四卷十三計

三冊  
蟲蝕

明版子部

二十子全書十八冊 存十七冊 闕管子第九之十九一冊 蟲蝕 破損

南華真經十六冊 存十五冊 闕卷一一冊 蟲蝕

二程全書十二冊 存十一冊 闕卷十一之十七一冊

五倫書二十四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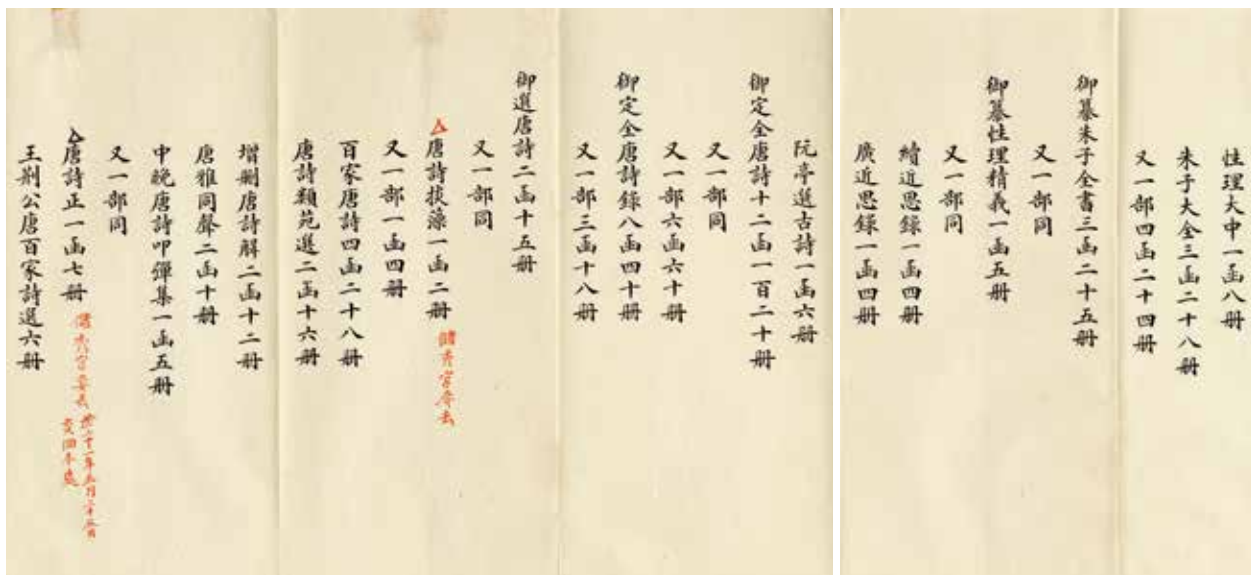


圖 7 宮中檔奏摺 光緒二十年〈景陽宮正殿安設書籍清單〉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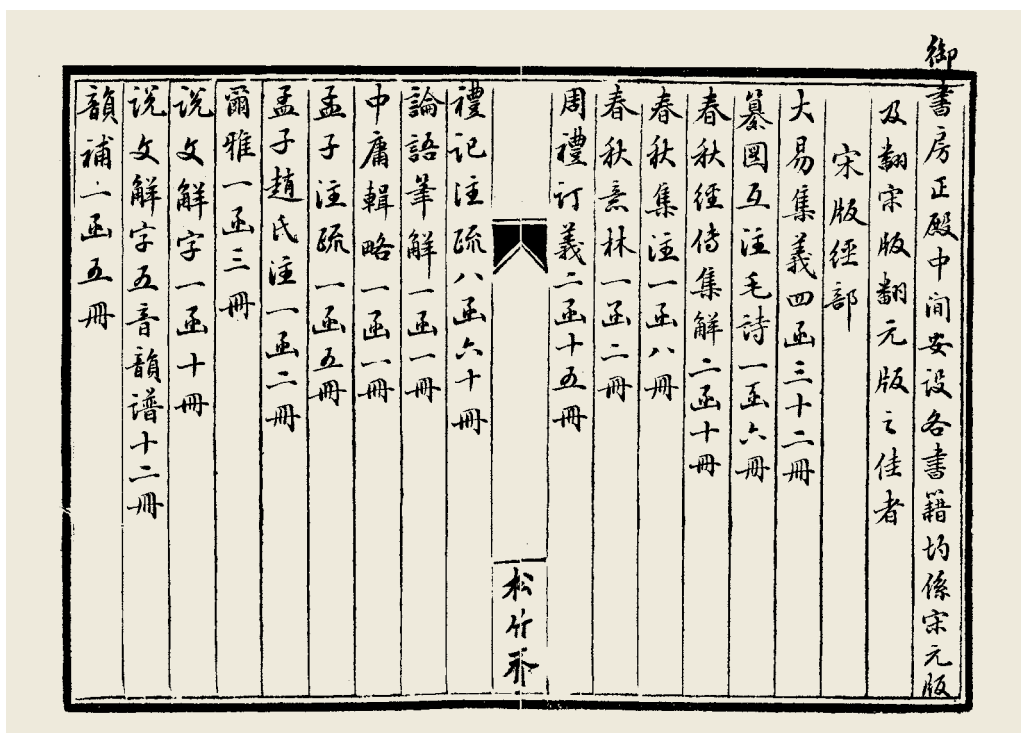


圖 8-1 光緒二十年〈御書房安設書籍清單〉之正殿中間部分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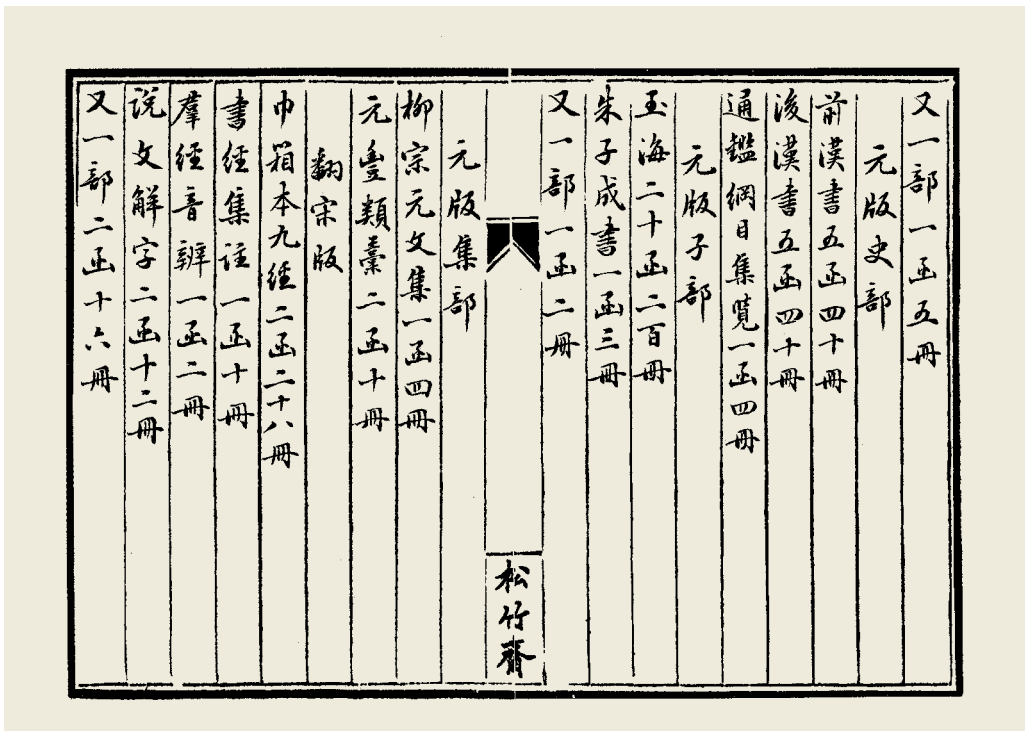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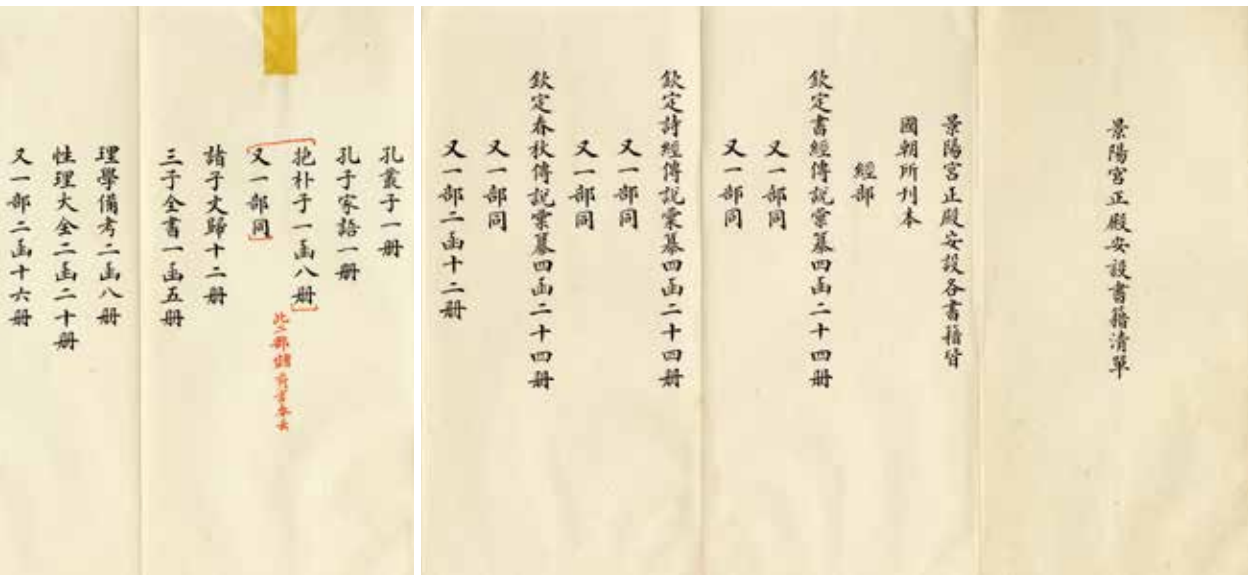


圖 8-2 光緒二十年〈御書房安設書籍清單〉之正殿中間部分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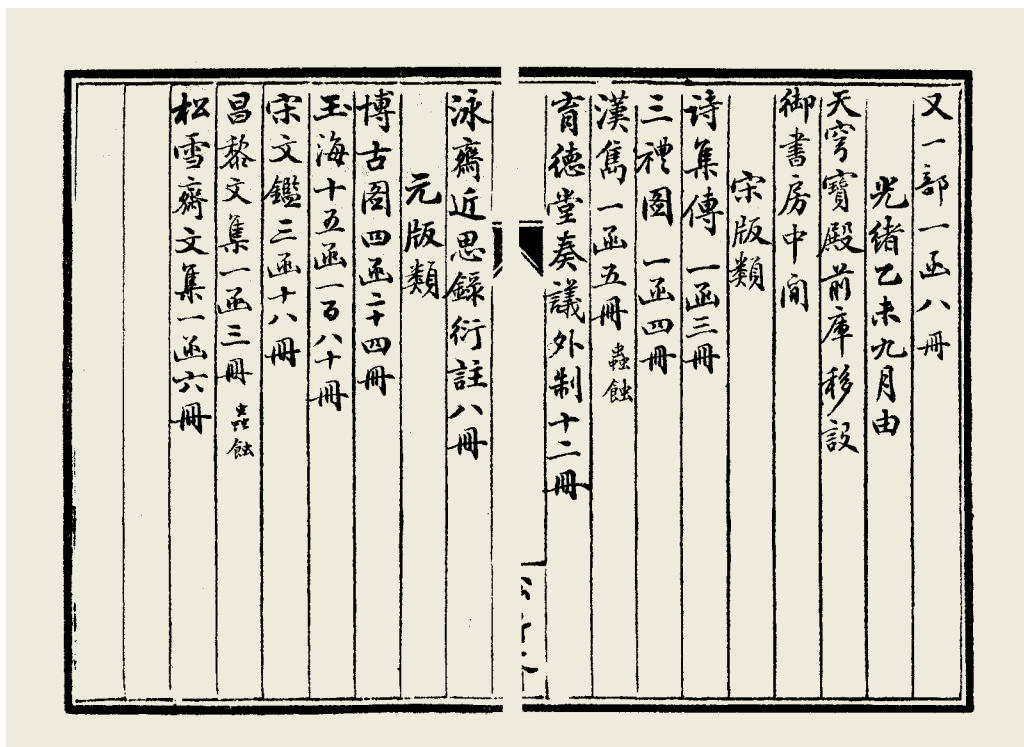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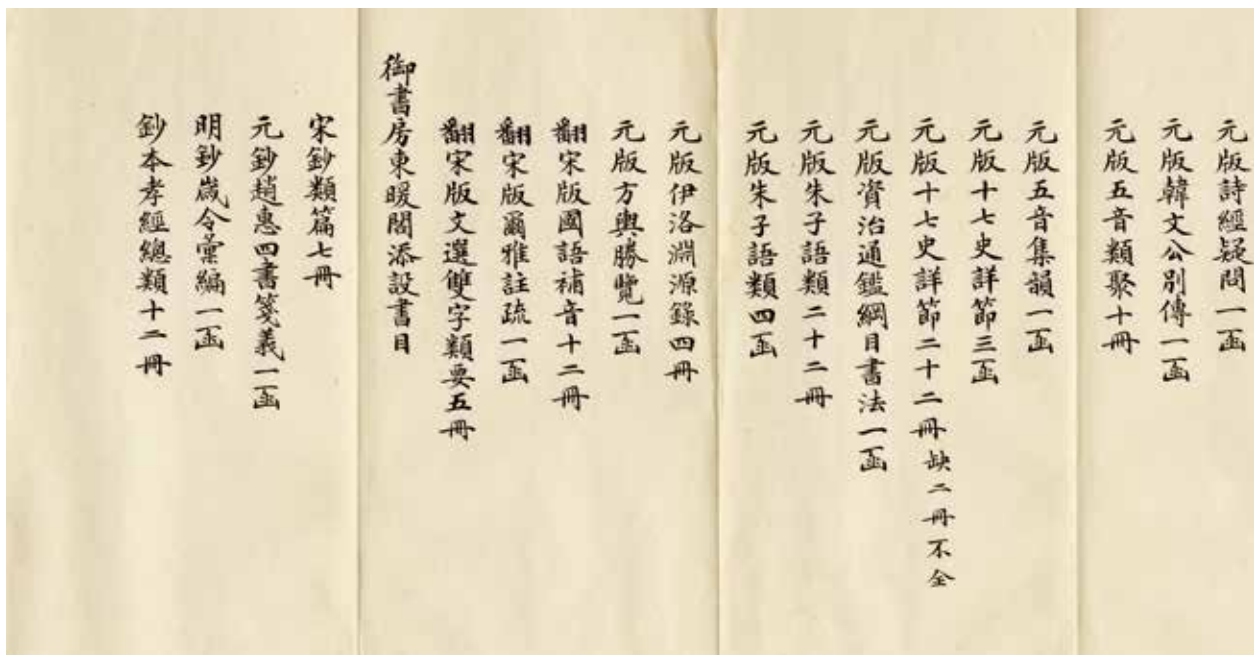


圖 9 光緒二十一年九月由天穹寶殿移設御書房中間之宋版、元版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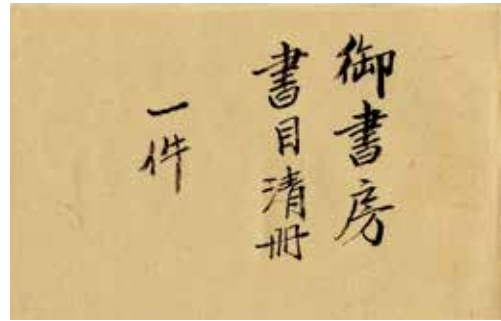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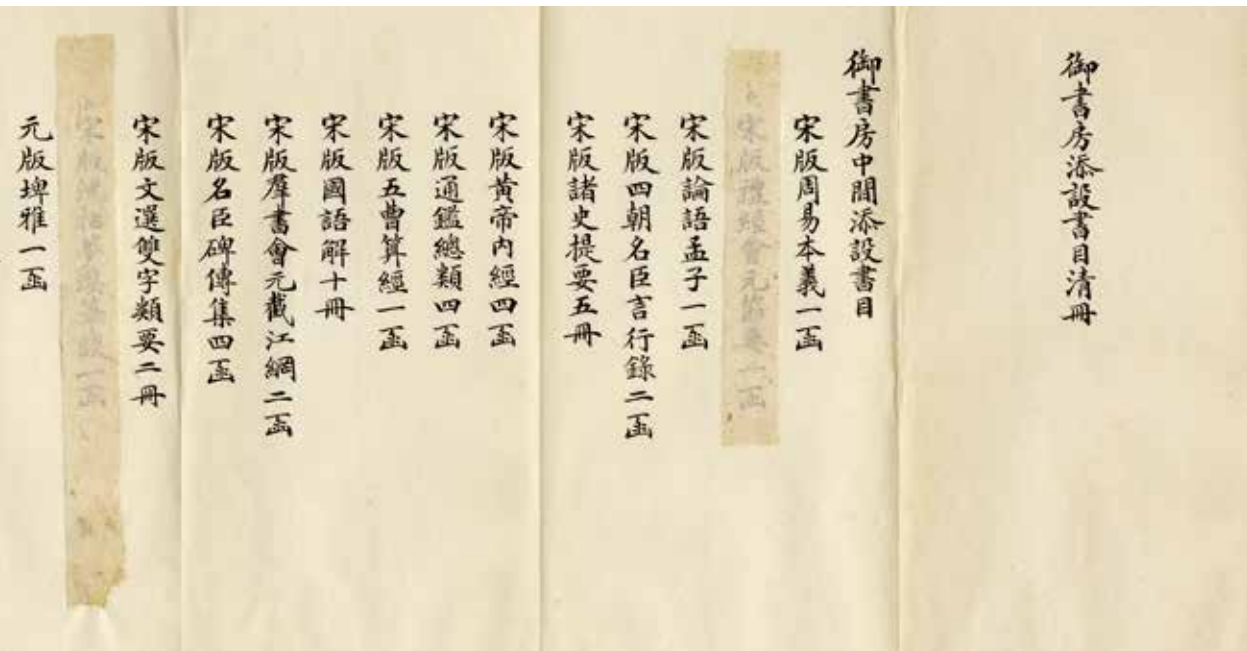


圖 10 宮中檔奏摺 光緒二十二年  
 〈御書房添設書目清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御書房添設書目清冊

御書房中間添設書目

宋版周易本義一函

宋版論語孟子一函

宋版四朝名臣言行錄二函

宋版諸史提要五冊

宋版黃帝內經四函

宋版通鑑總類四函

宋版五曹算經一函

宋版國語解十冊

宋版羣書會元截江網二函

宋版名臣碑傳集四函

宋版文選雙字類要二冊

宋版禮記通議一函

元版埤雅一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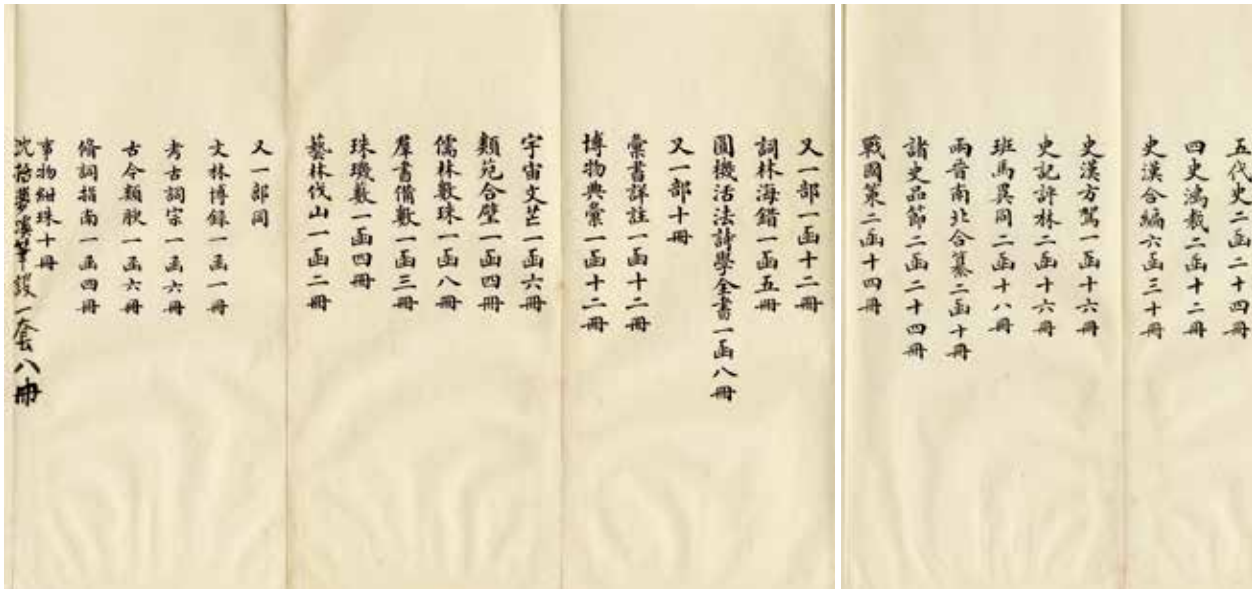


圖 11 宮中檔奏摺 光緒二十年〈靜觀齋安設書籍清單〉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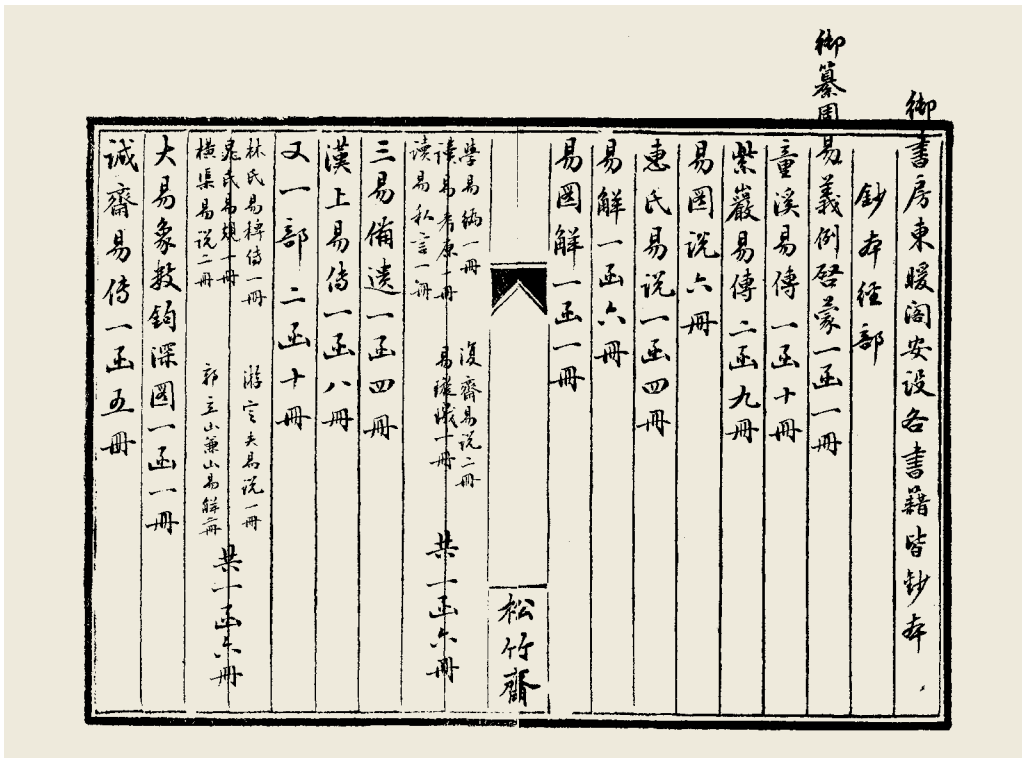


圖 12 光緒二十年〈御書房安設書籍清單〉之東暖閣部分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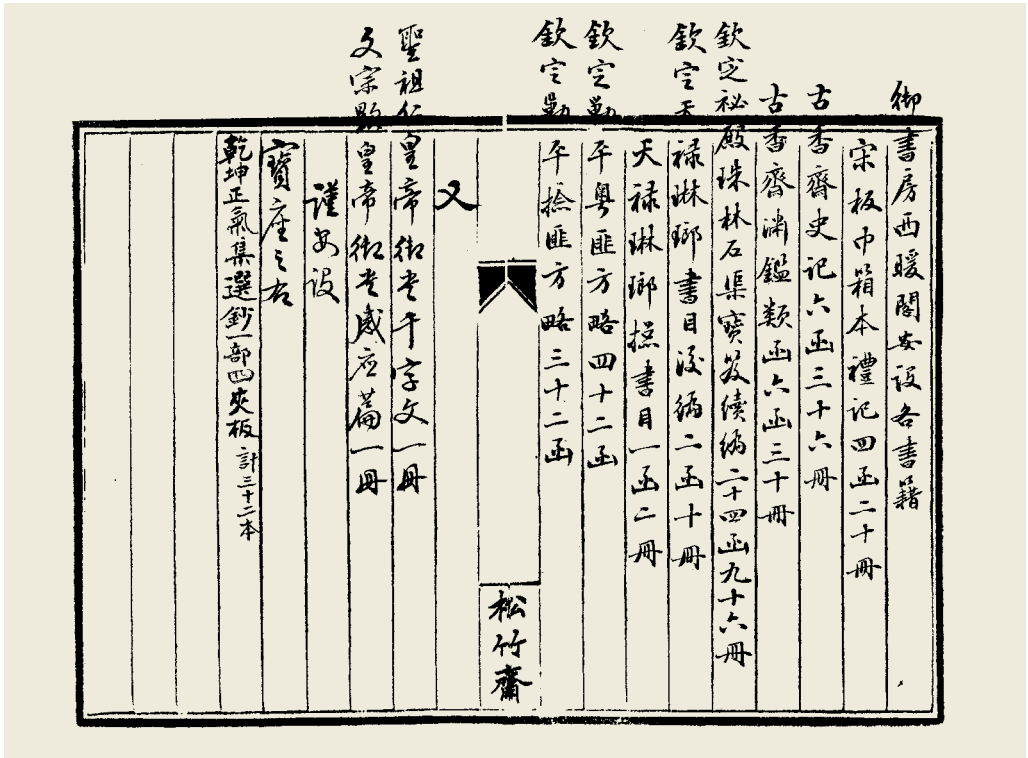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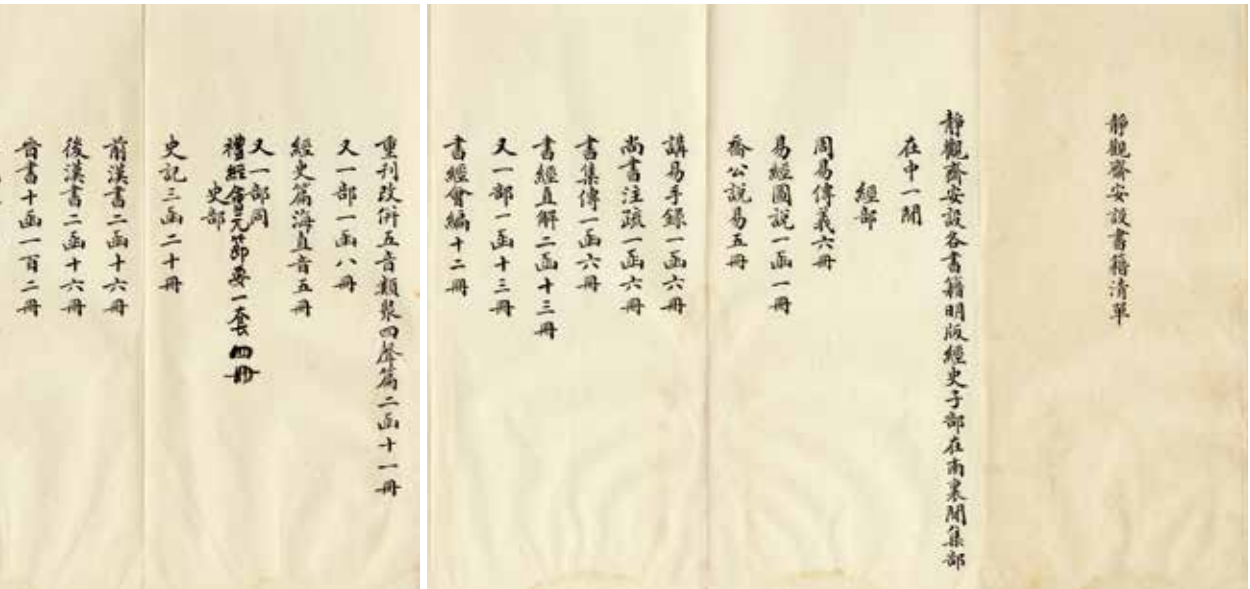


圖 13 光緒二十年〈御書房安設書籍清單〉之西暖閣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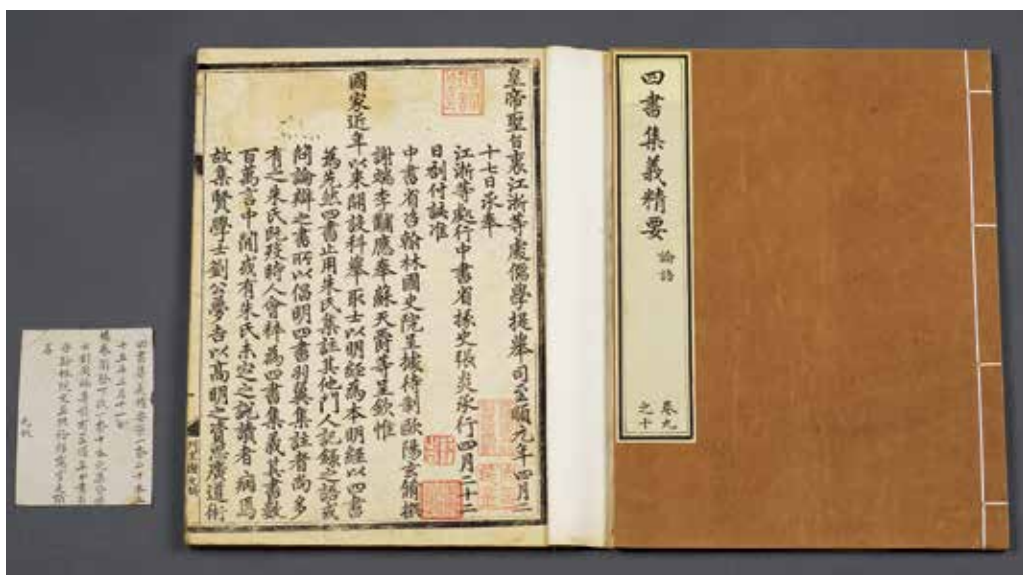


圖 14 元 劉因撰 《四書集義精要》 元至順元年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刊本 書冊裝潢樣式，卷首有江浙行省發給儒學提舉司之梓行書籍劄付，康熙五十五年發下改裝夾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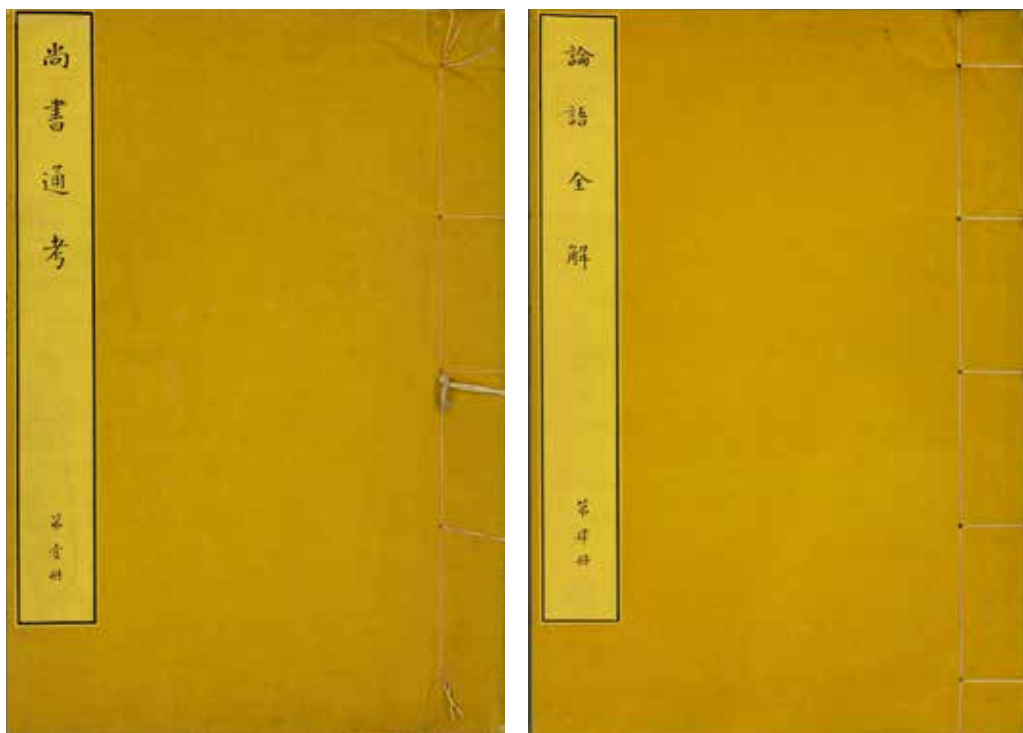


圖 15 景陽宮東暖閣度藏「鈔本經部」之《尚書通考》、《論語全解》等「大本」書籍，書冊皆採五眼包角線裝，書衣選用杏黃鳳鳥雲紋暗花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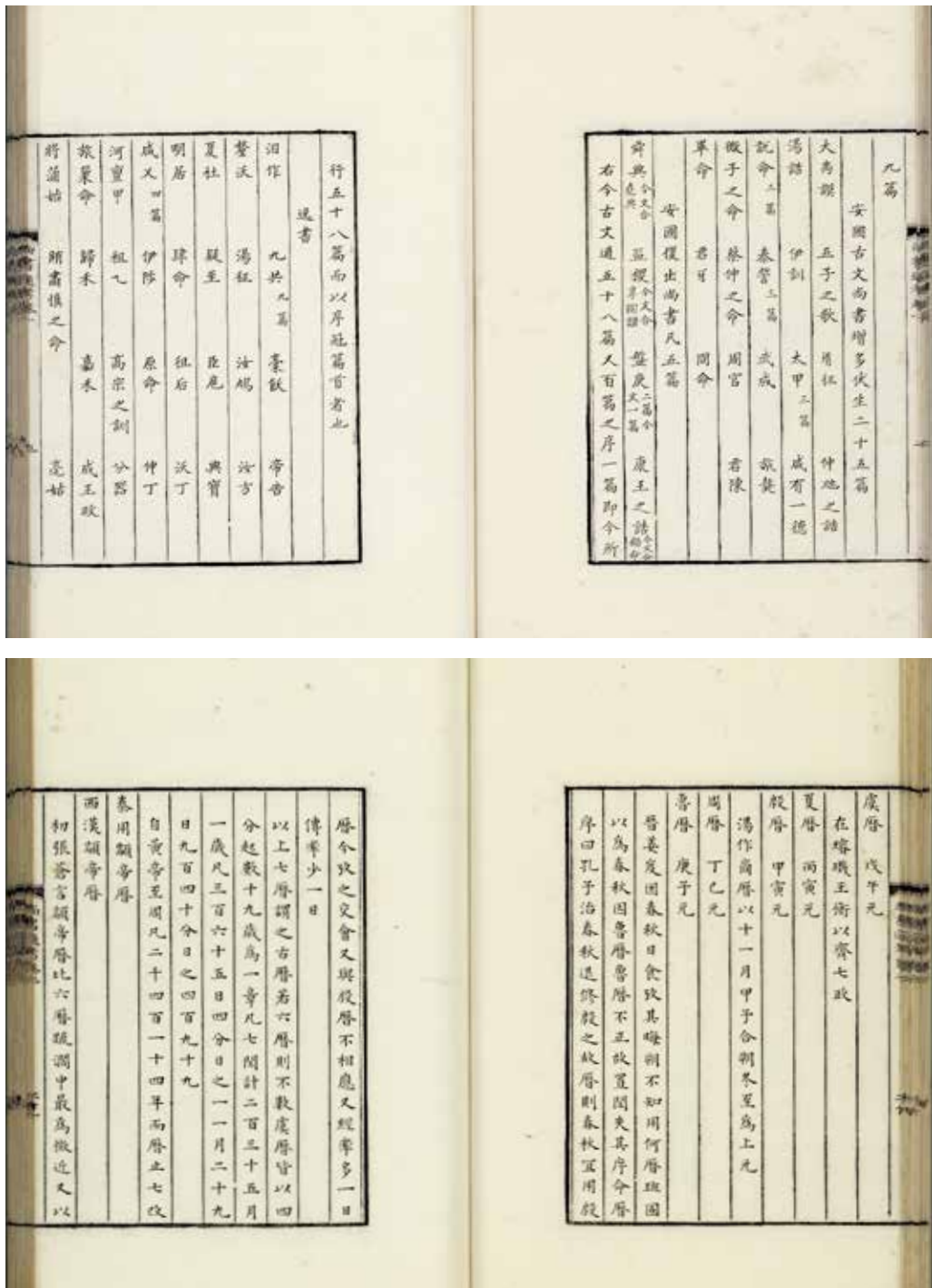


圖 16 元 黃鎮成撰 《尚書通考》 清雍正間烏絲欄鈔本 「胤」字缺末筆，「曆」字不缺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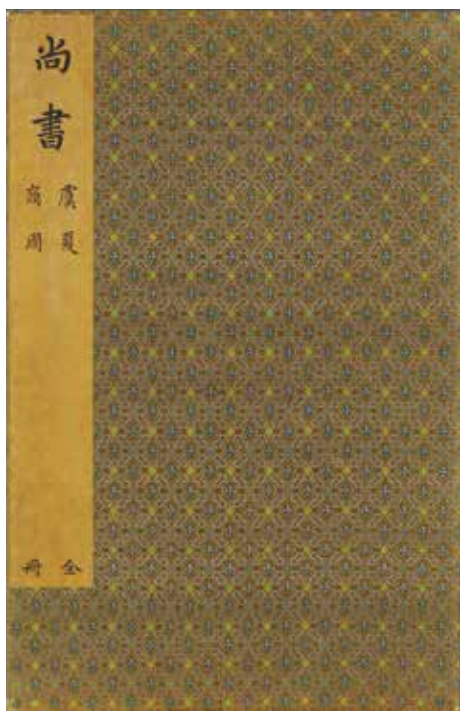


圖 17 景陽宮東暖閣度藏「鈔本經部」  
之「大本」《尚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